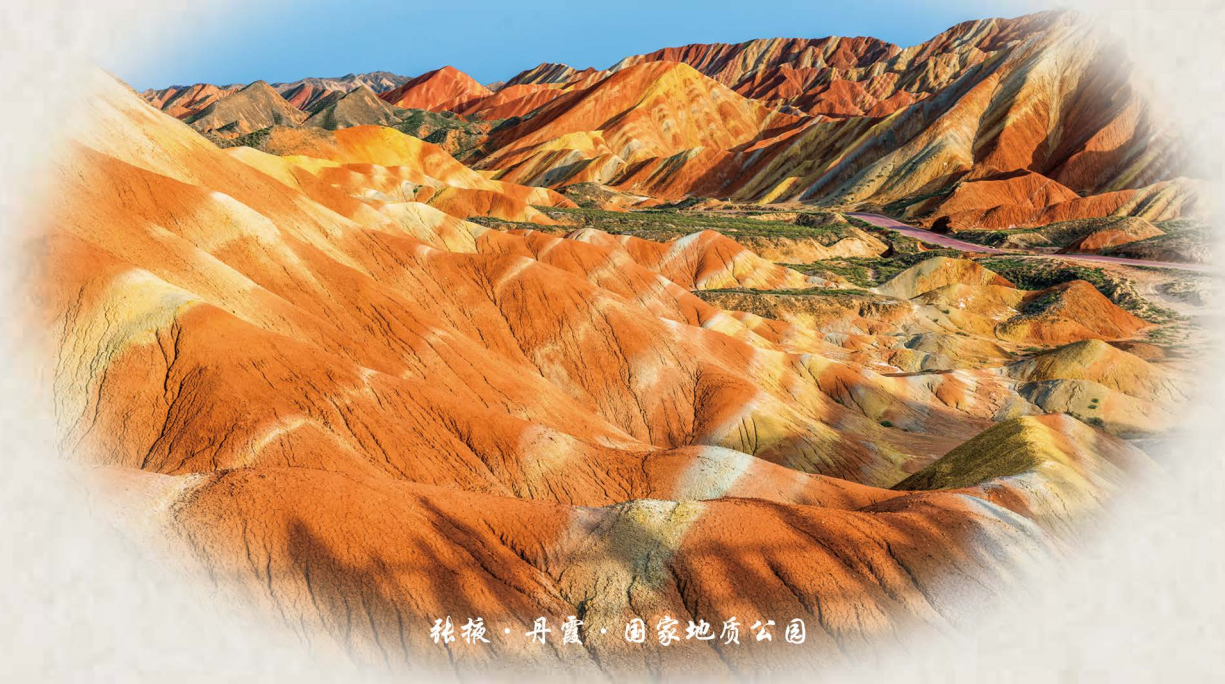


#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8·1

# 甘肃史志

##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张军利

**副主任：**郝宗维 李振宇 张正龙 石为怀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述林 毛存显 米琳 孙占鳌

李宽余 陈谦 杨生宝 张伦

张占社 张全生 何成才 罗卫东

郑天水 贺红梅 高中 梁兴明

彭晓峰 谭得胜

**主编：**李振宇

**副主编：**张占社

**编辑：**孔令奇 李佳潞

#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33期

2018·1

## · 特 载 ·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黄强在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4·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张军利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编) ·6·

## · 理论视野 ·

论方志文化自信 冀祥德 宋丽亚 ·10·

## · 史地考证 ·

霍去病与皋兰山考 华 丹 陈 谦 ·24·

河西地理略考 郝树声 张德芳 ·27·

甘肃武山官寺考释  
——兼谈中国古代福寿文化 王雪梅 裴应东 ·39·

## · 年鉴编研 ·

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思考与解析 滕 辉 ·41·

# GANSU SHIZHI

---

---

## · 信息传播 ·

- 新媒体时代方志文化传播浅析 赵峰 ·48·
- 地情信息融入公众生活之我见  
——以兰州市地方志信息化为依据 于彪 ·58·
- 方志“大众化”趋向简论 杨先 ·62·
- 

## · 人物春秋 ·

- 杨凌霄《襄武人物志续编》对陇西文史的贡献 王长华 ·65·
- 

## · 史海钩沉 ·

- 论河西地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张克非 ·69·
- 李唐皇室祖籍地问题考辨 张慧 ·71·
- 老子与武山老君山考究 汪新颖 裴应东 ·78·
- 

## · 史志快讯 ·

- 《金昌市志(1992—2010)》出版发行 ·23·
- 《甘肃年鉴2017》公开出版发行 ·77·
-

#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黄强在省地方 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编者按:**2018年1月17日,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主任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终审通过了甘肃省志分卷《自然地理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档案志》《出版志》《检验检疫志》5部志书。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现将讲话摘要刊登,以便贯彻执行。

借此机会,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就做好当前地方史志工作讲几点意见:

## 一是地方史志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和目标要求,为我们推动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志书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史志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意义重大。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和指导各项工作,始终不忘习总书记视察甘肃“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省委、省政府关于地方史志工作的总体安排,明确重点,强化措施,持续发力,不断推动地方史志工作创新发展。

## 二是要提振做好地方史志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确定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面完

成全省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国家和省上文件规定的任务是我们工作的责任书和军令状,也是文化建设的硬指标。到目前为止,全省第二轮修志任务中,省志完成41卷,占规划任务72卷的57%;市州志完成9部,占规划任务14卷的64%;县区志完成59卷,占规划任务85卷的69%。总体进展还比较缓慢。为扭转二轮省志编纂进展缓慢的局面,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开展了二轮省志编纂工作集中攻坚行动,全面加强志书编纂的督导力度,二轮省志编纂进度明显加快,但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工作依然处于不紧不慢的一般化状态。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要立足实际,认真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不断推动地方史志系统和修志人员提振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强化行动自觉,以强有力的工作措施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着力做好资料搜集、志稿编纂各项工作,切实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甘肃地方史志系统的落地,确保二轮修志任务在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

## 三是要切实增强志书的生命力。

志书质量是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活力所在、价值所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各级修

志部门要把质量意识贯穿到修志工作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要注重调查研究,科学运用资料,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记载历史。要加强修志理论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借鉴成功做法和经验,并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志书编纂,以提高志书质量。要树立精品意识,努力把志书打造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书”“信史”。

甘肃最大的优势是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旅游产

业应当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用好。请全省各级修志部门认真结合对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全新的视野和视角审视我们的工作,梳理、挖掘具有典型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文化经典内容,做一些符合时代特色、中心工作、创新与现实意义相结合的工作。



#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张军利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编)

**编者按:**2018年1月17日,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上,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张军利结合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实际,总结了2017年各项工作,安排部署了2018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主要任务,奋力推进全省地方史志事业上水平作了讲话,现予摘刊,以供学习研究。

这次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十三次党代会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实际,总结2017年各项工作,安排部署2018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主要任务,奋力推进全省地方史志事业上水平。

## 一、2017年全省地方史志事业主要工作进展情况

2017年,全省史志工作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为指针,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十三次党代会部署和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志书编纂、年鉴编辑等重点工作,圆满完成了全省史志工作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理论武装,整肃机关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一年来,全省地方史志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强化理论武装,整肃机关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和促进了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一是抓理论武装。充分利用党组理论中心组、党支部

“三会一课”、干部职工政治学习等制度和形式,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学习研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思践悟,树牢“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把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编史修志的根本遵循,增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二是抓整肃机关作风。以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省委“转作风、抓落实”、省纪委“三纠三促”专项行动为契机,紧密结合全省史志系统思想工作实际,针对少数单位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缺乏事业心不干事、缺乏工作能力不会干事、缺乏紧迫感不能干事、缺乏责任心干不好事等问题,完善制度抓规范,见人见事抓转变,集中解决“懒、散、慢、拖、低、误”的不良作风和消极现象,调查处理了一些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悖的典型事例,整肃机关纪律作风,弘扬新风正气,浓厚了抓党建、转作风、促业务的氛围,全省史志系统和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三是抓廉政建设。党组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与各项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同部署同落实同

检查,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措施;新修订《巡察工作实施办法》《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财务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等10项规章制度,紧盯廉政风险点,坚持抓早抓小抓细抓常,严格要求业务人员廉洁修志、廉洁办事,预防和杜绝了违反廉洁纪律问题的发生;检查梳理出不担当、不作为以及弄虚作假3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及表现十数条,建立问题清单和工作台账,逐个限期整改销号,一些问题已经整改到位。

(二)开展集中攻坚,狠抓志书编纂、年鉴编辑进度和质量,彻底改变了二轮志书编纂严重滞后的局面

针对二轮志书编纂进度严重滞后等突出问题,全省各级史志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紧盯到2020年全面完成二轮志书修编和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的“两全”目标,采取超常规措施,集中力量攻坚,重点业务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二轮志书编纂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年完成省志编纂19卷,相当于2004年到2015年12年间完成省志编纂16部的119%。截至目前,累计编就省志分卷45卷,占规划任务72卷的63%,彻底改变了二轮省志编纂严重滞后的局面。市(州)志已完成编纂或形成初稿13部,占规划任务14部的93%。县(市、区)志已完成编纂或通过评议61部,占规划任务85部的72%。预计到2018年,二轮省志编纂将完成规划任务的80%以上。二是地方综合年鉴编辑进度进一步加快。《甘肃年鉴》实现了当年编辑、当年出版发行,为领导机关调研决策提供了即时服务。全省14个市(州)中,开展年鉴编辑工作的达到13个,占93%。86个县(市、区)中,开展年鉴编辑工作的达到71个,占83%。通过强化措施,分类指导,有望到2020年实现“一年一鉴”的规划目标。三是史志信息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甘肃史志》刊物的数字转换、刊文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促进了读志用志和地情研究。甘肃地方史志网在去年实现数字转

换0.9亿字的基础上,今年累计实现数字转换3.1亿字,完成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和二轮部分省、市、县三级志书、年鉴、旧志、地情资料上传共382部,并实现了全文检索,累计浏览12万多人(次),省级数字方志馆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市县网站(网页)建设速度加快,全省14个市(州)、50个县(市、区)开通地方史志网站或开设了专门网页。率先在全国制定并实施《甘肃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规划(2016—2020年)》,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好评。四是地情资料编研及旧志整理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一年来,全省史志系统围绕宣传推介本地经济、文化、旅游等优势,编辑出版了一批地情资料;围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整理出版了一批旧志;围绕加强历史文化研究,形成了一批独具甘肃特色的研究成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点校整理的清乾隆《甘肃通志》、编著的《甘肃史地考述》进展顺利。

一年来,我们在全力推进各项业务工作的同时,注重提升业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坚持每月举办一次业务研讨会,先后举办全省志书编纂业务和年鉴编辑业务培训班,培训业务骨干400多人(次)。积极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任务,动员和组织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脱贫致富实践中,增进了与基层群众的感情,接受了实践培养锻炼。

(三)工作体会和存在的差距

在一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各项业务工作顺利开展的坚强保证;只有“严”字当头,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才能为解决工作难题、推进事业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坚持抓作风建设不放松,持之以恒转作风、抓落实,是建设过硬班子和过硬队伍的重要抓手;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纠正不担当不作为的作风顽疾,不断弘扬清风正气,才能为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不竭动力。坚持修志编鉴的正确指导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史志事业生命力之所在;只有坚持志鉴为经济社会事业大局服务,才能充分发挥好史志事业“存史、资



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加强能力建设,努力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史志队伍,是促进事业发展的人才保证;只有抓基层、打基础、强素质,才能多出快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力作。不断推进创新,以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促进工作上水平的成功途径;只有大胆创新,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才能创造出优异业绩。尽管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差距,主要表现是:全省二轮志书编纂工作任务还很繁重,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抓进度、提质量;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距离“一年一鉴、公开连续出版”的规划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强化指导,赶上进度;全省三级修志队伍业务能力和编研水平还不高,需要进一步培训提高;史志队伍的工作作风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树牢“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意识,抓作风,提素质,培养造就一支作风过硬、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修史编志队伍。

## 二、2018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2018年,全省史志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十三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紧抓国务院《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任务目标的落实,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完成二轮志书修编和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的“两全”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努力开创地方史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是进一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

式,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修志编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严把志鉴政治关,多出快出精品志鉴。

二是继续转作风、抓落实,提高方志编纂、年鉴编辑水平。按照省委要求,紧密结合全省地方史志部门思想工作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治理“懒、散、慢、拖、低、误”等不良作风,努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干不干”“会不会”“能不能”“好不好”等问题,倡扬清风正气,形成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加快二轮志书编纂和地方综合年鉴编辑进度,提高志鉴质量。

三是坚持不懈抓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廉政教育,强化制度约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排查廉政风险点,强化廉政监督,坚决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和消极腐败现象。坚持以勤政促廉政,全面落实岗位职责,强化绩效考核,为各项业务工作有效开展提供监督保证。

### (二)紧盯“两全”目标,抓紧抓好全年业务工作“两大重点、五项业务、一条保障”年度任务的落实

一是落实“两大重点”年度任务。一个是加快二轮志书编纂进度。省志编纂年内确保完成《邮政志》《残疾人工作志》《共产党志》《发展计划志》《民族志》《概述》《附录》《妇女工作志》《铁路志》《公路交通志》《环境保护志》共11卷编纂任务。省志编纂累计完成规划任务的80%以上。市(州)志编纂年内完成《天水市志》初稿,完成《临夏州志》《甘南州志》《张掖市志》评议、复审并力争终审。市(州)志编纂累计完成规划任务的100%。县(市、区)志要加快《山丹县志》《灵台县志》《岷县志》《榆中县志》《夏河县志》《靖远县志》《环县志》《徽县志》《广河县志》《武山县志》《泾川县志》《甘州区志》《红古区志》《卓尼县志》《麦积区志》《秦安县志》《甘谷县志》《张家川县志》《积石山县志》《宁县志》《武都区志》《礼县志》《文县志》《成县志》24部志书的编纂进度。县(市、区)志编纂累计完成规划任务的85%以上。积极完成名镇名村志书编

纂任务。另一个是年鉴编辑任务。省级综合年鉴要实现当年8月底前编就、10月底前出版发行到位的目标。市(州)综合年鉴要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发行的目标。强化对县(市、区)综合年鉴分类指导,实现一年一鉴编辑工作的要由目前的82.6%稳定达到85%,实现一年一鉴公开或内部印行的要由目前的76.7%稳定达到80%,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发行的要由目前的15.1%力争达到30%。到2020年实现所有县(市、区)一年一鉴、公开连续出版的目标。

二是落实“五项业务”年度任务。在抓紧抓好志书编纂、年鉴编辑“两大重点”任务的同时,积极主动开展好史志工作信息化、地情资料编研、地方史编写三项业务。一个是提高史志工作信息化水平。省级甘肃地方史志网的数字转换工作步入正常化,并及时跟进,全面完成当年新出版的省内地方志书、综合年鉴及各类有价值地情资料的数字转换和上传工作。加强网站管理和维护,确保网站安全高效运行。保持网站数字方志馆特色,扩大点击量,为决策咨询、学术研究、读志用志服务。市(州)史志信息化建设,要力争创办独立网站,与省级网站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努力扩大容量和服务面。县(市、区)史志部门要因地制宜,争取各方支持,创办特色突出、管理规范、容量较大的史志网或史志网页。另一个是强化地情资料编研工作。省、市、县三级史志部门要积极借鉴成功经验,围绕本地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研究编写各类有价值的地情资料,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宣传本地发展优势,发挥史志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再一个是积极推进地方史编写。努力开拓地方史及各类专史业务空间,使方志、年鉴与地方史相互补益、相得益彰,更好发挥服务功能。积极履行职能,把做好地方史及各类涉史作品的政治关、史实关。

三是继续推进“一条保障”措施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是加强各级史志部门自身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从推进史志事业长远发展的要求出发,积极主动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认真谋划好、实施好本地方、本部门的方志工作,抓

紧抓好《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贯彻落实。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把地方志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为地方史志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三)进一步加强史志部门自身业务建设,全面提高史志工作整体水平

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按照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紧密结合地方史志工作业务实际,制订和完善各项议事规则和规章制度,扎牢织密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事,规范各项工作管理,努力使史志部门在热爱事业、崇尚真理、端正作风、担当作为、埋头干事等方面当表率。

二要进一步提升素质。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方式,组织引导业务人员丰富知识、增长才干,提升业务素质 and 技能,努力培养具有远大理想、政治坚定、为人表率、博学多识、业绩突出的合格“史才”。

三要进一步提高志鉴编纂水平。坚持正确的史志工作指导思想,学习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略,增强“四个自信”,把握本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现状和主要成就,深入钻研业务技能,探寻编史修志的特点和规律,努力编就一批无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品志鉴,为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服务。

2018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指导思路和主要任务已经明确,现在关键是转变作风抓落实。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and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史志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担当作为,确保完成既定的年度工作任务,努力开创全省史志事业发展新局面,为顺利实现省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论方志文化自信

冀祥德 宋丽亚

**内容摘要:**通过梳理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志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自信重大命题提出的过程,系统研究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础、内涵与价值,首次提出方志文化自信的概念。方志文化自信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根植于方志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资料性、权威性的基本属性。方志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是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主体层面对方志文化确信和肯定的一种稳定心理特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大背景下,提出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要探寻方志文化在我国几千年的源流,遵循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规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实现,从主观和客观方面规划设计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路径。以方志文化自信为逻辑起点,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过程中,方志文化应当发挥引领作用,率先走向世界舞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之后,方志文化要勇敢担当,站在世界文化舞台中央。

**关键词:**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 方志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sup>[1]</sup>。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不仅在璀璨的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据独特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提升到同等重要位置后,学术界关于文化自信的理论研究成为热点,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首次提出方志文化自信概念,并就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何有方志文化自信、何为方志文化自信、何需方志文化自信,以及如何建立方志文化自信等问题作系统论述。

## 一、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以及文明的影响力、扩张力、号召力都与国家的国力、民族的强弱息息相关。“每一次文化自信的提振,都伴随着国家的强盛。”<sup>[2]</sup>汉唐盛世,国家统一,民族融和,中华文化自信呈现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领世界文化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西方文明成为主导文明,欧美人普遍认为西方的“光”普照全球,西方标准成为普世标准。而中华民族则国力衰退,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落后挨打的历史动摇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虽然现代新儒家,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无论出于“他觉”还是“自觉”,对中华文化持肯定态度,认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苏”<sup>[3]</sup>,但是“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潮在部分国人中间滋生蔓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近年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可度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自信的提出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更加频繁,文化的作用日益凸现。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对称,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话语权还有待加强。在新的世界形势与国际背景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必然要求。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当是时代的必然。

###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党中央从对世情、国情、党情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中,不断深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提出了“文化自信”,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sup>[4]</sup>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sup>[5]</sup>第一次明确要求要“培养高度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重要意义,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sup>[6]</sup>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

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念自信”。<sup>[7]</sup>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sup>[8]</sup>12月20日,在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提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sup>[9]</sup>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sup>[10]</sup>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sup>[11]</sup>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号召“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sup>[12]</sup>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之后,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正式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与“三个自信”同等重要的位置。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sup>[13]</sup>这再次明确了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笃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

###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

地方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系

统地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历经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方志编修中,培育形成的方志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独具特色、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方志文化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是中华文化的丰富滋养。随着文化自信重大命题的提出,方志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也是题中之义,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是对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对方志学理论的又一次提升。

一方面,地方志海量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方志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提供基础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仅宋元以来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就有8000余种,10多万卷,约占全国现存古籍的1/10,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sup>[14]</sup>这些旧志“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sup>[15]</sup>。新编地方志工作大规模开展以来,全国首轮、二轮修志共出版三级地方志书820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4万部,地情书1万余部等等,<sup>[16]</sup>形成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这些文献忠实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新中国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最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最直接的精神纽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优秀革命文化和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英国学者伟烈亚力曾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sup>[17]</sup>所以,方志文化自信是在强化

中华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以地方志海量文献为物质保障,以地方志文化的独特性为依据,以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提出的。

另一方面,方志文化自信缺失是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首先,作为用方志的大户——学者们对方志文化不自信。梁启超直接指出:“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sup>[18]</sup>部分学者认为方志“大半成于俗吏之手”,虽然不乏精品,但是难登大雅之堂。他们认为方志文化的价值在于:“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面无复遗,尤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信息。”可见,学者们虽然重视方志的资料价值,但是忽视其实用价值,甚至低估了方志文化的价值。其次,作为编纂地方志的专业人士——方志人对方志文化也没有形成普遍的自信,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存在方志文化自馁。主要表现在对方志价值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方志事业缺乏信心与热爱,对方志文化在文化强国的战略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缺乏清醒认识或者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内在的、强大的、支撑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再次,社会公众对方志的认识与了解更是与方志的社会功用、价值不对称。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地方志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家喻户晓的公众意识。<sup>[20]</sup>社会公众对方志缺乏认识,对方志文化没有概念,更不用提对方志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文化心态。所以说,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就是针对“方志文化缺失”“不自信”的存在,有着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础

方志文化是指人们在方志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收获的总和,所以,方志文化

自信必然有其坚实的生成基础,方志文化自信必然根植于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属性。

### (一)方志文化的民族性

审视世界不同文明的源流演变,只有中国,建立了专门机构,并以官修的方式,志书的形式,把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状况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来,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力托在《中国方志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一文中说:‘自宋以来,方志在形式上和内涵上的一致性惊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没有长期一致的文体,即使一国中的一致性也没有,……而方志的形式则千年未变。’我们一直认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良传统。”<sup>[21]</sup>所以说,方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具有民族性。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方志文化民族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其世界舞台上的价值。以美国为例,其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地方志的重要价值,在民国时期就有目的的大量收集中国地方志。国会图书馆1916年派施永格到中国大量收集中国旧方志,1928年设立东方部,继续主动派人深入中国各地收藏中国旧方志。美国对中国旧方志的收藏从最开始的收藏各省大行政区域的方志为主,到慢慢开始收集小的行政区域的方志,遍及各个省、市、县、镇的方志。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旧方志达4000多种,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3858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5558种,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收藏5193种,等等。<sup>[22]</sup>对于新方志,美国也充分肯定其价值。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曾这样介绍:“对于中国现在编修的各种新志,特别是对一些小型志敞开收藏,‘不管什么志书都收’,‘见一本买一本,不管它是什么内容’,不管是定稿还是未定稿,都要注意收藏保存,特别是未定稿,很多是用金钱无法购买得到的。”<sup>[23]</sup>可以说,方志文化是典型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是能够代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

### (二)方志文化的地域性

方志,所记都有一定的空间位置,明确的地域范围,无论记事、记人、记物,都离不开一方之地。<sup>[24]</sup>清嘉庆《上海县志修例》规定,修志“皆以地断,以一地为限”。新方志编纂也大都恪守“越境不书”的原则。正如仓修良所说:“地方性可以说是地方志主要的特征。因为方志从他产生之日起,就是以专门记载某一地区史实为职能的一种著作。”<sup>[25]</sup>所以,方志特定的记事空间范围决定了方志文化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中华民族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每个地区都有其特点,有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开发时间、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面貌等诸多不同。方志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分门别类、全面系统地加以记载,从而反映这些不同。<sup>[26]</sup>葛剑雄在《筑桥镇志·序》中对此有深刻的解读:“就宏观而言,筑桥作为一个千年聚落,又处于中国近千年来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不仅积累了大量地方史料,还由境内的遗址遗物和口耳相传保留了很多未见于其他记载的资料。”“就微观而言,某些在全国、全省、全县未必能有详细记录的事物,在《筑桥镇志》却因其在本地所占的重要地位、所起的关键作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得到最大篇幅的记载,留下最详尽的资料。”<sup>[27]</sup>所以,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域性是方志文化的基本属性。

### (三)方志文化的包容性

方志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常变常新。梁启超指出,方志“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日趋于简,其所叙述范围,则由俭而日扩于丰,此方志进化之大凡也。”<sup>[28]</sup>从体例体裁看,方志由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谱牒、文征七类“分地记载之著作”,到“隋唐以后,则糅合诸类斟酌损益以为体例也”<sup>[29]</sup>。即到宋朝,方志定型。元明时期,制定一统志凡例,体例逐渐规范化,清朝体例成熟。

从内容上看,方志从地理、历史、文学的交融,逐渐到荟萃地理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各类学科知识,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涵盖自然、人文等百科各业,“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物、艺、文、金石、古迹”<sup>[30]</sup>。方志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方志兼容适应规律”<sup>[31]</sup>,也凸显了方志文化的兼容并蓄,即包容性。

方志文化能容纳、吸收多元文化,与区域内的农业文化、商业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等单一文化相比较,就呈现出多元化、全方位、综合性的特点。有学者指出,方志文化“就展现中国文化的历史长卷和文化风貌,和丰富地方文化及社会史的内涵方面,任何其他文献都是无法与其比拟的”<sup>[32]</sup>。可以说,正是方志文化的包容性,才使其不仅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独放异彩。

#### (四)方志文化的功能性

地方志编纂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方志有现实的实用价值,“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sup>[33]</sup>。方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积淀而成并突显出来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功能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历代方志学者编撰志书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东晋常璩在所撰的《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中指出:“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sup>[34]</sup>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地方志书“事关兴替,理切安危”,明确编写《元和郡县图志》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sup>[35]</sup>宋代郑兴裔为《广陵志》所写的序中直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sup>[36]</sup>之后元、明、清修一统志,也是有其现实的功用,为了达到“上下相维,以持

一统”,突出地方志“系于政而达之于政”的特点<sup>[37]</sup>。自古到今,地方志工作者编纂志书的目的突显了方志文化“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价值。

其二,中外知名学者大规模使用方志。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出“方志时期”(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间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化的情况。屠呦呦从东晋葛洪编著的《肘后备急方》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从而获得灵感,提出了抗疟疾单体“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据不完全统计,从我国翻译海外汉学研究著作中,近60年来就有孔飞力等20多位美国学者出版了专著,使用了旧志(不含新志)550余种。<sup>[38]</sup>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作为方志“大用户”,成果丰硕,影响力巨大。他直接指出,在《纵乐的困惑》《秩序的沦陷》等书关注江南地区,就是因为江南地区留有许多笔记和地方志。<sup>[39]</sup>日本学者利用方志进行科研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方志文化的研究价值以及世界影响力。

其三,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清初,顾炎武就通过《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编写,开辟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方志在规划编制、旅游开发、环境治理、人口控制、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等各方面切实发挥了“参谋”“资治”的作用。例如,上海至新疆伊宁的312国道的线路走向,是修志工作者从旧志古驿道的线路走向的信息中,分析得出并被国家交通部门采纳的。《黄山志》于1985年编纂完成,在黄山申报并获准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主编刘秉生利用该志资料,只用40天时间就完成了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蓝皮书,使得黄山成了世界级知名度的风景名胜区。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北川县城重建阶段,中国城市规划研究规划设

计院通过北川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乾隆《石泉县志》、道光《石泉县志》、民国《北川县志》和新编《北川县志》拟订北川新县城四个备选地址,等等。由此可见,方志文化确实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

#### (五)方志文化的资料性

地方志是通过特定的体例体裁,按照存真求实、横排竖写、述而不论、详今略古、详新略旧等编纂原则,记载一定区域内的建置疆域、自然环境、历史沿革、职官典制、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文化艺术、政治军事等,是“一方之百科全书”、“一方之通史”。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言,“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sup>[41]</sup>。所以,方志文化的第一属性就是其资料性,它决定和影响方志文化的其它属性。

首先,方志文化的资料性体现在记述内容上。“他凡郡之所有,事无巨细,莫不皆然。”<sup>[42]</sup>“志之为体,当详于史”<sup>[43]</sup>,司马光视地方志为“博物之书”,在为《河南志》所写序言中说:“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优,无不备载。考诸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sup>[44]</sup>其次,方志文化的资料性体现在体例体裁的运用上。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的综合运用,“实现了综析有度,经纬分明,首尾相顾,多姿多彩的有序排列与合理交织”<sup>[45]</sup>,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志书内容,即志书的资料,凸显了方志文化资料性特征。再次,方志文化资料性的特征体现在志书的编纂原则上。例如横排竖写原则,即方志横排门类,确保资料的广泛;纵向记述,确保各个历史时期资料的连续,没有断线。述而不论原则,即寓观点于资料之中,没有主观的评论、判断,确保资料的真实、客观。详今略古原则,突出“以当时人、当地人而修当地的历史”<sup>[46]</sup>,确保最大限度记录当下历史,保存资料。正是有了这种方志体裁及编纂原则,才使各地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资料得以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

#### (六)方志文化的权威性

“志属信史。”<sup>[47]</sup>方志学者“调集数百家谱牒,经极详慎之去取别择,而得其经纬脉络……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呕心血铸成……征引之书,不下四五百种”<sup>[48]</sup>,“其间一事一物,皆酌考众书,厘正讹谬,然后落笔”<sup>[49]</sup>,非常重视搜集史料,辩证史料,以确保志书资料的真实可信。同时方志工作者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sup>[50]</sup>,以确保志书质量,从而保证志书的可用性、可信性。方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具有了权威性。

方志文化的权威性还表现在方志的“官修”传统,志书的“官书”性质。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大,国运昌盛,确立史志官修制度,打开了官修志书的新局面。宋代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设立了中央地方志机构。明清时期编修地方志逐渐形成制度,朝廷多次颁布诏令,对志书编修做出规定,清雍正六年(1728),颁布修志上谕,要求各省编修通志,“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sup>[51]</sup>,书编好后报送一统志馆,以便增辑成书。民国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政府也多次颁布修志政令,管理修志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台规范性文件,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发布《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建立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提出依法治志,从而确保了地方志的权威性。志书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可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依据,可以帮助重现历史,确定位置,划定标识,体现了方志文化证据性的特征。可以说,方志文化的功能性源于其权威性。正因为此,方志文化有了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价值和功能。

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资料性、权威性彼此交融,相互作用形成了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属性和独特魅力,成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库、知识宝库、智慧宝库，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最灿烂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瑰宝，成为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础。

###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内涵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sup>[52]</sup>方志文化自信就是方志文化主体对方志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度认同，对方志文化价值、意义的充分肯定，对方志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对方志文化建设的勇敢担当，对方志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自信提供最基础、最深厚、最广泛的滋养。

#### (一)方志文化自信的宏观内涵

从宏观来讲，方志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对方志文化价值层面所拥有力量的坚强信心和充分肯定，对方志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还专门就加强修史修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sup>[53]</sup>。李克强总理近两年来对地方志工作作了三次重要批示，其中“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明确了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定位；“直笔著史，彰善引风气”，明确了当代地方志工作者的定位。刘延东副总理两次接见全国地方志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sup>[54]</sup>。2016年5月12日，王勇国务委员出席《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密集地就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发表重要讲话，足见党和国家对方志文化地位的高度认识，对方志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方志文化发展规律，科学谋划地方志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充分肯定了方志文化功能。2016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修史修志”，将地方志工作全面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工作任务，肯定了方志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作用。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再次肯定了方志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科学把握了方志文化发展道路。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强调“加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修，加强地方史编写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之中，肯定方志文化在我国文化建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的出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分析当前形势，对于方志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认识，从国家层面凸显了方志文化自信。

####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中观内涵

从中观来讲，方志文化自信是包括全国地方志系统在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方志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认同、信任和坚守。其一，方志系统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职业认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具体表现为，一是方志系统对自身文化所形成的共识。在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了解自身文化的特性，熟悉发展的历史，明确发展方向，把握发展规律，对自身生命力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有“放眼世界的自信、担当和追求”<sup>[55]</sup>。在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的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不可一世；也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理解并认同

方志文化的深刻内涵,把握方志文化的独特性,明确方志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功能,尤其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二是方志系统对方志事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当前地方志正在从“一本书”向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转型,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的转型,从依法修志向依法治志转型。<sup>[56]</sup>明确地方志事业发展前景以及地方志事业在国家文化强国建设战略中的特殊位置,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对地方志有高度的职业价值认同,职业价值自信。

其二,其他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方志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积极态度、对方志文化功能的认可信赖等。具体表现为:一是对方志文化的正确认识。方志文化延绵数千年,不仅有志书年鉴等海量物质成果,有法规、准则、条例等制度成果,还有在数千年修志过程形成的秉笔直书、经世致用、务实奉献、改革创新、团结协作等精神成果,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有着当代价值和恒久魅力。二是对方志文化“存史、资政、教化”功能的高度认可。因为方志文化与生俱来的资料性、地域性、功能型、权威性,使方志文化的价值、功能不仅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化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方志文化功能价值的特点主要有:适用范围广,有助于决策、研究、兴利、教育、发展经济等等;适用群体多,各行各业,无所不包;社会经济效益高,影响大。所以,这就是对方志文化功能价值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尊奉、坚守和虔诚”。

###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微观内涵

从微观来讲,方志文化自信是包括方志人在内的每一个社会个体对方志文化价值的认同,是个人在方志文化上“增进自我、扩展自我”<sup>[57]</sup>的表现。其一,方志人对自身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方志文化建设的勇敢担当。具体表现为,一是方志人在地方志事业上认同自我、发展自我、繁荣自我。方志人作为方

志文化的主要建设者、创造者、传承人和记录者,明确自身定位,坚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将方志事业发展、方志文化建设与个人价值取向有机融合,将文化自信、方志文化自信与自我身份认同有机融合,将方志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文化强国建设与个人自身发展有机融合。二是方志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一种主体性心态的自然呈现。方志人在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主动担当,积极探索,有所作为;在不被人关注的岗位上,默默坚守,甘于奉献,锲而不舍,笔耕不辍;在遇到挫折时,勇于承担,积极寻求破解难题方案,“把纂修方志作为见用于时,实现自己理想的有为之事,即使身处逆境或面对艰难困苦,坚持修志不倦,甚至奉献毕生精力”<sup>[58]</sup>。

其二,其他社会个体、社会公众对方志文化的积极态度和价值诉求。具体表现为,一是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和家喻户晓的公众意识。志书不能“束之高阁”,方志文化也不能成为“精英文化”。方志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方志文化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有机结合,是能被社会公众所认识、所了解、所使用,从而进一步推进方志文化,成为潜在的方志人。二是主动在方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方志文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可谓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潜在群众基础的文化。方志文化的特性,尤其是方志文化的资料性、地域性、功能性和权威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能在方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 四、建立方志文化自信的价值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大背景下,提出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方志文化确信和肯定的一种稳定心理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方志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

博大精深的方志文化以其独特的资源性、功能

性、权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正如马光祖所说:“忠孝节义,表人材也;书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sup>[60]</sup>要实现方志文化的价值,就应有足够的方志文化自信,为其提供“思想价值资源和心理依托”,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方志文化的基本属性是地域性,可以说,方志文化来源于地域文化,又滋养了地域文化,打造属于一方水土的专有记忆。宋代陆游在嘉泰《会稽志》中写到,“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sup>[60]</sup>,明确指出编修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乡邦人士爱乡的热情。今天绍兴人读《会稽志》,自豪感油然而生。方志文化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爱乡爱国热情,投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以说,方志文化凝聚了实现中国梦的人才力量,方志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sup>[61]</sup>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蕴含着方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方志文化自信为方志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养料,赋予其勃勃生机。所以说方志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 (二)方志文化自信致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sup>[62]</sup>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早已吹响。方志文化以其独特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方志文化自信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其一,有助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有助于应对世界多元文化冲突与碰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突出道德价值作用。而方志文化作为“伦理政治型文化”,几千年的方志文化发展史强调的就是血缘亲情、人伦关系、忠君爱国、人际和谐;仁政、德政,以礼治国;道德修身,奉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理想。<sup>[63]</sup>方志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方志文化自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力量。

其二,有助于提高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上有天然优势。方志文化自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一方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另一方面也是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动力基础。

其三,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sup>[64]</sup>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主要通过走出去展示中国理念、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来形成。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最有民族性的方志文化,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播中华文化基因、展现全新的中国,可以为世界文化注入新的理念、新的血液。这必然要求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增强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

## (三)方志文化自信引领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然要求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全面升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的自

觉引领行动的主动,方志文化自信是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巨大精神动力,事业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只有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方志文化,才能在行动上有所作为。例如,各级党委政府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主动落实“一纳入、八到位”,即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才能抓住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牛鼻子”,解决发展的后顾之忧。地方志系统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把握住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文化命脉,进一步深入挖掘方志文化价值内涵,阐发方志文化精髓,激发方志文化的升级与活力,主动推进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才能主动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发展合力,把国家文化战略中对地方志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现实,在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实现地方志事业的价值。方志人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激发对方志事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推进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增强自我价值主动性;也才能在实践中克服得了困难,耐得住寂寞,能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干劲投入地方志工作。

### 五、方志文化自信建立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方志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探究方志文化自信建立的路径就成为迫切的时代课题。总体来说,要探寻方志文化在我国几千年的源流,遵循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规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实现,从主观和客观方面以规划设计。

(一)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源于对方志文化的深刻认知

“文化自信的发生,源于对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当代文化、未来文化的认知和把握,缺乏对于自身文

化的历史洞察、现实认同与未来憧憬,文化自信无从发生,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发生的前提。”<sup>[65]</sup>方志文化自信建立的前提,就是方志文化自信主体立足历史与现实,厘清方志文化的根源,明晰方志文化的发展脉络,掌握方志文化时代内涵,尤其是要充分认识方志文化特性,把握方志文化发展规律,明确方志文化发展目标,以及坚定方志文化自信目标实现等。通过这一认知过程,方志文化自信主体才能形成对方志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形成方志文化自信。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对方志文化发展的科学把握

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方志文化大繁荣的根本,是方志文化自信主体培养高度方志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主心骨与指南针。<sup>[66]</sup>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戒除方志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方志文化,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方志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政治理论保证。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对传统方志文化不忘本,要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特点推陈出新;对外来文化要兼容并蓄,既要广泛吸纳有益滋养,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也要包容文化差异,更要辩证取舍外来文化,坚决抵制糟粕。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根植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

方志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来自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方志文化自信来源于方志文化,又推进方志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所以,方志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就是方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方志文化的载体——方志事业的科学全面发展。当前,地方志事业虽然处在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但是不得不承认其硬实力还是不够,其所承载的方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实力及影响相比,还未达到所应有的高度,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繁荣

发展任重道远。要通过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提升方志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提高方志文化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增强方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进而建立方志文化自信。

#### (四)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依赖方志文化的传播影响

方志文化自信的构建不仅仅是建立在对方志文化的认知,还有经过比较、反思、批判、认同等一系列过程才逐步形成的。换句话说,没有宣传难以形成方志文化认知,没有交流难以形成科学的方志文化认知。一方面,要加强中华民族几千多年来方志文化历史与优秀方志文化成果的宣传教育。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地方志成果,推动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推动城乡方志文化建设,培育地方历史记忆,引导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方志、了解方志,从而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加强方志文化对外交流,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畅通交流渠道,拓展交流范围,在交流过程中,充分展示方志文化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增强方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方志话语体系,扩大方志文化话语权,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建立理性、健康的方志文化自信。

#### 六、结语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方志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不仅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还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国情、地情的切入点”<sup>[67]</sup>;不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作用,而且在世界文化之林也占有独特位置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影响力。方志文化自信也因其独特魅力和价值,有了建立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全球化后,方志文化走出去已经势在必行。正如鲁迅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sup>[68]</sup>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过程中,方志文化

作为中华文化中最独特、最有价值的代表,应该也必须有所作为。方志文化要发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引领作用,当好领头羊,率先走向世界舞台。要凝聚方志力量,讲好方志故事,让更多体现方志文化特色、具有竞争力的方志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方志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之后,方志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最有根基、最有借鉴意义的代表,应该也必须勇于担当。方志文化要通过扎根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各种资源,构建有方志魅力、中国魅力的文化话语体系;要通过树立方志文化自信,推广传播中国方志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当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之后,中国方志文化应当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 [2] 王静:《试论文化自信的四维根基》,《天府新论》2012年第3期。
- [3] 张杰客:《文化自信生成于中国近代哲学视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5日第2版。
- [4]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2版。
- [5]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 [6] 曲青山:《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
- [7]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 [8]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4版。

[9]杜小杜:《(我在现场)习近平给澳门学生讲文化课》(2),人民网2014年12月21日。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1]《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第1版。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1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

[14]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下),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946页。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6]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2016年11月份对全国地方志系统工作进展情况的统计。

[17][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44~45页。

[1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581页。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十五卷),第4581页。

[20]冀祥德:《论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5期。

[21]仓修良:《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84页。

[22]王晶晶:《60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旧方志整理、研究与利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23]《中国地方志专业考察团赴美国、加拿大考察报告》,《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6期。

[24]丁剑:《再论志书的地方性》,《黑龙江史志》1987年第1期。

[25]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78页。

[26]丁剑:《再论志书的地方性》,《黑龙江史志》1987年第1期。

[27]筑桥镇志编纂委员会:《筑桥镇志》,中华书局,2016年。

[28]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79页。

[29]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278页。

[30]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宝树园文存》卷2,中华书局,2011年,第184页。

[31]梁耀武:《方志学研究中的规律认识》,《黑龙江史志》1998年第6期。

[32]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3]梁启超:《龙游县志序》,《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336页。

[34](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1999年,第200页。

[3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36](宋)郑兴裔:《广陵志序》,《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7~218页。

[37]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38]王晶晶:《60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旧方志整理、研究与利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5月。

[39]郑诗亮、尹敏志:《上海书评:卜正民谈〈哈佛中国史〉》,澎湃新闻,2017年1月15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9785](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9785)。

[40]梅森:《方志学简论》,黄山书社,1997年,第67页。

[41]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文集序》,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42](明)黄仲昭:《邵武府志序》,《未轩文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2页。

[44](宋)司马光:《河南志序》,《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65卷,《四部丛刊初编》0841,商务印书馆影印,1926年。

[45]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下),第960页。

[46]林天蔚:《地方文献论集》下册,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943页。

[47](清)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8页。

[48]梁启超:《龙游县志序》,《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336页。

[49](北宋)赵 :《成都古今集记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248页。

[50](清)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6页。

[51]《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中华书局,1985年。

[5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5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5日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将史志编修工作提升至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2015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协调各地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扶持民间研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要求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抗战研究上发挥应有作用。

[54]刘延东副总理2014年4月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参见《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11月,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上报的《当前全国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情况报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住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好形势,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地方志事业迈上新台阶;2015年1月又就编制《规划纲要》作出重要批示;2015年12月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参见《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55]刘林涛:《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56]冀祥德:《论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5期。

[57]刘林涛:《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58]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59](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315页。

[60] (宋)陆游:《嘉泰会稽志序》,《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712页。

[6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186页。

[6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186页。

[63] 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6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65] 黄晓波:《论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科学

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66] 刘芳:《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战略考量》,《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

[67] 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68] 鲁迅:《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作者: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 《金昌市志(1992—2010)》出版发行

2017年12月22日,《金昌市志(1992—2010)》首发仪式在金昌市会议中心举行。中共金昌市委常委、副市长寇虎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周国信,市政协副主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杨智勇出席发行仪式。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李振宇应邀出席。

《金昌市志(1992—2010)》自2011年初开始编纂,当年完成征求意见稿。2014年12月召开由省、市参与审稿的领导、专家代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近70人参加的评审会。2015年9月通过复审,12月通过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

《金昌市志(1992—2010)》是1995年版《金昌市志》的续编,全志共设25编、123章、600节,共160余万字,图照200余幅,该志主要记述1992至2010年间金昌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志书编纂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严格遵循“一评三审”程序,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新编二轮志书。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孔令奇供稿)



# 霍去病与皋兰山考

华丹 陈谦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汉大将军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年18岁即率800精骑深入匈奴漠北腹地,斩杀匈奴兵2028人,并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籍若侯产及相国、当户等将官多人,生擒单于叔父罗姑比,出奇制胜,勇冠全军。此后,随着西汉与匈奴战争的白热化,霍去病3次出击匈奴,屡立战功。尤其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第一次出征河西走廊,是汉匈战争史上的重大战役之一,亦是中国历史及中西交通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此战的胜利,使西汉王朝夺取并控制了河西走廊,不仅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的,而且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4岁。汉武帝特地命人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形状象祁连山的坟墓,并发动陇西、北地等五郡的民众,身穿黑甲,将霍去病的灵柩从长安护送至墓地安葬。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

皋兰山,位于兰州市区南侧,最高海拔2170米,西起龙尾山,东至老狼沟,形若蟠龙,“高厚蜿蜒,如张两翼,东西环拱州城(今兰州城),延袤二十余里”。《隋书·地理志》说:“金城郡,置总管府,统金城、狄道二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说:“隋,开皇元年立兰州置总管府,取兰山以名。”兰州及兰山之名由此见诸名籍。

将霍去病与皋兰山联系起来,只因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所引诏书中“麇皋兰下”的记述。后世学者在确定皋兰的位置时,有的认为就是今兰州的皋兰山,如清初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輿纪要》记载“皋兰山,州南五里,州之主山也。山下地势平旷,可屯百万兵,《汉书》‘屯兵皋兰山下’,即此。山峡有五眼

泉,相传去病屯兵时,士卒疲渴,以鞭卓地,泉涌者之,隋因以山为州”(隋朝的时候,取皋兰山的“兰”字为州名)。现代很多学者也都受此影响,在谈及霍去病河西战役时,或认为皋兰山在今兰州黄河西,或认为在兰州以南,几乎一致认定在兰州附近。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亦作如此标定。为了让兰州的皋兰山与霍去病联系上,甚至有的人硬是削足适履,生生臆想出霍去病离谱的出兵路线。如民国《皋兰县志》记载:霍去病西去后,突然回兵东进兰州,与匈奴大战于皋兰山下,大破匈奴。斩杀匈奴折兰王、卢胡王,“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杨重琦、魏明孔编写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轻骑万人,出临洮,在兰州渡过黄河,沿庄浪河北上,越乌鞘岭,进至焉支山,复回兵兰州,与匈奴军战于皋兰山下,获得大胜。河西走廊遂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皋兰之役,汉军神武,今兰州尚有去病在兰山著鞭出泉的传说。”

霍去病有没有到过今天的皋兰山,上述观点是否正确,首先需要搞清楚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的行军路线。关于霍去病第一次进军河西的路线,《史记》和《汉书》两书援引汉武帝诏书中记载的内容和文字基本相同。《史记·匈奴列传》叙述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事迹很简略,只言自陇西出,没明确说出终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所引武帝诏书里也未提及(不排除司马迁抄录时漏掉或在书成流传中缺失),诏书中在“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一句之后,就转而记述霍去病的战绩了。《汉书》相较于《史记》,记述则更为详细:

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

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骠骑将军率戎士踰乌盩，讨濊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輜重人众摄奢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麀臯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读懂这段文字，弄清几个地名、古称谓至关重要：

陇西是霍去病西征的起点。“陇西”一是指行政区划单位。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为陇西置郡之开始。汉因秦制，仍保留陇西郡的名称，《汉书·地理志》云：“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二是指陇山西面的地方。陇山，又名“大陇山”“六盘山”“鹿盘山”“鹿攀山”等，汉至唐代通称陇山，位于宁夏、陕西、甘肃三省交界处，北起今宁夏海原西华山，南经西吉、固原、隆德、泾源延入甘陕。山体南北走向，逶迤20余公里，宽30~60公里，是陕北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的界山，也是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

踰乌盩(li)，《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盩，音同戾，山名也”。《汉书》颜师古注：“踰同踰，盩，古戾字也，乌盩，山名也。”根据西北大学教授王宗维、西北师大教授黄兆宏考证，乌盩应是靖远县东南端的屈吴山，坐落于甘肃、宁夏两省交界地带，属祁连山东端余脉。

濊(su)濮(pu)也别作须卜，《史记·索隐》载：“崔浩云：匈奴部落名，它是匈奴的贵种。”《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呼衍氏、须卜氏常与单于婚姻。”又《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匈奴)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狐奴，《史记·集解》载：“晋灼曰：水名也。”据专家考证，狐奴即今流经武威市的石羊河。石羊河在汉代时称为“谷水”，《汉书·地理志》云：“(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谷水水源有五，即西营河、南营河、杂木河、黄羊河、古浪

河，上述诸水，在姑臧以南，水量不大，到姑臧附近，诸水汇合，水量增加，才成为一条较大的河流，《汉书》言“涉狐奴”正在此地。

五王国，具体名称因史籍缺载，难以

考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政权建立后，单于是最高的统治者，其下置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24长，他们分别统率军队，“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且“各有分地”(即各有被划定的游牧地区)。24长之下又各设置千长、百长、什长、体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属。单于及24长都是世袭的，单于由挛鞮氏继承，24长则由一些显贵氏族及家族世袭。都尉、当户、且渠等都是些中下级的带兵官，他们各以部众多少为区别权力大小及地位高下的标准。五王国可能指霍去病在西征过程中先后穿越过右部匈奴的五个王国或部落。

焉支山，《甘州府志》载：“焉支山，林木茂多，禽兽繁盛……为甘、凉咽喉。”焉支山也名删丹山、大黄山，位于今山丹县城东南50公里处。又名燕支山，因山北出产的越年生草本植物红花——燕支花而得名。用燕支花制成的颜料，又称胭脂。

臯兰，是霍去病西征的终点。关于“臯兰”一词，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是山名，有的认为是水名。东汉末年的应劭在《汉书音义》一书中称：“臯兰，‘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白石县在西汉时属于金城郡，然而查寻《汉书·地理志》，却无“臯兰水”的记载，白石县的塞外是“漓(一作离)水”，即现在的黄河支流、甘肃省中部的大夏河。苏林《汉书注》称臯兰：“匈奴中山关名也。”认为是一山名。颜师古《汉书注》亦持此说，但均未指明其方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对“臯兰”究竟为山还是水名在《水经注》中称：



漓水又东北，径石门口，山高险峻绝，对岸若门，故峡得厥名矣，疑即皋兰山门也。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骠骑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谓是山之关塞也。应劭《汉书音义》曰：“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关名也。”今是山去河不远，故论者疑目河山之间矣。漓水又东北，皋兰山水，自山左右翼注漓水。

郦道元在山名、水名两说之基础上，提出模棱两可的“皋兰山水”一说，认为其在漓水东北石门口一带，且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就曾至此地。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也称：“石门山，在县东北二十八里。山高险绝，对岸若门，即皋兰山门也。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即此也。”

从郦道元、李吉甫二人所述“皋兰”地理方位和里程来看，应在今甘肃临夏境内的大夏河流域。但《元和郡县图志》一书又云：兰州，隋开皇元年“置总管府，取皋兰山以为名”，此说颇令人费解，似乎今兰州、临夏两地均有“皋兰山”，然该书没有详加考证说明，或许李吉甫本人也未曾留意，故在叙及“石门山”时只是沿袭郦氏旧说。但不管怎样，由于其明确指出兰州得名于该地之“皋兰山”，从此学者就开始将“皋兰山”与兰州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霍去病此次进军河西与匈奴鏖战的皋兰山，既不在漓水即今大夏河流域，也不在兰州附近。首先不可能在大夏河流域。因为当时大夏河流域属于羌中地区，是西羌部落的驻牧地和地盘，不属于匈奴的地界。汉初西羌为匈奴控制，受其怂恿经常袭扰西汉西部边境，可以说与西汉处于敌对状态。霍去病征战主要方向是长驱直进河西，作战对象是匈奴，怎么会到陇西西北塞外的羌中去无端招惹西羌诸部，又怎会在此与匈奴军展开激战呢？其次，也不可能是在兰州附近。因为汉武帝时期兰州附近地区也不属于匈奴的地界。早在战国末期，匈奴趁秦扫灭六国之机，越过阴山，饮马黄河，占据河套以南地区。但秦始皇时期，蒙恬率30万大军击退匈奴后，开始修筑万里长城，其长城最西端终点就在陇西郡临洮（今甘肃岷县）。据考证，万里长城的西北段，起自今岷县西，

沿洮河向西北一直到兰州附近的黄河之滨，然后沿黄河而东，借助黄河天然险阻并连以障塞城堡，直至阴山与原赵阴山南长城之西端相接，从而构筑了一条较为坚实的西部边防线。秦末汉初，虽然匈奴又控制了河南之地，并不断侵扰陇西诸郡，但卫青在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重新夺回河套以南地区，其后又修缮了秦长城及沿河要塞，于沿线的重要军事交通要冲增筑了城障亭塞及列燧，凭藉黄河之险和长城之固，在汉朝西北和西部边疆筑起一道捍卫长安及关中地区的屏障。兰州黄河以南附近，已经被纳入西汉以长城为主轴的边防体系之内，匈奴军队如何能到这里来拦截霍去病的汉军呢？其实，对霍去病西征途中的“皋兰”是否是今天兰州的皋兰山，陇右学者张维就有怀疑。他在《陇右方志录》一书中指出，《汉书》说元狩二年春霍去病“麇皋兰下”的皋兰已“过焉支山”，与今天兰州市的皋兰山无关。可惜他未确定皋兰的具体位置。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指出：“去病鏖战之皋兰，去焉支山千余里，当今甘州之合黎山”。这种说法已获得现今史志学者的广泛认可。

在搞清楚以上几个地名、古称谓后，霍去病元狩二年（121年）第一次西征的路线也就清楚了，即霍去病这次西征路线是从陇山以西出发，越过屈吴山区，在今靖远县、平川区及景泰县相接的渡口渡过黄河，进入今景泰县境（即汉代的媪围县），并在此痛击匈奴贵种邈濞部，然后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渡过石羊河，穿越匈奴五王国辖区（即浑耶王和休屠王领地），经过了焉支山，在合黎山一带同折兰王、卢侯王领军遭遇，经过激战，“杀折兰王，斩卢侯王”，完成了元狩二年（前121）春季的西征，这次西征，历时六天。

有了霍去病第一次西征匈奴清晰的行军路线，兰州黄河南岸的皋兰山，与霍去病河西之战实在是没有任何关系，所谓“五眼泉”等更只是一个传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源于人们对霍去病威名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作者：①、②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 河西地理略考

郝树声 张德芳

## 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上)

悬泉汉简中,有一枚详细记载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的简牍(以下简称悬泉里程简),恰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的里程简(以下简称居延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里程表。对于研究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驿站设置和详细里程,以及对今天河西一些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简文是:

会松去鸾鸟六十五里  
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氏池去觶得五十四里  
觶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干齐八十五里  
干济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该简出自第二发掘区0214探方第一层。该探方出简1307枚,而第一层出简133枚,纪年简有西汉永始(3枚)、建平(2枚)、元始(10枚)和王莽居摄(1枚)四个年号。所记述的资料反映西汉末年成、哀和王莽时期的情况。简文分三栏,第一栏记述武威郡沿

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张掖郡的显美;第二栏记述张掖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酒泉郡的表是;第三栏记述酒泉郡沿途各县驿置里程,向西延及敦煌郡的渊泉。每一栏内容连贯,相对独立。本节仅就第一栏简文所涉及内容作一些考述。

该栏所涉及的五座县城,依次为仓松、鸾鸟、小张掖、姑臧和显美。仓松即西汉苍松,或认为,西汉苍松县后汉改为仓松县。其实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仓”“苍”二字是通用的。《诗·王风·黍离》“悠悠苍天”,《释文》“苍本亦作仓”;《史记·太史公自序》“张苍为章程”,《汉书·司马迁传》“苍”作“仓”;《汉书·严助传》“胶仓”,《艺文志》作“聊苍”。可见,简文中的“仓”、“苍”是通假字。汉简文字中,为简便起见,一些笔划繁多的字往往被省略了一个或数个组成部分,嘴字当属此类情况,书写时省掉了上部的“言”和“系”。小张掖,应为《汉书·地理志》所载武威郡属县张掖县,而非张掖郡。为使同张掖郡相区别,前面冠以“小”字,这在汉简记载中不乏其例。上述五县,从乌鞘岭北坡开始,由东南而西北,横贯两汉武威郡全境。

关于两汉苍松、鸾鸟、张掖、姑臧、显美等县的具体位置,后世史家多有研究,但都聚讼纷纭,迄今未有定论。两千多年前所建城市,很难一一与今天的故城遗址对应起来。尤其是那些当年建筑在绿洲农耕区的城市,今天除了继续沿用的以外,大多已荡然无存,如果一定要给两汉的每个县城指出一个今天的故城遗址,难免削足适履,张冠李戴。

居延、悬泉两处发现的里程简,属当时原始记载,简文清晰,里程确凿,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在此

基础上,踏实上述五县城具体位置,或可较接近于真实。为叙述方便,本文将简文次序略加颠倒,以姑臧为坐标,依次东南而张掖,而鸾鸟,而苍松,西北而显美,逐一加以论述。

### 一、姑臧

关于姑臧故城的位置,学界有三种说法:其一,在今武威城东北2里;其二,姑臧故城即今武威城西北2千米的金羊乡赵家磨村南的锁阳城;其三,即今武威城所在地。

第一种说法,最早见之于明代陈循等人所修《寰宇通志》。该书《陕西都指挥使司·古迹》载:“姑臧县城,在凉州卫城东北二里,汉置县,遗址尚存。”其后,《明一统志》、清顺治《凉镇志》、清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都延用其说。但近世以来,在武威城东北2里一直未能找到姑臧故城的遗迹遗物,况又缺乏早期文献依据,故此说可靠性令人怀疑,多为今人所不取。

第二种说法,见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并成所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书中认为,西汉姑臧故城即今武威市西北2千米的金羊乡赵家磨村南锁阳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东南迁至今天的武威市。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七年五月,即公元51年)“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李贤注曰:“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姑臧县西北,故凉城是也。”二是《水经注·都野泽》:“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径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两条材料均有“故城”一说,既然有“故城”,那末必有“新址”,因而当时的“新址”即沿用至今的武威城,而当时所指“故城”即为今城西北2千米处的锁阳城。

依此说法,尚有诸多疑点不能解释。首先,李贤的注文比较含糊,并未明言武威郡故城即为姑臧故城。依照常理,武威郡治如果是姑臧故城,下面的注文应是“姑臧故城是也”,相反却是,“故凉城是也”。这里就牵扯到“故凉城”即武威郡治是否一直在姑臧。如果不在姑臧,那末就如有些论者所言,武威郡

治始治武威,即今民勤县东北,而后才迁至姑臧,那末注文中的“西北”,倒可能是“东北”之误。其次,如上所言,如果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姑臧县城已由西北2千米的锁阳城迁至今天的武威市,李贤注《后汉书》当应有所交待,不能光讲“故城”而不讲“新址”。再说,不论姑臧县城是否东迁,匈奴求和亲,自然应该到武威郡治姑臧,李贤在这里专门注出武威郡故城,似乎姑臧县虽迁,但郡治仍在故城,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第三,《水经注》征引王隐《晋书》“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郦氏对此持肯定态度,即凉州城,也即姑臧城,最早是由匈奴所筑。所谓“故城”,当亦指此。说都野泽正源(即汉之谷水)流经姑臧县故城西,亦未尝不可。第四,匈奴所筑姑臧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依汉里计,1里=415.8米(王莽货布尺和铜斛尺以及汉简常规尺寸),7里=2910.6米,3里=1247.4米。而今天的赵家磨锁阳城遗址,位于赵家磨村北200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宽90米,墙垣皆毁,仅存后代庙址2处。城址曾出土有灰陶片和汉砖,确系汉代遗物。但从规模和形制上看,两者相差甚远,不可能是西汉之姑臧城。

第三种说法,姑臧故城始终就在今武威市城范围之内。这一说法最早见之于《西河旧事》。其后王隐《晋书》、郦道元《水经注》、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张轨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均认为,后世姑臧城是在匈奴姑臧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的基础上整修而成,尤其是《嘉庆重修一统志》,将姑臧城由匈奴始筑,后经历代整修利用,一直到元代的建置沿革叙之甚详。今人梁新民《姑臧故城地理位置初探》<sup>①</sup>文认为:东汉武威郡的官署遗址,前凉张氏“大城姑臧”的一些重要遗址以及后凉吕光时修筑的罗什寺及罗什寺塔均在武威城内。隋末李轨割据武威,又在原城基础上增筑外城,直到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都指挥濮英又将原城“增高三尺,周减三里许”。说明武威城一直是历史上的姑臧城,并未迁

治,只是历代修建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笔者赞同这一看法。

## 二、张掖

张掖县,前汉置,属武威郡,在今武威城南,后汉因之,曹魏废。由于相对于武威郡其他各县,张掖县设置时间较短,曹魏以后再未复置,因而早期史书有关张掖县的史实及沿革反映极少。后世一些史地著作中大都认为两汉时期的张掖县在武威城南,如乾隆《大清一统志》、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钱坫等《新斛注地理志集释》、汪士铎《汉志释地略》等。但问题在于在武威以南什么方?说法不一:其一,在凉州以南200里。《旧唐书·地理志》所记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有“张掖守捉,在凉州南二里,管兵五百人”,校勘记曰:“《通鉴》卷215注‘二里’作‘二百里’。《新唐书·地理志》“凉州武威郡”下亦曰:“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很明显地,《旧唐书·地理志》“二”后脱一“百”字。《通典》卷172云:“张掖郡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马千匹。”“三”恐为“五”之误。而《元和郡县图志》卷40亦云:“张掖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五百人,马一千匹。”校勘记云:此“五百里”,疑“五”为“二”之误,想把这两条记载与新、旧《唐书》的记载一致起来。其实,从驻防地点及管领兵马数额看,张掖守捉在唐代数百年间似有大的变动,或因后来防守吐蕃的需要而曾迁徙过。与汉代张掖县无涉。由于新、旧《唐书》的这一记载,后世一些史家都把两汉张掖县同唐代张掖守捉联系起来。清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张掖”条下曰:“唐书地理志,凉州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盖因旧县为名”。似乎两汉张掖县与唐代张掖守捉在一个地方。王先谦《汉书补注》、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3《古迹》“张掖废县”条也都原文因袭。其二,即今武威市张羲堡。《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持此说。其三,在武威县以北洪祥滩。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考》以及《秦汉之际河西的民族及其分布》<sup>②</sup>二文认为:“今武威县西北与永昌县交界处的洪祥滩,汉代墓葬建筑遗址很多,这里有

个地名叫张羲,据云是因张羲沟得名,大概这就是汉代张掖县的遗址。”不难看出,不论是南200里张掖守捉之说,还是今武威县张羲堡之说,抑或武威以北洪祥滩之说,都是从后世地名发音上来联想,缺乏直接根据。以上诸说,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一书辨之甚详。同时李并成根据居延里程简记载,考定汉欠县故城在今古浪县土门镇西3千米处的王家小庄附近。由此60里(约今25千米)的张掖废县应为今武威王景寨故城。这一看法,把过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考之悬泉里程简2的记述,仍不尽相合。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居延里程简1引述如下: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茂陵至获置川五里  
获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八十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  
居延置至觶得九十里  
觶得至谿次九十里  
谿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里  
日勒至钩者置五十里  
钩者置至屋兰五十里  
屋兰至氏池五十里

四栏简文分别记述了从长安到河西、张掖郡氏池县的四段路程。其中第三栏记述的是由汉代媪围到武威郡张掖县的一段里程。看得出来,所记里程的行走路线与悬泉里程简第一栏所记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从今天的靖远哈思堡渡河进入今景泰县境,绕过县境寿鹿山东麓,经古浪大景、土门一线进入今武威境内。而后者则是翻越乌鞘岭,经天

祝、古浪到今武威境内。两条线殊途同归,均在汉张掖县会合。从悬泉里程简第一栏反映的情况看,其行走路线基本为今天兰新铁路和312国道的走向。依此方向,“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即今28千米。因而汉张掖县城的具体位置应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一带。这里地处黄羊河(汉谷水上游)东岸,土地平衍,地势辽阔,比靠近汉塞的王景寨设县条件要好。而且就交通而论,不管是靖远一线,还是乌鞘岭一线在这里会合,地理条件亦更为适中。符合居延里程简“循次距小张掖六十里”(25千米)和悬泉里程简“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28千米)的记载。从姑臧到小张掖的里程要比小张掖到循次的里程远。如果王景故城为汉张掖废县,它与姑臧县的距离反近于其与循次县的距离。再说,从乌鞘岭一线到姑臧,如果绕道王景寨就显得迂回。相反,由靖远一带到姑臧,尤其是从循次(即今古浪土门镇以西)到今谢河武家寨子,却比较便捷。因而笔者认张掖县故城应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一带。这里西距韩佐乡五坝山汉墓12千米,1984年在五坝山3号汉墓出木牍有云:“张掖西乡定武里田升宁今归黄过所无留难也故为□□□。”<sup>①</sup>说明这里是汉代张掖县的西乡。由五坝山隔杂木河西望,就是著名的磨嘴子汉墓群。1959年至1972年先后四次在此清理发掘汉墓72座,出土陶器、木器、漆器、丝织品等许多珍贵文物。其中469枚“仪礼简”、王杖十简,1986年又出土过26枚“王杖诏令册”,很可能就是汉代张掖县境的遗物。

### 三、鸾鸟

鸾鸟,《后汉书》李贤注:读曰翟爵,即“鹤雀”。前汉置县,属武威郡,后汉因,曹魏时废。鸾鸟县究治何处?后世史家大致亦有三种说法:一是武威西北说,二是永昌西南说,三是武威以南说。

武威西北说,最早见于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40“神鸟县”下记曰:“本汉鸾鸟县,张天锡改置武兴县,后废。武德三年,又于城内置神鸟县,与姑臧分理,神鸟理西,姑臧理东。”考前凉张氏

武兴县,《大一统志》“武兴故城”条下曰“晋永嘉五年,张轨以秦雍流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焉支、襄武、晏然、新郾、平狄、司监等县。”可见,前凉武兴县和武兴郡都在武威西北。《旧唐书·地理志》:“神鸟,汉鸾鸟县,属武威郡。后魏废。总章元年,复于汉武威城置武威县。神龙元年改为神鸟。于汉鸾鸟古城置嘉麟县。”《新唐书·地理志》:“神鸟,武德三年置,贞观元年省。总章元年复置,曰武威,神龙元年复故名。嘉麟,神龙二年于故汉鸾鸟县城置,景龙元年省,先天二年复置。”这里就发生了如下错误:一、从词义上讲,神鸟即鸾鸟。既然唐有神鸟县,自然就是汉代鸾鸟县的延续。二、唐初虽将神鸟置于武威城内,与姑臧各治东西,但于神龙二年(706年)又在武威西北置嘉麟县,那末嘉麟县所在就成了汉代鸾鸟县之所在。可见汉鸾鸟县具体位置在唐宋人著作中就已搞混乱了,以致在一些清人的著作中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王先谦《汉书补注》在“鸾鸟”下注曰:“宋祁曰,鸟,郡本作乌。段玉裁曰,宋有神鸟县,乌是也。先谦曰,《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皆作神鸟县,段说未审。后书桓纪注,鸾音翟。段颍传注,鸟音爵。旧唐志鸾鸟读曰鹤雀,唐于此置嘉麟县。若作乌,不能读为爵也。续志后汉因。”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亦曰:“鸾鸟,段曰宋有神鸟县,乌是也。”显然,他们已经完全把汉之鸾鸟和唐之神鸟当作一回事了。注意的焦点已不是鸾鸟县治究在何处,而是“鸟”与“乌”的是与非了。其实,汉代鸾鸟县在曹魏时已废,时隔四百多年后,唐置神鸟县,在时间和空间上绝非汉代之鸾鸟。两者除词义上相通外,再找不出其他的必然联系,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言:“按元和志,唐神鸟本汉鸾鸟县,张天锡改置武兴县。旧唐志,鸾鸟县后魏废。神龙二年于故城置嘉麟县。今考武与、嘉麟皆在今县西北,恐皆误。”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将汉之鸾鸟指为今永昌县水源乡北地村以北的沙城子古城,该古城俗名“古城关”,基本位于武威城北,略偏西10°左右。北靠汉塞2千米多,塞外茫茫戈壁。古城

与汉塞之间隔以西沟林场用以防风固沙,20年前古城周围还是一片荒芜,近些年城外城内被农民辟为耕地,打井灌溉,城址破坏严重。笔者近些年多次去城址考察,从散布遗物看,确系汉唐故城,但从地理位置看,绝非汉代鸾鸟县城。永昌西南说,最早发端于《读史方輿纪要》。其云:“鸾鸟城在(永昌)卫西南……属凉州。”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因其说。乾隆、嘉庆两部《永昌县志》又加以引伸,指出“依鸾鸟山故名,上房寨子即其遗址”。今编《永昌县地名数据》以及新修《永昌县志》亦载:“鸾鸟县城遗址位于大河坝村上房寨子(今西大河水库西侧高地上)。距今县城约70千米。1968年修建西大河水库时发现,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旧说相沿,几成定论。实则亦为望文生义之臆说,并无确凿根据。

今日西大河水库西侧遗址东距番和、骊轩遗址尚有相当距离,距今县城100多千米,正如李并成所说:“武威郡在东,张掖郡在西,鸾鸟县属武威郡,其位置不可能在张掖郡所辖的番和县以西。”<sup>⑩</sup>

其实,对鸾鸟县具体位置最早亦最可靠的说法是武威以南说。《后汉书·段颍传》云:“永康元年(167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段颍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李贤注曰:“鸟音爵,县名,属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昌松县北也。”嗣后的《大清一统志》、钱坫等的《新斛注地理志集释》、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以及今人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亦持此说。这一说法,基本确定了汉代鸾鸟县的大体方位,但具体位置还有待研究。

《汉书·西羌传》有一段记载:“建光元年(121年)……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协将先零、沈氏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马)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这里,羌豪麻奴等在令居大败武威、张掖郡兵,准备北寇武威,汉将马贤追击之。麻奴等人的路线是“缘山西走”,而马贤则追击之鸾鸟而“招引之”,可见,鸾鸟的具体位置在祁连山余脉乌鞘岭的北面。

这是最早反映鸾鸟县具体位置的信息。

悬泉里程简“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提供了这三县的相对位置。

上文我们把汉张掖县的具体位置确定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的武家寨子。汉鸾鸟县又当在武家寨子之南60里(约25千米)。这里正南偏西 $10^{\circ}$ 左右25千米处为武威市中路乡,属山间地带,不仅由北至南进入此地要经过黄羊河峡谷地带,交通不便且与汉代苍松县不在交通在线,因而汉之鸾鸟县在此处的可能性极小。武家寨子以南偏东 $30^{\circ}$ ,正是古浪县北面的小桥堡一带,这里李并成考定为汉代苍松之所在。其实,按“悬泉里程简”的记载,这里当是鸾鸟县而不应是苍松县,汉之鸾鸟县舍此再无他求。

#### 四、苍松

汉代苍松县的具体位置,比较接近的说法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和陈沆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前者云:“苍松县,在(庄浪)卫西。汉县,属武威郡。后汉作苍松,晋因之。太和二年,凉张天锡击李俨于陇西,分遣前军向金城,自将屯苍松是也。志云,张氏置昌松郡,后凉吕光因郭磨之讖,改为东张掖郡。后魏复置昌松郡。后周郡废为昌松县,隋开皇初改县曰永世,后复曰昌松,属凉州。大业三年,李轨据河西,薛举遣将常仲兴击之,战于昌松,仲兴败没。唐亦曰昌松县,仍属凉州,乾元以后陷于吐蕃。宋时夏人置洪州于此,元废。”后者云:“(苍松)今甘肃古浪县安远堡,水出县南境山,北流至于县北境,出边汇为一小池。”考诸“悬泉里程简”,鸾鸟县在今古浪以北小桥堡一带,那末,距小桥堡以南65里(约27千米),当在今天祝安远镇一带。《汉书·地理志》载:“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也,北流桥次入海。”古松陕水即今古浪河。南有二源,一源自安远堡以南的乌鞘岭大柳树沟,一源自安远堡西南的青河,二源在安远堡西北相会,北流7千米,又有源于东南毛毛山的龙沟河在扎头村来会,再北流经古浪峡。唯安远镇一带四周多山,地势高亢,相对走廊各县,自然条件较差。1962年天祝藏族自治县设置于此,



20世纪80年代迁至华藏寺。两汉苍松县,何由设置于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乾隆《甘肃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辛卯侍行记》《新斛注地理志集释》《汉志释地略》以及《甘肃通志稿》《重修古浪县志》《凉州府志备考》都将汉之苍松指为古浪县西,盖相互因袭,未加细审察。古浪县地处峡口地带,西翻数座大山20千米方为武威市张义、中路等山间谷地。张义、中路如上所论,交通不便,不处在中西交通在线。张义以东至古浪以西,山势陡峻,地理条件远不如安远镇一带平缓。至于《元和郡县图志》谓“昌松县,本汉苍松县,属武威郡。后凉置昌松郡,县属焉。隋开皇三年改昌松为永年县,后以重名,复为昌松。苍松故城,在县东北十里”,度之“悬泉里程简”,这“东北十里”之说,更是无法印证。

### 五、显美

显美,前汉属张掖郡,后汉改属武威郡,地在张掖、武威二郡之间,故可改属。《三国志·魏书·张既传》:“(黄初二年,221年),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文帝遣京兆尹张既代邹岐为凉州刺史,率军由金城渡河,潜出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既已据武威,遂前军显美,大破之,斩首获生以数万计,河西悉平”。从卢水胡退却路线和张既进军方向看,显美在凉州以西无疑。因此后世史家据此把显美确定在武威以西和永昌以东。

《大清一统志》《新斛注地理志集释》《汉志释地略》以及乾隆《甘肃通志》和民国《甘肃通志稿》均持此说。乾隆《永昌县志》还进一步指出:“显美城今名古城子,在县东北一里。”李并成考察了多座古城,认为地处武威市西约20千米的朵浪古城为汉显美城的可能性较大。但上述地区或距武威太近,或距永昌太近,均与“悬泉里程简”所记载的里距不合。根据该简记载,姑臧去显美70里(约32千米),由姑臧西北32千米处正是今天的丰乐堡一带。这里位于甘新大道必经之地,地处西营河出山口的洪积冲积带,东距朵浪古城7千米,而海拔比朵浪城低10米。《三国

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帝初闻胡决水灌显美,谓左右褚将曰:‘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破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这里,就地势而言,引水灌显美当言之不虚。

《汉书地理志详释》云:“显美,当为今宁远堡,在边外昌宁湖南水磨川东岸,直山丹东百里。后汉属武威郡。”该书虽名“详释”,实则“疏略殊甚,舛误实繁,与名不相符”。释郡县名义,就字面曲为解释,不通则假声近之字附会之,再不通,则辗转通假附会之,甚而至于妄改郡县之名,加字以为训,谬误实多而不可凭信。这一点早为后人所诟詈。

总之,根据悬泉里程简的记述和有关文献的记载,汉之姑臧县治即今之武威县城,张掖县治当在今谢河乡武家寨子,鸾鸟县城当在今古浪县城以北之小桥堡一带,苍松县城当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安远镇,显美县城当在今武威西北之丰乐堡。

### 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下)

悬泉里程简涉及汉代河西地区的若干县、置,是研究丝绸之路走向和河西地区古城遗址的珍贵资料。上一节对悬泉里程简所涉及的汉代武威郡的若干地名进行考证,本节考证简文所涉及的汉代张掖郡若干城址及酒泉郡表是县地望。

简文第二栏原文是:

氐池去觶得五十四里

觶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根据《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县十:觶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骊轩、番和、居延、显美(后属武威郡)。”十县中除番和、骊轩外,其余八县均有详细的里距资料在汉简中发现。其中《居延新简》有“删丹至日勒八十里,日勒至钧耆置五十里,钧耆置至屋

兰五十里,屋兰至氏池五十里。”所涉及删丹、日勒、钩耆置和屋兰等县的具体位置,李并成先生已著文作了详细研究。<sup>⑥</sup>居延县另当别论,因居延简的发现而材料最丰富。显美一县,笔者已在上节中作了考证,而本节所要研究的只限于悬泉里程简第二栏中所涉及的氏池、觥得、昭武、祁连置及表是。

### 一、觥得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下列县十,觥得为首县,说明当时的张掖郡治在觥得。《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攻祁连山,扬武乎觥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注引郑氏曰:“觥,音鹿,张掖县也。”师古曰:“觥说非也。此觥得,匈奴中地名,而张掖县转取其名耳。”<sup>⑦</sup>“觥”作如“北海相景君铭”“曹全碑”等。<sup>⑧</sup>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云:“元和志:今甘州府下张掖县,本汉觥得县。《西河旧事》云:此地本匈奴觥得王所居,因以名之。《大清一统志》:觥得故城在今甘州府张掖县西北。按觥得本匈奴地,为去病所取,乃置郡县,非取其名也,颜说误。”都说明早在河西建郡设县之前,“觥得”一地早已有之。汉觥得县治的具体地望,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汉代觥得县即今张掖城。清人钱站、徐松《新斛注地理志集释》和汪士铎《汉志释地略》持此说。<sup>⑨</sup>另一种意见,吕吴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认为,汉代觥得“在今镇夷堡边外羌谷水东”。<sup>⑩</sup>第三种意见,认为在今张掖市西北。上述三种意见中,第一种意见失之简单的比照对应,缺乏应有的根据和论证。认为汉之觥得为张掖郡治,今之张掖自然是汉之觥得,忽略了古今历史的发展演变。第二种意见出之吕吴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该书本身就是一部谬误百出、荒诞不经之作,不足信。如释“姑臧”云:“今凉州府治武威县。战被创曰臧,臧者不洁之名也。武始泮水自郡南分为二,夹郡北流而合,象姑臧也。武作母。始,女子初接于人也。”释“张掖”云:“今永昌县,或曰县东柔远骚,西接删丹。古谓于足肤皆曰掖。张掖,犹姑臧之意也。”释

“休屠”云:“休当作羞,羞屠亦姑臧之意。”粗俗鄙陋可见一斑。这一点,前贤多所诟病,认为该书“释汉志地理,疏略殊甚而舛误实繁,与名不相称”。释郡县名义,始则就字面曲为诠释,继则假声近之字附会之,再则辗转通假以附会之。辗转通假而其道仍穷,或别出心裁创为奇义,或析一名之两字各别为解,或妄改郡县之名强为之解。至若妄增地名之字以就吾说,义不可通加文以为训,则尤数见不鲜。可见这第二种意见是完全可以不予理睬的。

第三种意见,汉觥得县治在今张掖市治西北,为古今多数学者所认同,理由最为充分。最早李贤注《后汉书·明帝纪》曰:张掖,“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杜佑《通典》卷174、《大清一统志》卷266、《甘肃新通志·舆地志·古迹》均持此说。那么在张掖西北何处,里距多远?《太平寰宇记》卷152记得比较具体:“张掖郡城,亦在今(张掖)县西北四十里,汉为郡之所。”汉唐以来,大多以300步为1里,但1尺的长度不一,两汉时1尺等于20多厘米,如新莽铜斛尺,1尺为23.1厘米,因以6尺为步,1步为1.386米,1里300步,等于415.8米。而唐代情况有别,1尺米30厘米左右,而1步则为5尺150厘米,则唐代1里等于450米左右。<sup>⑪</sup>《太平寰宇记》记载,汉张掖郡城即汉之觥得县治在今张掖西北四十里者,约等于18千米左右,正合此数。

今张掖西北17千米至18千米的西城驿沙窝,即明永乡下崖村,有黑水国故城。故城有南北2城。北城呈长方形,东西长254米,南北宽228米,城中位置在东经100°2'26",北纬39°2'15"。南城在北城的西南方向,距北城2.5千米。平面亦呈长方形,东西长154米、南北宽129米。中心位置在东经100°20'30",北纬39°。1945年,夏鼐和阎文儒到黑水国故城作过考古调查,并在周围发掘汉墓一座。阎文儒在他的《河西考古杂记》(下)中认为:“以北古城及所掘汉墓言,此地即汉张掖郡治之觥得县。”又说:“此城之筑,最晚应起于汉,直至唐时仍未废。”<sup>⑫</sup>已故王北辰《甘肃黑水国古城考》(《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谢继忠等

《西汉张掖郡治觥得考辨》(《张掖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吴正科《汉张掖郡故城址及迁建时代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李并成<sup>①</sup>以及吴扔骧<sup>②</sup>等,亦一致认为今天的黑水国北古城即为汉代觥得县治之所在。

今张掖西北黑水国北古城城址,如上所说,呈长方形,东西长254米,南北宽228米,南墙辟门,竟宽4米。城墙黄土夯筑,基宽3.8米、顶宽3米,残高5.5米,夯层厚0.2米至0.25米。西南角有角墩,底边长9米,顶边长7.2米,残高7米。地表散见夹砂红、灰陶片及汉砖,并有明代黑釉、豆绿釉、白釉及青花瓷片等。此城现在的形制为唐城规制,最初或为汉城,后又为明代利用,时间跨度较长。

在明永乡下崖村西1千米处,即黑水国南、北城址之间,有近千座汉代墓葬,解放前曾被韩起功所部大量盗掘。今天地表封土大都夷为平地。从发掘清理过的2座砖室墓看,均为前后双室墓,前室覆斗顶,后室券顶。出土随葬品有陶仓、鸡窝、屋、井、灶等模型,用具有壶、罐、鼎、豆、簋、奩、盘、盆、勺及铜莲枝灯、铜镜、铜弩机、五铢钱等。这片汉墓的位置和规模,亦可有力地左证汉觥得城址在今北古城的判断不误。

## 二、氐池

氐池县城的确切位置,清以前史无明载。《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曰:“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踊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适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满焉。至晋初,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sup>③</sup>此处“大柳谷口”,当为今民乐境内之扁都口。说明扁都口及其以北的地区属氐池之辖境无疑,但县城所在却无从判断。《晋书》卷129《载记·沮渠蒙逊传》云:“蒙逊闻男成死,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屠杀,诸君能否报仇乎?且州土兵乱,似非业所能济。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为陈、吴耳,而

信谗多忌,枉害忠良,岂可安枕卧观,使百姓离于涂炭。’男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而从之。比至氐池,众逾一万。”<sup>④</sup>《资治通鉴》将此事编入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条。胡三省注云:“氐池县,汉属张掖郡,晋省,其地属唐甘州张掖县界。”<sup>⑤</sup>这是最早对氐池县具体地望的确指,但也仅此而已。清以来,史地之学大兴,对汉代氐池县的所在有了三种说法:一说在今张掖以东。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甘肃镇条载:“氐池城在镇东,汉县,属张掖郡。后汉因之,晋省。”一说在山丹西南。《大清一统志》、徐松《新斛注地里志集释》、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乾隆《甘肃通志》等记载持此说。其实这两种说法只是指出了大体方位,究在何处,并未深究。真正指出具体位置的第三种说法是乾隆《甘州府志》。该志卷四山丹古迹条下云:“氐池古城,城西南一百六十里,今洪水城。汉氐池,魏晋兰池,宋金山。”<sup>⑥</sup>其后,陶保廉《辛卯侍行记》<sup>⑦</sup>、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和《山丹县志》因袭上述说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其标注在今天的民乐县城,即清人所说的洪水城。

乾隆《甘州府志》将汉之氐池确指为当时的洪水城,不知根据何在。但从紧接着下面的记载“汉氐池,魏晋兰池,宋金山”看,记述的粗疏是显而易见的。晋时置西郡于删丹,分删丹置兰池、万岁、仙提,加删丹、日勒,共五县属之,而张掖郡仍有氐池、屋兰、永平、临泽四县,并时而立,历前凉、前秦、后凉而不改,所谓“汉氐池,魏晋兰池”之说不存在。此外,沮渠北凉有金山郡,北周有金山县,均在今山丹、民乐境,所谓“宋金山”,不知所指为何。可见,如此粗疏的记载,所言汉之氐池县治即清之洪水城一说,显然是无稽之谈。

居延新简出土后,今人借助新出之里程简,对汉代氐池县城的确切位置有了新的认识。李并成提出,汉之氐池县城当在今民乐县李寨乡菊花地。<sup>⑧</sup>悬泉汉简出土后,其中的里程简又引起了人们新的注意。吴扔骧著文认为,汉之氐池“西北距觥得54里

(约22.45千米)。其方位当在羌谷水(今张掖河)河网带以东、弱水以南、今张掖市一带。氐池与觥得当以羌谷水为界。氐池县辖境,包括今张掖市东南部和民乐县境。西晋废氐池。东晋时,后凉复置。北魏再废。隋移张掖县治于张掖河东,县城或许是在汉氐池废址上,重建而成。”<sup>⑩</sup>这些看法已基本接近事实,但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悬泉里程简中“氐池去觥得五十四里”,相当于22.45千米。居延新简中“屋兰至氐池五十里”,当今20.8千米。另外20世纪30年代在金关和地湾出土的简中还有:

肩水候官始安隧长公乘许宗,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卅六,长七尺二寸,觥得千秋里,家去官六百里。

肩水候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卅二岁,长七尺五寸,觥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

肩水候官执胡隧长公大夫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卅七岁,长七尺五寸,氐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从上引简文中,除氐池外,我们还能找到三个坐标点,即觥得、屋兰、肩水候官(今地湾)。根据三个坐标点对氐池的记载,或可找到氐池的准确位置。上已述及,汉之觥得,即今张掖市治西北黑水国北古城,东南距张掖18千米,而觥得距氐池为22.45千米,因之氐池当今张掖市东南2千米左右梁家墩镇梁家墩村一带,位置在东经100°28′、北纬38°55′的范围内。今梁家墩镇驻饮马桥,1953年分别设置过梁家墩、迎恩、清凉寺、太和、三工等乡,1955年合并为梁家墩、三工二乡,1958年合建梁家墩人民公社,1983年改公社为乡,近年又改乡为镇。梁家墩村就在该镇的西北2千米处,明清时有梁家堡,明以前址已毁废无考。

汉代屋兰县,意见比较一致,治今张掖城滩乡东古城,清代仁寿驿。从东古城到梁家墩,直线距离18千米,实际路程当在20千米左右,而“屋兰至氐池五

十里”,50里为20.8千米,正合此里距。汉代的肩水候官在今金塔县双城乡东北25千米处,东经99°56′7”,北纬40°35′。候官以北不到1千米处即为肩水金关。从觥得即今黑水国北古城出发,沿黑河西北行,在高台境内穿越正义峡,折而东北至肩水候官和肩水金关,约250千米,正合上引简“觥得千秋里”和“觥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的记载。官指肩水候官。上引地湾简所谓“氐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说明宜药里当在氐池县城附近,亦与上文所判定的氐池县位置相合。

明清洪水城即今之民乐县城,西北距张掖市65千米,再到黑水国北古城18千米,共83千米,合为200里,近乎原距离四倍。可见汉之氐池城绝不可能在今之民乐县城,而只能是张掖市东南郊梁家墩之地。

### 三、昭武

昭武一地,汉以前本为月氏地。月氏为匈奴所迫西迁而进入中亚,后再迁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大夏和贵霜王回。而散落在中亚一带的部落到南北朝隋唐时有昭武九姓。《北史》《隋书》和新旧《唐书》均有记载,汉之昭武县就是在月氏昭武城的基础上修筑并沿用了原来的名称。《隋书·西域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sup>⑪</sup>此所谓“祁连山北昭武城”,当为汉代建县筑城之处。《后汉书·梁懂传》载,永初元年(107年),朝廷罢西域都护。二年(108年)春,都护段禧、骑都尉赵博和副校尉梁懂还至敦煌,“会众羌反叛,朝廷大发兵西击之,逆诏懂留为诸军援。懂至乘掖日勒。羌诸种万余人攻亭侯,杀略吏人。懂进兵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李贤注昭武曰:“县名,属张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sup>⑫</sup>清人的史地著作如徐松《新斛注地里志集释》、汪士铎《汉志释地略》《大清一统志》和《甘肃通志》等对昭武故城的记载,一仍章

怀太子之旧，或云在甘州府西北，或云在张掖县西北，都只点明了大体方位，而未指出具体地点。唯乾隆《甘州府志》卷四抚彝厅古迹条下所记：“昭武故城，城东北四十里。土人云，遗址尚存，在今板桥东南，古月氏城，而汉县因之。晋避文帝讳改临泽，后魏时废。北凉有临池郡，亦其地也。按《唐书》，月氏至唐时分十余国，而其酋率自称昭武人云。”按，清抚彝厅始置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治今蓼泉乡。1913年改厅为县，曰抚彝县，1928年更名临泽县，1952年从蓼泉乡迁治沙河堡，即今县政府驻地城关镇。《甘州府志》所言昭武故城在抚彝厅东四十里，即今蓼泉乡以东四十里。这是最早对昭武故城的确指。其后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杨思、张维等《甘肃通志稿》也都如是说。《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指汉之昭武县“治所在今甘肃临泽县西北旧临泽县之东”，其亦未超出上述意见的范围。

那末汉之昭武县究竟在今天什么地方？李并成认为，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与诸史籍所载方位皆合，汉昭武县故城位于这一带是颇有可能的。”<sup>⑩</sup>笔者赞同这一说法，不遇李并成发表这一意见时，尚未看到悬泉汉简中的里程简，本文就是想利用里程简的准确记载为汉昭武城位置增添一新的论据。里程简“觥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62里等于26千米左右，从今天张掖西北明永乡西城驿沙窝的北古城西北行，到今临泽县鸭暖乡张家寨子东南2千米处的昭武村，正好26千米左右，符合62里的里距。据李并成走访，周围曾有古城一座，毁于20世纪50年代。另据考古调查，村南2千米的南板滩上，遍布汉墓，范围有360万平方米，有汉代器物 and 五铢钱出露。这里平畴沃野，土肥水美，气候适宜，交通便利，是置郡设县的理想之处。所谓“觥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者，疑张掖郡曾有过移驻于昭武的历史。

#### 四、祁连置与表是

悬泉里程简中有“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祁连置为张掖郡西部一处驿置机构，其功能和悬泉置相若，承担公文信件的传递和

过往人员的接待。从昭武县沿羌谷水南岸西行61里即25千米左右，即到今蓼泉乡西部的双泉堡，以里距准确测算，此地当为汉之祁连置所在。这一见解吴扔骥已经指出<sup>⑪</sup>，此地明清有堡垒，清设双泉塘，驻有马、夫若干。从地理位置看，汉代在此设祁连置，当为张掖郡进入酒泉郡表是县的必经之地。

表是，《续汉志》作表氏。是、氏通用。两汉魏晋以及前秦五凉（除南凉外），表氏县先属酒泉郡，前凉张骏后改属建康郡，后魏废。至于具体位置，过去的记载大都过于笼统。《后汉书·灵帝纪》：光和三年（180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李贤注曰：“表是县，属酒泉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云：表是，高台西南。”徐松《新斛注地里志集释》《大清统一志》和《甘肃通志》均载：“表是故城，在高台县西。”

研究表是县的具体城址，首先要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两汉的表是县曾经因地震而有过搬迁。上引《后汉书·灵帝纪》云：光和三年（180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后汉书·五行志》亦云：“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倾，县易处，更筑城郭。”<sup>⑫</sup>说明光和三年（180年）前后，表是县城的位置不在一处。而汉简所记载的表是县与有关地方的里距只是地震以前情况，至于地震以后的表氏县城只能根据别的材料加以判断。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认为，地震前的表是县城当在今“酒泉市屯升乡沙山村北15千米处的新墩子古城”，而地震后的表氏县当为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海乡的草沟井城”。但我们根据悬泉里程简记载的情况和其他材料判断，光和三年（180年）前的表是县城当在今高台县黑泉乡定安一带。上引里程简有“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的记载。同时还有一条几乎内容相同的记载是：“表是去祁连置七十里”，可见这一里距的记载是相当准确的。那么，上所说祁连置的位置只能在今临泽县蓼泉乡西边的双泉堡，而双泉堡西行70里，即29千米左右，其地正是黑泉乡南部的定安村。从删丹、屋兰、氏池、觥得、昭武到祁

连置和表是的具体位置看,有两条基本规律,其一是县、置城址的设置基本沿着走廊腹地由东向西排列开来;其二是筑城设县基本沿着弱水和羌谷水两岸近水处。按照这两条规律和简牍所记里距材料,围绕已知的坐标,我们将地震以前的表是县城确定在高台中部的定安一带,当不会有太大误差。

县治搬迁的原因是因“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倾”。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找到遗址和故城比较困难。今酒泉市屯升乡沙山村北的新墩子城距临泽双泉堡直线距离约70千米,合160多里,与当时里距不符,显然是不可能的。《甘肃日报》2002年9月6日刊载高台县博物馆赵万钧的文章,认为光和三年(180年)地震前的表是当在骆驼城以北约8~9千米的黄河湾(“河”当为“沙”之讹)<sup>⑧</sup>同样道理,此处距临泽双泉堡约有42千米,相当于100里以上,与汉简中记载的里距差异较大,亦不能令人信服。今日的双泉堡即我们所考定的汉代祁连置,在北纬39°,东经99°58',即令离开羌谷水流域直线距离往西走,29千米的距离,最西也只能到东经99°38',西距骆驼城还有将近6千米。而黄沙湾在北纬39°05',东经99°31',超过汉简里距13千米左右,这就是我们认为黄沙湾不可能是汉代表是县的理由。

至于迁址后新筑之表氏城,即今天的骆驼城。有些史籍认为今骆驼城当为汉代之乐涇城。最早是乾隆《肃州新志》高台县古迹条下如是说,“骆驼城,在县西南四十里。旧志:即汉乐涇县。旧北凉段业建康郡故基。”<sup>⑨</sup>后来《甘肃古迹名胜词典》亦沿用其说,认为后世的骆驼城即是在汉乐涇县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其实乾隆《肃州新志》所引旧志材料是靠不住的。按张维《陇右方志录》所载,肃州旧志四部:一部是《元肃州志》、一部是《明肃州新志》,均已亡佚。一部是《万历肃镇志》,一部就是上面所引用的乾隆《肃州新志》。高台志有两部:一是《万历高台所志》,亦佚。一部是民国《高台县志》。<sup>⑩</sup>乾隆《肃州新志》所云“旧志”,只能是《万历肃镇志》或《万历高台所志》,而后者今已不可得见,至于前者有顺治重刻

本,其史料价值前人早有定评。清人黄文伟在《重条肃州新志序》中云:“先翻肃镇旧志,见其板刻漶漫,笔划舛讹,至不可句<sup>⑪</sup>至于其内容,张维引《重条肃州新志》凡例云:“旧志误谬颇多,亥豕鱼鲁,难以枚举。如酒泉太守竺曾而讹为竺会;张奂渊泉人而讹为酒泉人;大禹治水合黎而致疑龙门、积石不在于此;及慧达,沮渠蒙逊时僧而或为明初。”这样一部谬误百出的书,所谓“骆驼城即汉之乐涇城”的记载能够征信吗。

近年在骆驼城附近发现的墓葬中,多有表是县的记载。如高台县博物馆藏有一块红色铭旌,长62厘米,宽46厘米,上面红底白字:“元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晋故凉州酒泉表是(下部残破)”的字样。元康元年为公元291年,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说明其时的表是县尚属于酒泉郡,县境当在今日骆驼城周围。该馆还藏有1997年发现的一块前凉时期的木牍,全文179字,内容如下:

建典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直执凉州建康表是县显平亭部前玉门王领校周振、妻孙阿惠得用今岁月道通葬埋太父母以次入蒿里,三九入太一,下从玄入白葬,后世子孙法出二千石,宗人室家共祭送死人周振、阿惠金银钱财,五谷粮食,荔子黄远,牛羊车马,猪狗鸡雏,楼舍帷帐,柩杆盘案,彩帛脂粉。诸入冢什物,皆于方市买,贾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上至苍天,下至黄泉,不令左右切伋,名时旁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沾绘各半如律令。

建典是愍帝司马邺的年号,313年至316年共四年时间。但前凉张氏割据河西,奉晋正朔,张祚之前沿用建典年号,建典廿四年,当为336年,值前凉张骏。从木牍内容看,前凉时张氏置建康郡,而表是隶建康而不隶酒泉。《周书·史宁传》:“史宁,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为临松令。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sup>⑫</sup>“表氏”原作“袁氏”,《周书》校勘记云,“钱氏《考异》卷三十二云:‘此凉州之建康,非扬州之建康也。袁氏当为表氏之

讹。’按钱说是。表氏是汉以来的旧县，属酒泉郡。建康郡，前凉张骏，表是县当时改属建康。”实际上自从张骏设置建康郡直到北魏被废，历前凉、后凉、西凉、北凉，表氏县都属建康郡而不属酒泉郡。民国《甘肃通志稿·舆地志》将其隶酒泉郡下不确。据此，上引骆驼城周围墓葬所出木牍证明，汉代光和三年（180年）地震后的表氏县城即在今天的骆驼城。

根据上面论证，我们的结论是：汉代的觥得县城在今张掖市西北18千米处的黑水国北古城，位置在东经100°2′30″，北纬39°02′。汉之氐池县城当在今张掖市东南2千米左右梁家墩镇梁家墩村左近，位置在东经100°28′，北纬38°55′的范围内，不在洪水城（即今民乐县城）。昭武县址在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祁连置的位置在临泽县蓼泉乡西部双泉堡。而汉之表是县城，光和三年（180年）地震前在高台黑泉乡之定安村一带，位置在东经99°41′，北纬39°27′；光和三年地震后搬迁至骆驼城。过去将骆驼城指为汉之乐涇城不确。

#### 注释：

①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③前者见《西北史地》1986年3期，后者见《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3期。

④《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

⑤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汉武威县并不在唐武威城，该书纪述之混乱由此可见。

⑦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

⑨李并成《居延汉简里程简地理调查与考释》，《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⑩《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⑪顾藹吉《隶辨》，中华书局，1986年。

⑫《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5年。

⑬《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5年。

⑭或有认为唐代以360步为一里，等于540米，但以实际距离测之，往往不合，今不取。

⑮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⑯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⑰吴钊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⑱《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⑲《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⑳《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㉑《甘州府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㉒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四，刘满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㉓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㉔吴钊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㉕《隋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

㉖《后汉书·梁懂传》，中华书局，1965年。

㉗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㉘吴钊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㉙《后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

㉚《高台发现大型汉代城址》，《甘肃日报》2002年9月6日第6版。

㉛《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1984年翻印本。

㉜张维《陇右方志录》，北平大北印书局，1934年。

㉝《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1984年翻印本。

㉞《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

（作者：①、②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 甘肃武山官寺考释

——兼谈中国古代福寿文化

王雪梅 裴应东

武山官寺，原名“寿圣寺”，今称“圣寿寺”。坐落在武山县城南门内西侧今文物局院内，原建筑规模较大，占地2000多平方米。自北而南，分山门和下、中、上三院。原有天王殿、三官殿、股肱殿、钟楼、鼓楼、燃灯佛殿、十八罗汉堂等建筑。现仅存燃灯佛大殿和东、西两侧的挟屋，1981年公布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明一统志·卷三五·巩昌府》：“寿圣院，在城内，洪武重建。”清康熙《宁远志·古迹》：“寿圣寺，在城，敕封。”民国李克明编著的《武山县志稿》的寺观一节载：“圣寿寺，在城内”。疑民国《武山县志稿》误载“寿圣寺”为“圣寿寺”。寿圣寺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在我国分布较为广泛。比较知名的有陕西西安、合阳，山西乡宁、芮城、万荣、阳城，河南商水、太康、中牟，江苏姜堰、宿迁，浙江长兴，广西桂平等地。

《宋史·仁宗本纪》载：“（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遗制皇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丧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务从俭约。谥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十月甲午，葬永昭陵。”《宋史·礼十五》又记载：宋英宗赵曙继位后，在当年八月癸巳，颁布诏书，“英宗以（父亲）仁宗生日（正月三日）为寿圣节”，可见，寿圣节是为悼念宋仁宗而设立的，自然与其生平事迹有关。《逸周书·谥法解·序》云：“谥者，行之迹。”宋仁宗赵祯“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见《仁宗本纪》），被谥为“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其中的“圣”

字，依据谥法，“敬宾厚礼曰圣”，是对其生前行事的褒赞，与他的庙号表达的意思是相近的，这应该是“寿圣节”的“圣”字被命名的原因。至于“寿圣寺”的“寿”最初本义应为“年纪长”《毛传》：“寿，考也”。《楚辞》屈原《天问》“延年不死，寿何所措”，《说文解字》“同意相授，考老是也”。这都是说“寿”有年老，年长的意思。赵祯享年五十四岁，据《礼记·曲礼》：“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赵祯生年还不能称“老”，怎么能够称“寿”呢？《逸周书·武顺解》，其中称“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知祥则寿，知义则立，知礼则行。”《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可见，五福者寿为先，寿而为尊，尊而为贵，贵而为福。宋仁宗赵祯于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在位长达42年，从这个意义上，以“寿”指称赵祯意为其久居皇帝尊位，褒赞他懂天道，有福气。孔子亦云：“智者乐，仁者寿”。这应该是“寿圣节”的“寿”字命名的缘由。今天的武山县城，始建于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看后认为，武山官寺大式木作，双面坡悬山式建筑具有宋代特征，结合清康熙《宁远县志·古迹》“寿圣寺，在城，敕封。”之缘由，武山官寺最迟也应建于北宋晚期。

元朝君王尊奉藏传佛教。元代“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元史·释老传》）。因而政府对佛教加以扶持发



展迅速。特别是统治陇右汪世显家族,重视文化,笃信佛教,大兴寺院。汪惟益曾为高僧严大教专门修建宝庆寺,汪德臣建南山寺(即现今陇西县巩昌镇仁寿山南山道观),汪惟永也对宁远(武山)官寺进行了大规模翻修扩建,今燃灯大殿及西侧配殿屋脊、斗拱造型都具有显明的元代特征。元人危素著《说学斋稿》云:“圣帝明王,守吏致祭;庙宇倾圮,官为修葺”。《元史·祭祀志》:“国有大灾则告庙”。如遇自然灾害,地方官也要到寺院禳灾祈福。据此,元代该寺依然为政府敕设,接受政府封赐食禄的援助,由国家管理、监督的寺院,香火旺盛。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年),武山官寺恢复宋代寿圣院称谓(见《大明一统志·卷三五·巩昌府》)。明清两代对官寺也曾多次维修,今大殿屋顶构建及后檐铺作和拱眼板均有彩绘和壁画来看,就是明、清时期换补后所作。明清两代官寺还是县府管理地方佛教事务的僧会司驻地(见康熙《宁远志》)。民国期间官寺被作为粮仓物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武山县文化馆、图书馆将其作为图书库房及阅览室使用,2002年后再次成为佛教活动场所,当代著名书法家范文通给官寺题写的“圣寿寺”横匾和“圣迹煌煌白马驮经宁远道,寿光耿耿青灯递影武城山”的板联,现悬挂于主殿正门。

武山官寺原名“寿圣寺”,这一称谓与遍及全国各地的寿圣寺一样,都是我国古代儒释文化合流的表现,诠释着丰富的福寿文化理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寿、追求福的民族,福寿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我国古代祈福的五字箴言认为“五福寿为先”,福和寿经常连在一起,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更是对长寿福祉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帝王喜欢称其“万岁”,秦始皇为求长寿不老,曾派方士徐福率500童男童女,东渡入海寻求仙药。唐玄宗的寿辰叫“千秋节”,宋太祖的寿辰叫“长春节”,宋仁宗寿辰叫“寿圣节”,到了明清时期,皇帝的诞辰统称“万寿节”。而普通老百姓也希望被称“老寿星”。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和高尚美德。《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后汉书·礼仪志》说:“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每年秋季,由地方县、道政府调查户口,登记高龄老人,由政府给老人授杖。持杖老人可“行驰道旁道”。严禁擅自征召、系拘、欺殴辱骂持杖老人,如有违犯者(包括官吏),全部“应论弃市”。

在中国古代传说和文学典故中有:“南极寿星”“麻姑献寿”“八仙祝寿”“蟠桃赴会”等家喻户晓。甲骨文中“寿”字为“龟”的样子,曹操的名诗也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盛赞龟为长寿福瑞之物。金文中寿字傍边一个口表示酒杯,《诗经·幽风》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可见,献酒与祝寿有关。《诗经·小雅》的末章:“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描述的是一种祝颂长寿和祈佑幸福平安的形象。

在中国古代福寿文化中以梅、桃、菊、松、柏、鹤、绶带、锦鸡等象征长寿、福瑞吉祥,以寿物崇拜,以柏谐百,以竹谐祝,以鹤谐贺,创作的“千寿图”“百寿图”“祝寿图”“贺寿图”,给人以健康长寿幸福的享受。在中国民间千百年来被推崇具有长生不老神奇本领的各路仙人、吉祥物像,构成了中国人祈福求祥、盼望自己寿运长久的一幅美丽神奇的景观。

(作者:①甘肃省武山县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②甘肃省武山县博物馆)

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是在明确年鉴基本内容构成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年鉴的体例要求,将年鉴的基本内容制约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明确信息资料的归属和层次。按照分类法的编排方式,横排不同门类,纵列同类事物,将年鉴的资料信息形成一个科学的逻辑系统,使年鉴编辑框架的外在形式不断完善,规范成具有目录作用的年鉴篇目体系的过程。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不规范,直接影响着年鉴编辑的整体质量。

### 一、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的特点

甘肃省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初期受传统志书的影响,大都采用大编体结构的框架设计。如《年鉴》1989卷创刊时共设有特载、概况、大事记、政治建设篇、经济建设篇、文化建设篇、社会建设篇、人物篇、附录等9个篇目。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逐步由大编体结构转向中小编体结构。《年鉴》2011卷的框架结构也作了较大调整,由原来的9个篇目调整为28个篇目,完成由大编体结构向中小编体结构的嬗变。进入21世纪以后,采用中小编体结构的地方综合年鉴逐渐增多。甘肃省的《兰州年鉴》《白银市年鉴》《武威年鉴》《张掖年鉴》《山丹年鉴》《康乐年鉴》等也完成从大编体结构向中小编体结构的转变。长期以来,年鉴框架设计采用什么结构并无明确规定,从我省综合年鉴的编辑实际看,绝大多数综合年鉴采用中小编体结构。那么是大编体结构好还是中小编体结构好,应该说各有长短。目前地

滕辉

## 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思考与解析

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比较流行大类、中类结构的框架设计。

(一) 大类结构框架设计的特点。大类结构,类似于志书的大编体结构,类目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部类分类,其特点是栏目设置较少,一般只有6-12个栏目(类目)。大栏目(类目)下再设分目、子目、条目三个层次,共设四个层次。大类结构设计的优点:一是立足整体,直接标明事务之间的联系,操作性强,具有相对稳定性。如《年鉴》2015卷,在框架的第一层次设特载、专记、大事记、县情概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乡(镇)概况、先进人物与获奖单位、人物事迹选登、研究与发现、艺文、附录、索引等15个类目。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地设置若干分目、子目。这样的大类框架是可以保持多年不变,每年只需根据年度特点对分目或子目作一些调整。二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信息资料便于归属。如《年鉴》2016卷,在百科或动态部分(指年鉴的主体事业)设政治、军事政法、经济、经济管理与监督、社会事业、社会服务与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市县概况、年度人物与先进单位等9个类目,便于入选的信息资料合理归类。如在设置“社会服务与管理”类目下设置分目“民政”“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保障”“民族宗教”三个分目,这样的设计不仅分类科学,而且解决了社会救助、农村养老、城镇居民收入等归属问题。大类结构的短处是分类较为简单,虚拟层次较多,从框架结构的第一层次很难看出变化、看出年度特点来。

(二)中类结构框架设计的特点。中类结构介于志书的中小编体之间,暗分大类,明分中小类,不标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部类名称,但读者能明白类目归属哪个部类。其特点是:将相近或相关的事物并列一起,分别设栏目。框架设计分三个层次,即类目、分目、条目。一级类目设置较多,一般在20~40个左右。中类结构的优点是层次较少,灵活性强,便于类目、分目创新,易于体现个性特色。如《年鉴》2013卷,全书分23个类目。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大类暗含,不出现在年鉴篇目中,大类篇目析小。如将政治部类析分为党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法等排列在一起,分别设类目,然后再设若干分目、条目。为突出地方特色,直接将新区·开发区,这一特色内容作为框架的一级栏目设置,将兰州新区、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分目囊括其中,突出西部高标准建设、新模式开发、大项目支撑的现代化新区。如《年鉴》2011卷,全书设28个类目,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大类暗含,不出现在年鉴篇目中,大类篇目析小。将经济大类析分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管理、工业和信息产业、农业·农村经济、水务工作、交通运输、商贸·旅游、经济管理与监督、财政、税务、金融、证券、保险、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建设。为突出地方经济特色,直接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设为一级类目,该经济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设政策措施、宣传采访、研究交流、合作发展四个分目解读天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反映出天水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亮点,并将经济区域内陕西省部分市区的内容纳入其中,即拓展了资料内容,又突出了天水市地方经济建设的特色。

中类结构框架设计的缺点是结构松散,分类不好把握,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大类、中类结构并存、逻辑关系混乱的情况。不少采用中类框架结构的地方综合年鉴设置“政治”类目和“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军事”“商贸”“交通”“金融”等类目并列。殊不知,“政治”是与自然、经济、文化、社会并列的大篇目。

(三)大类框架设计和中类框架设计的选择。从甘肃出版的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来看,采用大类框架和中类框架的年鉴都有,采用中类框架设计的要多些。那么采用哪种框架好,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来选择,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欠发达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采用大类框架设计会更好一些。甘肃的一些农业县、牧业县和半农半牧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门类少,只有一些手工业、加工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如果采用中类框架,应该设置“工业”栏目,但能收录的信息资料很少,“工业”栏目很难立得住脚。如《年鉴》2016卷中,类目“工业”包括工业信息管理、电力供应、工业企业选介、新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义顺莲花山药业有限公司等5个分目。其中能体现工业门类的只有电力供应,不设置“工业”类目,有关信息资料又无处可归,倒不如采用大类结构,设置一个“经济”类目,将经济活动的内容都归在一起更好一些,不但可以解决内容畸轻畸重的矛盾,还可以解决或避免分类不科学、归属不当的问题。

## 二、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覆盖内容的全面性问题解析

内容的全面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内容不完备,不能全面包容本年鉴应承载的全部信息,甚至存在重要资料欠缺的现象是年鉴编辑常见问题之一,表现在年鉴框架设计上就是年鉴类目、分目、条目设计不全面、框架结构不完整,缺乏必要的构件。

### (一)类目设计不全面。

地方综合年鉴内容全面性的外在形式体现在年鉴框架设计的全面性上,类目设计要求地方综合年

鉴全面反映年度内本行政区域的基本情况,其框架设计必须有极高的概全率。一般而言,地方综合年鉴的整体内容根据信息资料的具体构成,可概括为四个组成部分:一是综合情况如“综述”“特载”“大事记”“专记”等;二是动态信息(百科部分),是对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发展变化情况的反映,是年鉴的主体部分;三是辅助资料,包括统计资料、书目文摘、调查研究、附录等;四是检索系统,一般由书前的分类目录和书后的主题索引构成。这四个部分也是综合年鉴框架的组成部分,要求齐备,缺一不可。如《年鉴》2013卷的篇目分特载、大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政法、社会事业、县区概况、统计资料8个类目,基本涵盖年度内本行政区域基本情况,但从类目设计上,一是该年鉴综合情况设计不全,综合情况包括综述、特载、大事记、专记等类目,缺失反映全市总体情况的综述和专记;二是缺失动态信息人物类目。此外,辅助资料部分仅仅设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缺失附录和索引。

## (二)不同类目下分目子目设计不全。

地方综合年鉴的大类框架层次一般设类目、分目、子目、条目4个层次,类目下的分目子目设置应反映类目涵盖的全部内容。又如《年鉴》2013卷中,类目“经济”设经济管理、工业交通、农村经济、商贸流通、财税、金融、国土资源等8个分目,该类目若从“经济”来设分目子目,则还应有反映全市经济的分目国有资产监管、公共资源交易、本地域内各银行的年度情况、工业的实质内容、银行监管、保险行业等内容。再有该年鉴设“政治”类目,有群众团体,无民主党派与工商联,设“社会事业”类目,无气象、档案和地方志分目,子目就缺失更多。再如《年鉴》2016卷,“社会生活”类目,设置分目民政事务、民族宗教事务、残疾人事务。此类目中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状况、社会现象、社会阶层、社会信仰、社会问题、社会灾难,我们说,“社会生活”,一曰“社会”,一曰“生活”。反映社会,自然要反映社会状况、社会

现象、社会阶层、社会信仰、社会问题、社会灾难等等。因此,反映社会首先要反映婚姻、家庭;其次要反映不同的人群,包括妇女、儿童、青年、老年,以及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流动人口、残疾人等等。还应涉及与人有关的两个基本主题—民族和宗教。反映人民生活,自然要反映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彻底打破,对人民生活这样一分为二地进行反映,仍有其合理性。此外,还应当反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住宅、社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等。所以,地方综合年鉴的“社会生活”部类,至少应设这样一些分目:婚姻·家庭、妇女·儿童、青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民族、宗教、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物价、住宅、社区、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灾难事故、救灾救济、殡葬等等。没有这样十五六个分目,很难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由于组稿难度大等原因,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兴行业,如计算机服务业、软件服务业、租赁业、会展业、物流业、家政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等,许多地方综合年鉴缺少记述。

## (三)同一分目下条目设计不全。

地方综合年鉴应尽可能反映行政区域内的全方位内容。记述年鉴内容的主要形式是条目,因而在设计综合年鉴框架时要尽可能设计丰富多彩的条目。如某地的综合年鉴在中国共产党类目中设市委办公室工作、统战工作、农村工作、党史研究、机要工作、对台工作、保密工作等分目,其下也未设具体条目,只是直接附以年度内该领域(工作)的综合性资料,既不符合年鉴体例要求,又不能全面反映该领域(工作)的全面情况,明显存在条目设计不全的问题。应按照综合年鉴体例要求,通过设计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来全面记述该领域(工作)的实际情况。如:体育分目,设置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个条目,不能全面反映体育事业的总体情况,缺失体育概况综合条目和体育设施建设、承办的体育

比赛等单一条目。再如房地产业分目设置概况、房屋登记、房地产市场管理、保障性住房,缺失内容公积金管理、房地产营销、物业管理等单一条目。

### 三、地方综合年鉴内容分类的科学性问题解析

地方综合年鉴类目设置的科学性是按分类法编辑年鉴时对年鉴框架设计的根本要求。年鉴框架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信息资料进行科学、规范分类。做到分类科学,领属得当,层次清晰。地方综合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在编辑过程中,体现在框架设计上存在问题有:

#### (一)分类标准不一致。

在地方综合年鉴中,根据编辑实际,同一级类目内,可以行业、事业性质来划分分目,也可以地域性,或以内容、形式划分分目。设立类目分目的标准要尽量统一,避免几种标准交叉使用。如《年鉴》2016卷,中国共产党xx市委、xx人民代表大会、xx人民政府、政协xx委员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构与负责人、法制·司法、军事、改革·开放·开发、宏观经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社会事业、社会生活、郊区概况等16个类目。该年鉴前10个类目根据行业结合社会分工科学分类,系统性强,后面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按产业来划分,出现两种分类标准。国家统计局先后在1985~2017年四次对三次产业划分作了专门规定。即: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第三产业是除上述各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它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它又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旅游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部门等。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的划分,这个市的篇目应设置为特载、概况、大事记、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县区与开发园区概况、先进人物·先进集体。而中国共产党xx市委、xx人民代表大会、xx人民政府、政协xx委员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构与负责人、法制·司法、军事、改革·开放·开发、宏观经济、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等都应取消。再有有的地方综合年鉴在教育类目下先按教育的不同层次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划分分目,然后又以招生考试、改善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文体工作、教育改革等设立平行分目,造成分类标准的混乱。

#### (二)内容归属不当。

地方综合年鉴内容是否归属得当,其实就是体现对一个地方的信息资料进行科学、合理划分的要求。对信息资料的分类应按信息资料的性质进行分类,对各供稿单位所提供内容分属不同分目的现象,要把不同性质的内容信息资料进一步按性质分类,然后放入不同类目或分目。内容归属不当的原因,主要是对某些机构的社会属性及工作情况、业务范围不甚熟悉,受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而未能按资料的性质进行分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片面采取行政分类法,一个行政部门对应一个分目。如《年鉴》2010卷片面采取行政机构领属,在市政府工作中,将属于文化内容的地方志、党史研究归属于市政府类目,将属于教育内容的党校归入市委工作类目等。这些都是按行政机构分类,未按信息性质进行分类的表现。二是对不同单类的同类信息资料未按性质进行归类。如某地综合年鉴交通类目所设的交通运输局、公路分局两个分目中,其中公路建设、公路养护、路政管理等都是同一性质的条目,但因分属不同管理主体,造成同类分割,显然属归类不当,应将两个分目合并为“公路交通”分目,然后根据内容性质分类设计条目。三是应按社会事业部类和社会实际分工进行分类的却牵强附会到按性质分类。如将国土规划设在农业中,将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气象设在经济管理中,把国有资产管理放在贸易

下,将县委的农工部工作、粮食流通归入农业类目,将市纪检委的行政监察工作归入法治类目,国土规划是经济管理部类、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是交通部类,气象是文化部类,行政监察是市委监察局的事业,粮食流通应属于商贸流通部类等。

### (三)层级不清。

年鉴框架的相同层级是并列的关系,每个层级所含的范围、所处的地位,除反映地方特色内容之外,都应该在一条水平线上,不能大小不一、层级不清。如有的地方综合年鉴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各项事务归结到一起,在一级类目中设政治或党政类目,同其他领域里的行业,如工业、农业、商业、城建、教育、科技文化等并列,将政治这个大概概念与具体行业等同起来是不协调、不规范的。政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5年版p1742,是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政治相对应的,应是经济、文化、社会等概念。再如《年鉴》2016卷,在类目“党政”中,分为中国共产党定西市委员会、市委办公室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讲师团工作、日报社、机构编制工作、农村工作、纪检监察、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政协市委员会等26个分目,这里的问题是,其中的组织工作、讲师团工作、定西日报社、农村工作、驻京办事处等是市委、政府的事务工作和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上层领域并列,整个类目呈现出主属不分、大小不一,层次不清。

## 四、地方综合年鉴类目编排的逻辑性问题解析

地方综合年鉴内容全面系统,类目少则一二十个,多则三四十个,条目则更多达一二千条。类目、分目、条目体现的是分类结构和层次,要符合逻辑关系,必须讲求编次,系统编排,才能体现内在逻辑性,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一般的要求是,年鉴基本内容按综合情况部分、百科部分、辅助资料部分

的顺序安排。百科部分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逻辑顺序安排。同一分目下的条目遵循从全面到具体、从综合到专项、从重点到一般的排列原则,按综合性条目、专题性条目、单一性条目顺序编排。同一分目中的单一性条目按时间先后或事件轻重主次排列。由于地方综合年鉴内容覆盖面宽泛,分类体系严谨规范,条目记述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导致年鉴框架编排逻辑性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 (一)百科部分类目编排顺序逻辑性不强。

地方综合年鉴百科部分是年鉴内容的主体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因而地方综合年鉴百科部分的类目编排顺序一般遵循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这一暗设大类划分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不少地方综合年鉴百科部分的类目编排却忽视这一暗设的逻辑关系。如《年鉴》2010卷类目中,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属于政治;城乡建设·开发园区、农业、林业、交通邮电、商业贸易、经济管理属于经济;党派群团、军事政法属于政治;财税金融属于经济;出现的问题是按政治-经济-政治-经济-政治编排顺序,内容混淆排列,没有很好处理逻辑顺序关系。如《年鉴》2015卷百科部分类目的编排如下:党政群团、法治武装、城建环保、科教文卫、社会事务、项目建设、荣誉成果、年度人物等18个类目。该编排方式基本遵循主体逻辑要求,但还存在不足,主要是将属于经济工作领域的“项目建设”从经济这一大类中分割开来,置于社会这一大类类目之后,违背了主体逻辑要求。

### (二)同一分目下条目编排顺序逻辑性不强。

地方综合年鉴同一分目下的条目是年鉴的最低分类层次,也是年鉴最基本的记事单元,年鉴条目的基本类型分为综合性条目、专题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同一分目下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条目的编排逻辑遵循综合性条目、专题性条目、单一性条目的先后顺序编排。大多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未顾及这一要求,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综

合性条目缺失。如《年鉴》2015卷百科部分的“发展和管理”分目下设立的条目为：经济运行、项目建设、“十三五”规划编制、公务用车改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体制改革、银西高铁项目协调等；统计管理分目下设立的条目为：统计服务、基础建设、数据质量、重点工作、统计管理等。以上两例明显缺失综合性条目。一般来说，地方综合性年鉴的每一分目下都应设有综合性条目，用以从全局的高度综合反映该领域(部门)全面情况。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同一分目下设有条目较多，条目编排顺序逻辑性不强。如某地综合年鉴工商行政管理分目下设立条目有：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合同监督管理、市场主体注册管理、市场主体监督管理、广告监督管、工作概况、商标监督管理、市场规范管理、工商信息化建设等11个条目。该分目下的条目编排存在简单罗列现象，未遵循同一分目下的条目按照从全面到具体、从综合到专项、从重点到一般的排列原则。首先应区分条目类型后按综合性条目、单一性条目顺序编排，然后再将单一性条目按时间先后或事件重要程度排列，以上问题便迎刃而解。正确的排法是工作机构、工作概况、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 五、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其他问题解析

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在符合内容全面、分类科学、归属得当、编排有序的前提下，还得注意一些规范性细节问题，常见的规范性细节问题有类目容量过大或过小、不恰当的升格、标题不规范等等。

#### (一)类目容量过大。

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在符合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所设类目的外延及其内容含量应与其他类目大致均衡，否则个别类目外延过于宽泛，导致类目间容量不均衡。如《年鉴》2016卷设18个类目，其中“社会事业”类目分为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科学技术、气象、地震、文化管理、社会文化、文物工作、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书画艺术、红十字事业、体育等23个分目，且不论该类目设计是否合理，经与其他类目对比，不仅其分目数量偏多，而且其内容总量已经达到全鉴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如《年鉴》2015卷设有“党政群团”类目，其外延就更宽泛，将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及人民团体全都囊括在内，其外延明显过于宽泛，内容太庞杂。可见，地方综合年鉴类目设计时外延过宽、容量偏大，必然造成类目间比例不均衡，应根据实际分解设计出多个容量基本均衡的类目方能克服其弊端。

#### (二)类目容量过小。

与上述的地方综合年鉴存在类目容量过大的情形相反，某些地方综合年鉴所设计的类目外延狭窄、内涵单一，内容篇幅又十分局促，同样也造成了年鉴各类目间比例失衡。如某地综合年鉴所设计的“科学技术”类目，下无分目，仅仅设有8个条目(组织实施科教项目、知识产权战略、科技创新体系、专业技术服务、科学事业管理等)，甚至不及个别类目中分目的篇幅，显然该类目容量过小，应与性质相类似的文化类目合并才妥当。又如，某地综合年鉴设有“教育”类目，下设五目，仅仅编排有7个单一性条目(概况、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族教育等)，明显不具备设置独立类目的资格，应与所设的“卫生”类目合并。

#### (三)不恰当地将分目升格为类目。

年鉴框架应突出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为突出地方特色，有的地方综合年鉴将分目升格为类目，通过多角度的分目条目设置，全面详实地呈现地方独有的优势资源或产业特色、民情风俗，如果设置恰当是允许的。如《年鉴》2013卷在突出康乐特色方面，在一级层次设置“产业培育”“民族宗教”类目，从全县肉牛、育苗、中药材、劳务、旅游产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作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康乐宗教工作、民族民俗、方言礼仪等方面详细进行记述，突出了作为全县特色亮点的五大优势产业和民族宗教内容，资料

详实、特色鲜明。但某些地方综合年鉴将分目升格不太妥当。如《年鉴》2015卷将属于教育的“国家级重点中专”“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分目升格为类目,与教育并列,再如《甘南州年鉴》2017卷将“消防”“森林公安”与分目“公安”并列就会造成喧宾夺主的感觉。升格处理要考虑栏目的分量与客观实际是否相称、逻辑关系是否顺当,随心所欲的标新立异不等于独具特色。

#### (四)标题名称不规范。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二章十三条规定:“年鉴各层次标题应准确、规范、简洁。”准确、规范、简洁地确定类目、分目的名称和条目的标题,是做好框架设计的基本要求。栏目标题最好使用名词、名词性词组、主谓词组。一般不用动词或动宾词组、动补词组做标题,也不能用太专业化的术语、行话和不规范的其他语词做类目、分目标题。具体表现在:

其一,关键词缺失。例如“引进”没有主语,缺失前面的关键词,外延无边无际,必须加主语科技人员为“科技人员引进”“检验检疫”缺失前面的关键词“进出口”“应急指挥”缺失前面的关键词“突发事件”“工商”缺失后面的关键词行政管理,“规划建设和管理”缺失前面的关键词“城市”;其二,随意使用不规范的简称或缩略语。例如“农林牧副渔”“科教文卫体”“妇联”“党群工团”“党政群团”等等;其三,名不符实。绝大多数地方综合年鉴都设置“法治”或“法制”篇目。究竟应该写作“法制”还是“法治”呢?首先要弄清楚这两个词的含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5年版p370,“法制”是指“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法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法治”是“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地方综合年鉴设置“法治”(法制)篇目,显然不是收录“法律制度体系”的信息资料,而是收录“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信息资料。实际情况也如此。“法治”篇目收录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立法工作、政府法制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等内容,都属于依法治省、区、市、依法治市、地区、自治州、依法治县市、区,所以写作“法治”更准确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市辖区年鉴中并无立法的内容,实际上县级行政区域除民族自治县之外,均无立法权;一般的地级市除了省会城市外,也没有立法权。因此,一般市、县区年鉴的“法制”栏目更名为“政法”或“司法和依法治理”更好。再有类目“金融”的标题,有些综合年鉴类目标题设置“金融·保险”或“金融·保险·证券”篇目,混淆了大概念与小概念的逻辑关系,这样设置是错误的。“金融”是“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以及证券交易等经济活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金融机构的理解,认为只有银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经济活动逐渐增多,金融业的涵义应该覆盖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行业。设置“金融”栏目,将这些行业的信息资料收入是正确的。正确的设置应该是“银行·保险”或“银行·保险·证券”或“金融”;其四,大小标题同名。一方面指的是内容不同标题相同。例如,“综述”“概况”“队伍建设”“业务发展”“自身建设”“项目建设”“对外交流与合作”等等。这类标题由于关键词缺失,内容界限不清,专指性不强,重重复复出现。也会给读者检索带来诸多不便。二方面指父子同辈,涵盖范围重叠。如在工业类目下设工业分目,在卫生类目下设卫生分目。其五,画蛇添足。指的是标题名称不够简练,拖泥带水。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电信业务发展”“水利发展”“民族事务工作”“案件执行工作”“统战工作”“组织工作”“商业贸易”等概念赘余,“商业贸易”也即商业活动等等,末尾的“发展、工作”“贸易”二字都是同义反复,应当删除。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 新媒体时代方志文化传播浅析

赵 峰

**内容摘要:**新媒体时代,需要以新媒体技术推动方志文化传播和应用。然而,传统媒体不能满足新时代方志文化传播的需要,方志机构在新媒体传播平台和内容建设上发展滞后、不平衡。方志机构要从传播工作者(人)、传播平台、传播内容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方志工作者主观能动性,提升工作者新媒体素质,树立营销意识;搭建和健全各种方志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包括方志网站、移动网络、微信、微博、手机短信报纸;精选、编辑方志内容,通过传播平台推送给广大用户,促进方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 方志文化平台内容 网络 微信 数字化资源

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媒体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信息传播方式也在不断的改变,方志文化应用载体趋于多元化和个性化是大势所趋。传统的方志文化传播和利用模式已难以满足广大用户的个性化需要,需要以新媒体技术推动方志文化传播和应用,充分发挥地方志的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 一、传统媒体不能满足新时代方志文化传播的需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媒体是方志文化传播主要平台,传统媒体平台主要包括图书、报刊,还包括广播、电视。当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2015年末,全国网民规模近6.9亿人,智能手机保有量9.5亿台<sup>①</sup>。人们阅读知识、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阅读图书,喜欢从电脑网络、移动网络、微信、微博等平台寻找信息,人们阅读方式逐渐被电脑阅读、移动阅读取代,电脑、手机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同时,看电视、听广播也逐渐被电脑、移动设备取代。据统计,2015年,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达到60%,较2014年的51.8%上升8.2个百分点。微信阅读率

为51.9%,较上一年的34.4%上升17.5个百分点<sup>②</sup>。同时,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阅读方式趋于“碎片化”。传统媒体越来越受到冷落,阅读大部头志书,越来越不可能了。显然仅仅依靠传统媒体不能有效传播方志文化,需要新媒体技术传播方志文化,从而适应当代人阅读“碎片化”的需要。

方志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在继续利用传统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平台(传播渠道)传播方志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海量信息等巨大优势,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渠道),随时把方志文化传递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数字电视机等终端设备上,通过电脑网络、移动网络(如手机、平板电脑网络)、即时通讯(如微信)、社交网络平台(如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地获取各种方志信息,同时可以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普及,方志部门利用手机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宣传方志文化应该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因技术、财力、人力不足,方志机构在利用新媒体开展方志文化传播方面做得还不够,尤其是一些方志部门虽开通了方志网

站、公众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但还存在形式简单、更新不够、内容特色不明显等问题,方志文化传播的效果也不明显,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方志文化传播的需要。

(一)方志机构新媒体传播平台建设不平衡

1. 全国方志网站发展不平衡

根据中国方志网《全国地方志系统网站、网页建设和方志馆建设情况统计表(2015年度)》(截止2015年10月31日)<sup>①</sup>分析,全国方志网站共1073个,其中省级27个、地市级230个、区县级816个,分别占省、地市、区县数(分别为32、391、3079个)的84.38%、58.82%和26.50%<sup>②</sup>,表明全国还有相当多地区方志网

站没有建成,区县级极不乐观<sup>③</sup>。

2. 全国方志机构微信公众号发展滞后

根据赵明明、吴韵<sup>④</sup>的研究,2016年4月21日,微信中“搜索到130余个地方志微信公众号,其中国家级1个,省级13个,省级以下116个”,与全国方志网站1073个相比,明显偏低。2017年3月初,笔者对16家方志网站进行分析(如表一),其中只有9家有微信公众号,分别为方志杭州、方志太原、苏州地情、方志上海、方志广西、方志四川、安徽地方志、方志北京、方志新疆。显然全国多数方志机构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方志文化传播方面较为落后。

表1 16家地方志机构微信、微博、手机网站基本情况

序	网名	微信公众号/更新内容*	微信公众号栏目	微博/更新内容*	手机版网络
1	上海金山地情网	-	-	-	-
2	青浦史志	-	-	-	-
3	长宁档案信息网	-	-	-	-
4	潼关县地情网	-	-	-	-
5	中国杭州	方志杭州 153条	杭州故事(武林掌故、人物春秋、风雅钱塘、光影杭州)方志动态(工作要闻、成果荟萃、关于我们)3D方志馆(3D方志馆、入馆指南、阅览服务)	-	-
6	太原方志网	方志太原 12条	无	太原地方志办公室/0条(2013-12-6)	-
7	宁波方志网	-	-	宁波党史/0条/(2015-5-18)	-
8	苏州地方志	苏州地情 117条	微官网(全景方志馆、方志动态、数字地情、一键导航、联系我们)微方志(名人士绅、璀璨非遗、苏式生活、光影苏州)微书店	苏州方志/0条(2016-7-18)	-

9	广州市情网	-	-	广州市情/12条	-
10	上海通	方志上海 /74条	关于我们(上海通网站、上海通志馆)	-	-
11	广西地情网	方志广西 /25条	广西地情(链接广西情)会议培训(讨论群)	-	-
12	四川地方志	方志四川 /107条	四川方志(四川省志、四川年鉴、四川旧志、读志用志、志鉴研究)巴蜀史志(文化纵横、史料之窗、蜀中人物、风物名胜、民俗风情)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简报、领导讲话、通知公告、机构概况)	方志四川/0条 (2016-03-02)	有
13	安徽地方志	安徽地方志 /2条	无	-	-
14	北京地情网	方志北京 /38条	方志工作(动态要闻、特别关注、方志法规、领导讲话)北京地情(查询志书、年鉴全文数据库)志说北京(古都中轴线上的桥、雨中登银山、鼻烟由来、漫话京城国宴、沧海桑田壮丽画卷)	方志北京/0条 (2012-04-16)	无
15	新疆地情网	方志新疆 /31条	关于我们(单位简介、修志工作、联系我们)应用服务(公告、文献法规、方志文件、修志理论)地情网站(链接电脑版新疆地情网)	新疆地方志编 纂委/0条 (2015-3-25)	-
16	陕西省地情网	-	-	-	-

\*:2017年1月1日—3月6日,更新内容情况。

### 3. 全国方志机构微博公众号发展滞后

根据韩旭、赵冰研究<sup>②</sup>,2016年3月,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官方微博共计66个,明显偏低。笔者对16家方志机构进行分析(如表一),其中只有7家有微博公众号,分别为太原地方志办公室、宁波党史、苏州方志、广州市情、方志四川、方志北京、新疆地方志编纂委,比微信公众号更少。显然全国方志机构在利用微博平台进行方志文化传播方面较为落后。

### 4. 全国方志机构手机版网站发展滞后

笔者对16家方志网站进行分析,其中只有四川地方志1家有手机版网站,字体适合手机屏幕,符合用户使用习惯;其余15家网站没有手机版,用户通过手机访问时,手机网络浏览器界面不友好,小小手机屏幕原样显示网络电脑版页面,字体极小,用户使用极不习惯。显然全国方志机构在利用手机版网站进

行方志文化传播方面相当落后。

#### (二)方志机构新媒体传播内容发展不平衡

##### 1. 全国方志网站方志文献数据库建设不平衡

方志文献数据库是方志网站的核心内容。多数方志机构建立了方志网站,设置网页,但是没有建立方志文献数据库。2016年5月末,笔者利用百度搜索关键词“方志网”,在前列的有28家方志网站<sup>③</sup>。其中13家网站<sup>④</sup>没有建立方志文献数据库,广大用户不能通过互联网检索、浏览、利用当地方志文献;4家网站<sup>⑤</sup>提供了整本或者分卷文本(pdf或者word格式)下载,但没有将方志数字化资源组织、构建成为方志文献数据库,广大用户同样不能通过互联网检索、浏览、利用当地方志文献库。

方志网站方志文献数据收藏文献不平衡。①收藏方志文献是方志数据库的关键。分析16家网站方

志文献数据库(如表二),其中11家网站收藏文献40部以上,5家不足39部。其中,省级方志网站相当丰富,地市级比较丰富,区县级偏弱。②16家方志网方志文献数据库收藏文献品种多样,年鉴收藏齐全的有13家;党史、志书、年鉴3种文献收藏齐全的有3家;但太原方志网、四川地方志、安徽地方志3家网站

只收藏志书1种,品种单一。③志书中,本政区志、专业志、下级政区志3类文献均收藏的网站有10家,有6家只收藏2类文献。新志、旧志2类文献均收藏的有青浦史志、宁波方志网、苏州地方志、广州地情网4家,品种丰富。

表2 16家地方志机构网站基本情况

序号	网名	数字化程度/网页默认显示	检索志书内容: 网页内/网站内/百度	文本复制	地情资料库收藏	数量(部)	网站地情资料栏目、板块
1	上海金山地情网	图片化/页图像	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	志年鉴都成果库;金山年鉴13部、志书、志书(金山县志1部、金山续志1部、金山地名志1部)、其他文献3部	16	风景名胜、金山文化、金山人物、大事记、金山简介
2	青浦史志	图片化、文本化/页图像(可切换为页文本)	能(在文本状态下)/不能/不能	能复制页文本(进入文本状态后)	党史18部、县志(旧志5种、新志2部)、青浦年鉴16部、乡镇24部、专业志26部、其他出版物青浦史志15期)	91	人物春秋、大事回眸、民俗文化、图片视频
3	长宁档案信息网	文本化/节文本	能/不能/不能	能复制节文本	区志年鉴栏目:长宁区志1993-2005、长宁区志、长宁年鉴13部	15	政策法规、政务公开、行政许可、信息公开、档案展示、区志年鉴、档案史志
4	潼关县地情网	文本化/节文本	能/能(数据库检索入口)/不能	能复制节文本	地情资料库:陕西省志92部、陕西年鉴28部、市县志132部、市县综合年鉴103部、市县地情书109部	4	省情概况、三秦人物、民俗风情、光彩陕西、风采图库、文物古迹、文化视野民生工程、走遍三秦、陕菜小吃、历史上的今天、影像陕西
5	中国杭州	文本化/节文本	能/能(网站统一入口)/能	能复制节文本	走进杭州栏目:杭州市志1部、杭州年鉴15部	16	杭州概览、杭州统计、杭州图库、视频资料
6	太原方志网	文本化/节文本	能/不能(全网没有任何检索入口)/能	能复制节文本	太原市志1部	1	名胜古迹、名镇名村名街、名店名吃名产、民情风俗、历史文苑
7	宁波方志网	图片化、文本化/页文本(可切换为页图像)	能/能(数据库检索入口)/不能	能复制页文本	历史文献数据库(党史文献4部)、地方志全文数据库(宁波市志3部、区县志4部、专业地方志1部)、年鉴全文数据库(宁波年鉴17部、宁波统计年鉴7部)、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旧志10部)	46	宁波市情、宁波展望、宁波研究、宁波之最、宁波人物、革命遗址、党史胜迹、红色旅游、以史为鉴、它山之石、图说宁波、中共党史、浙江党史、宁波党史
8	苏州地方志	文本化/节文本	能/不能(全网没有任何检索入口)/能	不能(复制功能被锁定)	志书博览:苏州市志1部、市(县)区志11部、苏州旧志9部、专业志57部、乡镇村志125部、地情书6部、史志资料选辑33部	209	地方文化ABC(历史掌故人物、文物古迹、概况沿革、桥梁、风俗方言、名店特产、园林名胜、城门街坊、其他、工艺美术)、苏州老照片

9	广州市情网	图片化、文本化/页图像(可切换为页文本)	能/能(数据库检索入口)/不能	能复制页文本	市情数据库:志书库(广州市志(1840-1990)21卷、广州市志(1991-2000)10册、区县志(1840-1990)12、区县志(第二轮)12部、其他志书(1840-1990)1部)、年鉴库(广州年鉴33部)、古籍库1部、地情文献21部、刊物库28年全部羊城今古	111	走进广州、党政要闻、今日广州、行业之窗、三中心一体系、城市当家人、广州大事记、千年商都、广府文化、革命风云、开放前沿、广州之最、广州人物、市情专题、影视广州、图说广州
10	上海通	文本化/节文本	能/能(网站统一入口)/能	能复制节文本	地情资料:上海通志46卷、区志17部、县志14部、专业志100部、上海年鉴19部、区县年鉴链接19个、特色志4部、专志12部	212	机构简介、政务公开、法律法规、史志动态、聚焦上海、媒体报道、图片展示、活动专栏、公告栏、培训专栏、当代上海研究所、上海通志、区县志、旧志鉴、专业志、上海年鉴、区县年鉴、地情资料、地情研究、上海滩、上海地方志、上海通志馆
11	广西地情网	文本化/节文本	能/能(数据库检索入口)/旧网能、新网不能(网站与数据库网址不同)	能复制节文本	广西通志(第一轮88部、第一轮15部)、市志(第一轮24部、第一轮3部)、县志(第一轮88部、第一轮19部)、地情书(10部)、方志论著(4部)、方志期刊(1982~2015全部)、广西年鉴(21部)、市县年鉴(市年鉴7部、县年鉴16部),部分为pdf格式	294,其中部分为pdf格式	广西概览、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名镇名村、名优特产、风光名胜、民族民俗、族谱家谱、地情专题、百科撷萃、广西之最、视频图片、时政地情
12	四川地方志	图片化、文本化/页图像(可切换为页文本)	不能/不能/不能	能复制页文本	省志数据库:《四川省志》(1840-1985)40部	40	特色文化、民俗风情、风物名胜、蜀中人物、史料之窗
13	安徽地方志	文本化/节文本	能/不能/不能	能复制节文本	省情数据库:安徽省志18部、省辖市志17部、县(市、区)志9部、山湖志7部	51	省情概览:安徽概况、皖籍名人、民风民俗、历史风云、风景名胜、土特产
14	北京地情网	图片化、文本化/页图像(可切换为页文本)	不能/能(数据库检索入口)/不能	能复制页文字(进入文本状态后)	志书检索:志书(中市122部、区县志18部);年鉴检索:年鉴库(北京年鉴26部)	166	燕都风物、志说北京、京韵视听、图像北京、区县概况、北京概览
15	新疆地情网	文本化/节文本	能/能(网站统一入口、数据库检索入口)/不能	能复制节文本	新疆通志(一轮)82部、地县志(一轮)90部、新疆年鉴	201	新闻中心、法规文献、方志文件、新疆地方志、方志信息、县市概况、新疆向导、影像新疆、地情资料库、公告、人物新疆、图说新疆、游遍新疆、全疆概况、今日新疆、数字新疆、方志之窗、电子地图、下载中心
16	陕西省地情网	文本化/节文本	能/能(数据库检索入口)/不能	能复制节文本	地情资料库:陕西省志92部、陕西年鉴28部、市县志132部、市县综合年鉴103部、市县地情书109部	464	省情概况、三秦人物、民俗风情、光彩陕西、风采图库、文物古迹、文化视野民生工程、走遍三秦、陕菜小吃、历史上的今天、影像陕西

## 2. 全国方志机构微信公众号内容不平衡

栏目设置不平衡。9家方志微信公众号中,5家设置栏目丰富,有3、4个栏目,还有二级子栏目。但是方志太原、安徽地方志2家不设置栏目,方志上海只设置“关于我们”一个栏目,方志广西只设置“广西地情”“会议培训”2个栏目,太简略。

内容更新率偏低。查看9个微信公众号历史信息(如表一),2017年1月1日—3月6日,各个公众号发布信息情况不同,安徽地方志1条、方志太原2条,为发布数量居末的2家;方志四川107条、方志上海74条,为发布数量居前的2家,其余的介于17至53条之间。平均38.8条,相当于每月18.4条,远低于全国“微信公众号全年平均发文518篇”水平(相当于每月43.2条)<sup>①</sup>,总体数量偏低。

## 3. 全国方志机构微博公众号内容少

微博公众号内容更新不及时。2017年1月1日—3月6日,7家微博公众号只有广州市情1家发文,发文12条;其余6家都没有内容更新,所发文章都是2016年的或者更早的,甚至有最后发文是2012年(方志北京)。

### (三)方志机构新媒体传播平台功能不足

#### 1. 全国方志网站功能不平衡

浏览、检索、复制是方志网站以及方志文献数据库核心功能,实现了方志文献的浏览、检索、复制功能,方志网站才能吸引用户访问、利用,方志文化的传播才能实现。

浏览功能包括文本显示与图像显示二方面。分析16家方志网站方志文献数据库,通过互联网浏览工具或者网站提供的专用阅读工具,16家网站数据库都能够向用户展示内容。其中,金山地情网只能显示方志图书页面图像,不能显示文本内容,不能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如了解与注明图书出处);其余15家,既能显示方志文本内容(以及部分图照),又能显示方志页面图像内容,能够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方志文献数据库检索功能有网站外搜索、网站内搜索和网页内搜索3种形式。16家网站中,中国杭

州网、上海通和广西地情网旧库3家网站数据库3种检索方式齐备,广大用户能够方便检索到数据库中所需要的内容。金山地情网、苏州地方志、四川地方志3家网站数据库是3种检索方式全无,用户不能通过任何方式检索到方志文献数据库内文本信息,数据库对广大用户没有多大用处。

复制功能是指文本复制功能。16家网站方志文献数据库中,金山地情网(没有实现文本数字化)、苏州地方志网(关闭了网站文本复制功能)2家网站不提供任何文本复制功能,用户无法通过网络复制数据库中方志文献的文本内容,志书数字资源利用率极低。其余14家网站可复制方志文献文本,方志文献数字库利用效率高。

#### 2. 全国方志机构微信公众号功能不平衡

微信公众号可以提供多各功能,有些是公众号通用功能,有些是方志行业特色功能。

与用户交流、回复用户咨询功能是微信通用功能。3月10日上午8:20~8:29,笔者向上述9个公众号提问如下,“省志(市志)何处能够下载,请提供网址”。方志广西立即有个标准即时回复,提供“古建筑”“广西之最”“历史图记”3个选项让用户选择;其他8个公众号没有标准即时回复。当天至17:30分前回复最早的是苏州地情(11:42),其余依次是方志上海(13:42)、方志杭州(14:54)。其中,有效回复的只有方志上海与方志杭州,2家公众号都指明了在其方志网站上有相关内容,告知了网站名称。但是指明具体网址的只有方志杭州,用户点击可以直接进入相关网站,访问相关内容,最为便民;方志上海回复没有指明具体网址,存在不足。显然方志机构微信公众号大多与用户之间互动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微信功能。

方志行业特色功能包括检索方志文献数据库、链接方志网站等功能。7家微信公众号在栏目中,提供方志文献数据库检索功能的,只有方志北京,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检索北京方志文献。提供方志网站链接网址的有5家,用户点击即可进入网站,方便了用户,利于网站推广。其中提供网站电脑版链接的有

苏州地情、方志上海、广西地情、方志新疆4家,提供网站手机版链接的有方志四川。显然方志机构微信公众号推广方志文化意识不强。

## 二、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志文化

新媒体应用涉及人、平台、内容三方面。方志机构可以从传播工作者(人)、传播平台、传播内容三方面入手,充分利用新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方志文化。

### (一)发挥方志工作者主观能动性

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在新媒体时代,方志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方志工作者,方志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尤其是传播技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影响方志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方志文化传播依赖传播内容和传播平台二方面。传播平台可以委托技术公司操作(如网站、数据库建设)或者利用现有模板自己制作(如网络、微信、微博的文章),对方志工作者要求不高;然而传播内容需要方志工作者自己承担,需要方志工作者在大量的方志文献、地情文献中选择合适题材,加以编辑,还需要与用户互动交流,这个工作需要人的良好素质、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1. 提升方志工作者素质,熟悉并掌握新媒体知识和技能

当前提高方志工作的素质以适应新媒体对方志文化的新需求的任务刻不容缓。然而多数方志工作者思想比较保守,对新媒体的认识比较浅显,没有深入的了解,不能通过新媒体技术将方志文化传播最大化。方志机构应该加强对方志工作者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思维,主动接受新媒体带来的诸多变化;进行新媒体知识培训,普及新媒体传播技术,让方志工作者熟悉并掌握新媒体知识和技能。

#### 2. 方志工作者必须树立传播方志文化的营销意识

方志工作者不仅是方志文化生产者,更是方志文化传播者。方志工作者不只是单纯整理、编辑方志、年鉴,保存方志文献;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志文

化。作为方志文化产品生产者,方志机构以方志文化产品为中心;作为方志文化传播者,方志工作者要树立方志文化传播营销意识,以方志文化消费者为中心,关注用户需求,推销合适的方志文化产品。方志文化是地方情况真实记录,不传播只能是死物,只有传播出去,才能体现它的重要价值。当前新媒体已经广泛应用,在其他领域效果显著,方志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托丰富的地情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地方历史资料,主动选择高质量的、引人注目的方志文化内容,加以编辑,采用文字、视频、音频、图照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发送给广大用户,向社会公众讲述地方的发展与变迁,促进方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 (二)搭建和健全方志文化新媒体传播平台

媒体平台是内容传播渠道,没有网站、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方志文化内容无法得到传播,用户无法获取方志文化信息。从这一点来说,就需要方志机构管理者尽早地转变观念,搭建有效的媒体平台,开拓各种新传播渠道,与用户形成良性的互动。在现有情况下,可以发展方志网站、移动网络、微信、微博、手机短信报纸等平台。

建立和完善方志网站。方志网站是新媒体的一种,是网络环境下方志文化传播的有效工具。方志机构要重视方志网站的建设,开通自己的方志网站。省级、地区级机构应该建立独立网站;区县级机构可以依托地方政府网站,建立二级网站。方志网站要建立方志文献数据库,完善检索功能,设置相关网页栏目,注重网站的互动性,从多角度、多方面传播方志文化。

当前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网络、短信报纸传播方志文化是方志机构的当务之急。微博、微信公众号、短信报纸技术要求不高。方志机构要建立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账号,可利用微博、微信编辑模板,编辑并发布图文并茂的方志文化信息(特别是热点信息、引人注目的信息),与用户互动、分享、交流信息。依托方志网站电脑版,加以技术调整,建立

方志网站手机版,注意字号、图照、内容界面要适应手机屏幕。注重发挥微信、微博、网站等新传媒平台应用广泛、传播方式新颖、消息传递迅速的优势,不断推出方志文化内容文章。由于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短信报纸建设成本低,操作比较简单,只要利用模板可以制作,区县级机构可以优先建设的。

### (三)精选方志文化内容推送给广大用户

当代媒体领域是“内容为王”时代,内容是任何媒体工作核心,更应该成为方志机构文化传播目标指向。方志机构要积极建设内容,需要实现方志文献图文数字化;全力建设方志文献数据库,并发布在方志网站上;发挥方志工作者主观能动性,精心选题,挑选受用户关注的有价值的图文内容发布在网络(电脑版、手机版)、微信、微博、手机短信报纸上,有效传播方志文化。

#### 1. 实现方志文献图文数字化是新媒体内容建设的前提

有了方志文献的数字化,方志机构就能够较好地利用文献资源,开展电脑网站、移动网站与微信、微博的内容建设,编辑、发送网站、微信、微博的文章。从长远而言,方志机构不能够跨越方志网站、方志文献数据库建设,直接开展微信、微博公众号。因为广大用户需要数字化方志文献,需要通过电脑、移动设备访问数字化方志文献;方志机构组织编辑微博、微信文章也需要数字化方志文献提供资源,有了丰富的数字化方志文献,内容组织效率更高。

方志文献数字化包括图像数字化、文本数字化二方面,图像、文本数字化同步实现(即图文结合),是方志文献数字化的较好方式。由于财力、技术水平有限,区县方志机构一般无力承担方志文献数据库建设;而且数据库建设标准多样,能够承担数字化的企业众多,如果全国3000多区县各自弄一套数据库,各个数据库将是质量参差不齐,格式、显示样式多种多样,相互兼容难度大。因此方志文献数据库宜集中建立,以地区级方志机构为基础,全地区统一标准、统一数字化公司,建立全地区方志文献数据

库。

#### 2. 方志数据库是新媒体内容的重要来源

方志机构通过新媒体发布内容包括地情信息、方志工作动态、方志理论。其中地情信息是用户最关注信息,其主要来源是方志文献。数字时代,地情信息主要来源则是方志数据库。方志数据库包括方志文献数据库和各种特色数据库。

方志文献数据库要收藏当地全部方志文献,包括志书、年鉴、其他地方文献;志书包括本政区志、下级政区志和专业志(部门志、行业志),包括新志和旧志;新志包括首轮志书和二轮志书。在方志文献数据库的基础上,史志网站还要筹划建立其他数据库,短期内建立特色数据库或栏目(包括物产、风俗、人物、文化、风景等地情信息),长期内建立若干个专题数据库(可包括地名信息库、人物信息库、事件信息库、艺文信息库、景观信息库、物产信息库等),远期建立历史地理信息系统<sup>②</sup>。

#### 3. 选择、推送受用户关注的方志信息

方志机构发布内容包括地情信息、工作动态、方志理论等,广大群众关注的是地情信息。方志机构要通过方志网和微信、微博平台向社会广泛宣传地方历史与新成就,为用户提供全面便捷的地情信息服务,通过基于方志数字文献数据库的各种新媒体平台,利用可读性强的文字,精美的图片、专题视频、音频等形式,向用户推送内容,实现方志文化的有效传播。

方志机构要组建微信工作团队,以地情文化资源、方志文献数据库为基础,挖掘整理地方历史资料,选择、编辑、推送能够引起用户注意的地情信息。广西地情网据公众点击率看,点击率前三位栏目是“名优特产”“广西之最”“广西名镇”等地情特色的栏目颇受社会关注<sup>③</sup>,通过地情信息栏目“展台”功能,向广大用户展示志书、年鉴及其他地情书等“仓库”中内容。

编辑网站、微信、微博的内容(文章),要求确立合适文章标题,标题要符合内容主题,又吸引用户关



注。应用不同平台的编辑软件,把文字、图照、视频进行合理排版,使文章内容、字号、图照、颜色等适应不同媒体平台的用户界面,从而适应用户阅读习惯。

方志机构要注意挖掘内容,更要增加内容的附加值,根据数字媒体相关特点,进一步对内容进行深加工,从而有效地加大内容的覆盖面。数字化时代,面对海量的内容,人们更想看到自己喜欢和想看的内容。方志机构可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收集、加工和处理访问者利用方志信息行为的信息,确定用户兴趣倾向、进而向用户进行特定内容的推送。

#### (四)完善方志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功能

方志网站要向社会公众开放数据库,让广大用户能够无限制访问数据库,正常浏览数字化志书内容;向社会公众开放检索功能,方便用户实现方志网站外(如百度)、站内、页内3个检索功能;向社会公众开放复制功能,方便用户通过互联网复制方志文献数据库的内容,包括方志文本、图片和方志图书页面图片。

方志机构各种新媒体平台之间要相互推荐、推广,提供本机构其他平台的链接方式(网址链接或者二维码链接),方便用户访问其他平台,从而提高网站、微信、微博的用户访问量。例如,微信公众号,要有链接方志网站(电脑版或手机版)、微博公众号的菜单或者二维码链接。微信、微博公众号要提供方志数据库的访问接口,方便用户访问,提高用户访问量。

方志机构要重视与用户的互动沟通,增强方志文化传播的交互性。以往阅读纸质图书,只能局限于私人阅读,而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新兴的阅读方式更在意读者的分享与交流。方志工作者应该及时了解人们的兴趣,并积极的与其沟通、互动。各个新媒体平台特别是微信、微博公众号平台要完善在线咨询功能,安排专人及时回复用户询问,与用户互动交流,回复内容要具体准确;设置多个标准即时回复样式,根据用户询问文字情况,自动回复多种可能选择的标准内容。方志机构要借助新媒体平台搜集人

们不同的意见,并积极整理和反馈,通过新媒体的交互性营造一个开放式、共享性的交流氛围,让方志工作者在与人们交流的同时,轻松传播方志文化,提高方志文化的传播效率和准确性。

#### 注释:

①2016年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报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25/22/6915354\_570736607.shtml

②杜羽、刘彬:《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光明日报》,2016年4月19日09版

③《全国地方志系统网站、网页建设和方志馆建设情况统计表(2015年度)》(截止2015年10月31日),http://www.difangzhi.cn/zgdfz/zxtj/201602/25ecf973f0314c569692b3609f05a82d.shtml.

④根据《全国地方志系统工作机构情况统计表(2015年度)》(http://www.difangzhi.cn/zgdfz/zxtj/201602/fc4fd97a71234708a4c138e1981ac776.shtml)分析,全国省级行政单位32个,地市级行政单位391个,区县级行政单位3079个。

⑤赵峰:《“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史志网站方志文献数据库建设》《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集汇编》。

⑥赵明明、吴韵:《〈全国地方志微信公众号发展述评〉》《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0期。

⑦韩旭、赵冰:《浅析微博和微信在地方志工作中的作用》《中国地方志》,2016年。

⑧分别是,赤壁史志网、中国方志网、海南史志网、连云港史志网、无锡史志网、温州史志网、定海史志网、湖北方志网、江苏省地方志网、九江史志网、余姚史志网、徐州史志网、新昌县史志网、嘉善史志网、东海史志网、从化史志网、盐城史志网、曲靖史志网、嘉兴市档案史志网、甘肃地方史志网、大名纵横网一大名史志网、余杭史志网、平湖史志网、煤炭史志网、舟山档案史志网、鹰潭史志网、泸州史志网、抚州史志网。

⑨分别是,中国方志网、赤壁史志网、无锡史志

网、徐州史志网、嘉善史志网、东海史志网、大名纵横网—大名史志网、平湖史志网、煤炭史志网、舟山档案史志网、鹰潭史志网、泸州史志网、抚州史志网。

⑩分别是。新昌县史志网、温州史志网、甘肃地方史志网、余杭史志网。

⑪《2016年微信公众号数据洞察报告》,http://www.csdn.net/article/a/2017-03-01/15881599

⑫赵峰:《“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史志网站方志文

献数据库建设》《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⑬陈曼平:《浅谈地方志网站如何打造成地情信息的权威性网站》《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青浦区地方史志办公室)

# 地情信息融入公众生活之我见

——以兰州市地方志信息化为依据

于 彪

**内容摘要:**为适应“互联网+地方志”新形势,地方志资源在信息化强有力的助推下,地方志工作者要迅速转变传统编纂观念和方法,在管理者、编者、使用者之间通过“互联网+”建立起全方位互动交流平台,建立起相互交融的管编用良性循环发展态势,管理者、编者应站在公众角度,使“死书”变“活书”,让地方志成果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关键词:**地方志 读志用鉴 互联网+

## 一、提升地方志信息化对编者的全方位服务能力,打造大数据服务理念

在地方志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软件概念设计和需求分析阶段,人的思路、理念和细节考虑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软件好坏和功能强弱。一些部门和同志对方志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觉得不开展信息化建设,依旧能做好编修工作,认为信息化建设可有可无,一些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习惯于传统编修方式,对纸质材料编改审非常在行,对利用在线编纂系统进行无纸化修志编鉴存在排斥心理。

地方志的编修生命和目的在于读志、用志,地方志的信息化建设也应以此为目标。地方志文献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在志书编纂过程中需要查阅大量档案文献、会议纪要、数据报表等原始资料,并对其进行甄别、校对、整理、加工,其工作量极其繁重。通过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将上述内容以及流程纳入数据库和管理系统,分权限对数据库进行资料报送、编辑、修改、审核等全流程数字化,可以全面提升编纂效率。

目前来看,很多地区还停留在书目录入及数字

化扫描、拍照、识别的初级层面,如果地方志的信息资源开发只是将传统的纸质存放变成网络数字化的保管,而不对信息利用方式进行全面变革,不对已有静态地方志信息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开发与挖掘,社会化信息服务就不可能完成,地方志的文化价值必将大打折扣,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全国地方志系统尚未形成信息共享,各地信息资源多为自成体系,不提供软件接口,共享无从谈起。主要表现为数据库与数据格式无统一标准,不同数据库之间无法直接兼容、或形成有效关联;各网络平台大都为闭环运行,不能实现跨平台访问。这不仅给全国范围内地方志资源的有效利用带来困难,“互联网+”行动必将对全面深化改革解除信息封锁产生巨大推动力。

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深入开展与广泛应用,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三大功能,已成为地方志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规划纲要》,在“十三五”期间有所突破。突破点就是方志信息化,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

读志用鉴不是说说而已,是要用心去做,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品,化资源为产品,从原料、到粗加工、到精细加工,全产业链参与,向社会提供可选择消费的文化产品,要让公众乐意听、乐意看、乐意用,坚持精品意识、融入意识、共享意识、品牌意识,走混合型发展道路,引入战略合作,坚定推行全面信息化应用能力,要在线编纂系统中通过联编、联审,线上、线下的编纂,以方便编者为本,全面融入跨地区在线评稿、在线考核、在线统计,管理者要为编者提供大量可资参考的数字化作品,以提高编者编书效率和编书质量,管理者可随时跟踪书籍编纂进度,对上对下、对编者提供不同层面的大到涉及地区、行业、书籍数量、稿次,小到篇目章节、字数、完成时限等的大数据统计服务。

**二、转变服务理念,联合部门社会力量转资源优势为文化产品,开放共享,让产品说话来影响社会,提高受众面**

无论地方志管理者、还是编者都要想社会之所想、想公众之所需,对已有资源进行拆分整合,合作开发,全方位提供社会多层次需要的产品,真正制作出“适销对路”、小而精、全系列的产品或作品,提高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能力;拓宽用志领域,提升服务大局能力,为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服务;主动与其他部门协作,与社会力量合作,以产品或作品说话,以好产品、好作品发挥自媒体宣传作用,只有心中装着群众,才能开发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产品或作品,才有可能提高全社会读志用鉴水平。

加快地方志信息化下的馆网库一体化融合,统一接口规范、打破地域障碍、实现跨区域跨平台资源共享、建立全国范围重要书籍网上多级联审和网上资源统计考核制度,建立全国性志书、年鉴的网上评

比机制,加快实现全国信息化资源整合,逐步建立地方志集馆网库资源为一体的图文数据库全国统一查询系统,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跨区域微信矩阵群,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地方志资源的开放共享。同时,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广泛交流合作,运用不同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开发出适应各种需要的产品或作品,面向社会提供多层次、多角度、三维立体式服务。再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加工后的地方志成果,推动方志文化进影视、进广播、进报纸、进杂志、进教科书、进网络、进自媒体,进而推动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推动城乡方志文化建设,培育地方历史记忆。

新形势下的方志人,要勇于开拓创新,步子要迈大,视野要更宽更广。坚决跳出传统编志套路,敞开大门修志编鉴,大胆创新,积极探索跨区域网上修志编鉴机制,全面提高社会化参与度,在应用好现有信息化平台基础上,认真研究如何适应“互联网+地方志”这一新局面,融入新理念,加入新元素,叠加新模块,要在基础资料层、知识学习层和系统级层都有新的突破和全新认知,打造基于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云计算为平台,高效、标准、统一的全模块化应用系统,积极搭建数字方志馆框架,跨平台整合部门以及社会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分步建设碎片化、可重构“数字方志馆”,争取在“十三五”末基本完成“互联网+地方志”应用平台的搭建,实现国家统一平台下的馆网库互联互通、共享运行。

“互联网+地方志”的出现,将使修志和用志的方式都发生全面深刻变革,方志网站将成为最好的方志资源利用表现形式。在现有的地方志网站与数据库平台建设基础上,利用“数据挖掘”“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对方志数据资源进行处理,根据需要对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目标的内容进行挖掘、整理、开发,以决策部门和公众对地情信息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发可信度高、参考价值大的地方志产品,紧跟网络发展前沿技术,融入微信公众号、手机

地情网等发布平台,运用3D视频与动画技术将“数字方志馆”搬到网上,开设网上方志馆,除提供志鉴在线阅读外,还可根据需要适时开展各类专题宣传与网上展览,将其建设成为网上地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本地现有地情资料数字化应用的基础上进行横向、纵向联网,充分利用现有的方志网站,对现有系统进行优化整合,建立开放共享资源网络,建立连接国家及各地方志网站数据库的数据节点,通过第三方技术支持,促进跨平台使用,使全国方志行业之间地情资源互通互联,优势互补,实现方志资源的高效利用,为方志信息交流和共享提供支撑。提升信息网络安全和网络服务水平、细化信息采集与发布管理,实现各种地情资料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形成文化系统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健康有序开展,为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便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地方志横陈百业、纵贯古今,在本地区信息储量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标准化分类,建立标注统一、分类标准化数据库字典,以期能够对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对比,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任务进行分析,提供各行各业分布格局和演变历程,立体还原地区经济社会演进过程,为党委、政府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提供定制性的科学决策所需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直接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通过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使用影、音、相、模或可使用动画、动漫、3D、小品、小视频等流媒体技术手段,建立数据字典引入图文数据库,通过网站、微信、手机APP、展板、公益广告、知识窗等不拘一格的展示方式,形象还原文化内容,尤其是戏曲民歌、服饰方言、民俗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难以用文字充分表达的内容在新技术支持下能够得到更全面新颖的展现,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为社会为公众提供国情、地情教育,弘扬地区文化,促进方志文化广泛传播。

### 三、“互联网+地方志”在兰州市地方志的实践与设想

兰州市地方志信息化工作起步于2013年。初步是在兰州市政府网站设置网页,内容少、资料陈旧,立足实际,立项“兰州市地方志信息管理平台”并列入2014年财政预算,本着“开放、互动、易用、跨平台”的原则,以期建成全国同类系统先进水平。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平台,三套系统”,一个中心即平台数据中心,两个平台指信息管理平台和应用支持平台,三套系统是指门户网站系统展示、信息交流系统和数据接口系统。通过对信息管理平台及相关系统的建设,实现兰州市地方志信息资源统一管理和充分资源共享。核心系统就是可跨区域、不间断在线编纂系统,实现地方志各种资料的一体全网络化处理,以互联网“政务云”高速、大容量、高数据安全平台为基础,以企业级大型数据库为支撑,集网站、微信、手机APP、短信平台等应用发布为一体,内外结合,上下贯通,系统设计理念紧跟网络技术前沿,是目前“互联网+地方志”的系统级运行平台。在线编纂系统最大亮点就是全面实现按格式编排文档自动拆分、目录自动生成和无格式约束编辑新需求;实现全部编纂痕迹(编纂稿次篇目及内容)任意两两比对、任意两两同屏比对和同屏显示;实现了编者可以不需要通过资料上报系统而直接通过在线编纂导入相关文档,在判断无原始稿的情况下自动生成原始稿和第一稿,不仅实现了在线稿次的转换编辑,而且实现了离线文档稿次导入,全面响应编者的不同需求;实现全网系统下的全区域、全部书籍的编纂状态、书籍稿次情况及各稿次字数等从全部、部分、单一书籍的查询统计功能,到具备所有在网信息的大数据统计,实现表格、统计图的数据同步和数据下载。

今后将积极优化系统功能,适时引入游戏情景设计理念,精心打造图文声并茂的情景导引式操作,除系统管理员外实现编者无人培训自主编辑。全面

升级数据库为图文数据库,集图文声像管理为一体,全面支持各级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应用内容析出管理。定义动画、动漫、3D等流媒体数据字典,根据需要向社会购买定制公共文化产品,通过与部门协作,理顺共享机制,充分挖掘共享资源,分阶段、有重点的逐步建成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兰州“数字方志馆”。数字方志馆,作为一个涵盖各领域知识的中文知识平台,为兰州地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一种新思路、为文化兰州建设增加新元素。与传统地方志书相比,兰州数字方志馆更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传播性,浏览者可以更加方便地检索和浏览到兰州的历史遗产,让字字推敲的权威资料得以被更多市民所了解。兰州数字方志馆将包含兰州市、区县志、年鉴、地情资料丛书、兰州关键词等众多板块,利用电子“声光电”、3D技术手段,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分类、整合、资源再造(重构),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介绍历史上和现代的兰州。通过兰州市地方志网站进入兰州数字方志馆,人们可以按照类别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领域,在短时间内了解兰州的志鉴资源重构后信息,这不仅对兰州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保护意义重大,对兰州现代生活方式推广也有很大的正面引导作用。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整理、分类、挖掘、分析各种地方志资源,通过政府主导,实现地区相关资源的跨平台共享,向社会各界提供个性化的国情、地情信息服务。强化用户至上原则,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通过订阅、智能搜索等手段,实时向有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其所需的信息资料。如向地方领导提供资政参考资料,向专家学者提供与其研究领域相关的地情信息,向普通百姓提供地方民俗、旅游信息、方志文化等相关内容。

总之,在“互联网+地方志”的全力推动下,地方志工作者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开放思维、共享思维,坚决剔除不合理的传统思维定式,彻底转变观念和作风,以发展的眼光促进地方志事业做大做强,切实从“一本书模式”向十业并举转变,转向以用户为

先、创新引领、互联共享的开放式思维,在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上更大胆创新,紧跟新技术应用,不断升级优化系统模块,用好用活地方志资源,真正将“死书”变为“活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全行业融入新理念,加入新思维,叠加新动能,全力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全开放、内容丰富、多媒体网上“数字方志馆”,实现“有网就有地方志”,让志书鲜活起来、运动起来、立体起来。

#### 参考资料:

- 1.《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467号),2006年5月。
- 2.《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8月。
-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2015年10月。
- 4.《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印发),2015年7月。
- 5.《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甘政办发[2016]72号),2016年5月。
- 6.《兰州市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兰政办发[2016]178号),2016年8月。

(作者: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 方志“大众化”趋向简论

杨 先

**内容摘要:**从《越绝书》起,方志从来是士人等“少数人”的阅读专利,与普通大众无缘。若让地方志从“少数化”迈向“大众化”,需要从四个方面开拓创新:其一,遵循记述文体要素,语言达到“为民”目的;其二,关注镇村志的编修,让志书直接进村入户;其三,加大使用图照比例,增强直观阅读效果;其四,与时俱进,拓展志书的传播渠道。

**关键词:**方志 贴近大众 为民趋向

中国方志起源很早,在两汉时期,就出现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宋代,方志已体例初备,自成一统,最高统治者鉴于方志确实能起到良好的资治作用,确立方志编修制度,志书纂修代代相传。明代的方志又有进一步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但从《越绝书》起,方志从来是士人等“少数人”的阅读专利,与普通大众无缘。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志,时至今日,首轮修志基本结束,二轮修志已至关键时期,有的地方已筹划三轮修志。笔者因参与编修二轮志书,接触了不少志书,有些许体会,本文就志书如何贴近大众,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略述管见,希望对以后修志有借鉴意义。

## 一、遵循记述文体要素,语言达到“为民”目的

历代都有对修志目的的阐述,有的认为修志的核心目的在于存史,如盛端明道:“史氏之要有三,曰纪事,曰垂宪,曰贻远。三者虽各有主,然其本别存乎实耳。”<sup>①</sup>有人较强调志书的资政作用,如杨宗气提倡:“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邑以志为鉴。”<sup>②</sup>还有人提

出“为民”的新主张,如李濂“志之作,凡以为为民也,非徒备图籍,骋博洽,以夸耀人之耳目也。”<sup>③</sup>这些古代的方志学者分别阐述了修志“存史、资政、为民”的目的,很有学术见地。但就目前编修的许多志书来看,编修者往往围绕志书“存史”、“资政”进行修志,而忽略了“为民”的目的,这样修成的地方志普遍出现这样的问题:资料堆积,数据堆积,写成流水账;或者记事少,主干内容少,重要事件简略;或者一般性材料偏多、特色的事物记述不深。“少数人”看惯了文书,阅读这样的志书不成问题,但普通大众没有耐心阅读这么枯燥无味的文字,地方志教化的功能就丧失了。

志编成,就要用。王鉴之曰:“近世郡邑多有志,大抵患不以实不能垂诸永久。或成之而复更,或有之而不用,均为废器。”<sup>④</sup>古往今来,让大众用志,用方志教化民众,这既是方志的目的之一,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怎样让志书“興味盎然”地走进千家万户呢?还得从地方志本身的特点入手。地方志的任务是“记述”,决定它只能使用记述体,而不能采用公文文体、新闻文体、教科文体、文艺文体、议论文体、史体等文体。志书既然是记述体,就必然要遵

循记述文体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和结果。地方志的文风不但要求“准确、鲜明、简练”，还要求“生动”。语言生动，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形象化上。志书若通过浅显易懂而又有魅力的形象化语言，将事件、原因和结果，将事物的性质、情状，鲜明而具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闻其声，普通大众就会乐于接受，“为民”目的也就会达到。

志书作为传世之作，要求志书必须具备权威性、经典性，修志者要想推出高质量的地方志，就须整体把握“存史、资政、为民”的目的，不可偏之漏之。

## 二、关注镇村志的编修，让志书直接进村入户

志书级别不同，记事详略有异，“大率其志愈大，则其文愈简，而其事愈要。故志天下者略于省，志一省者略于郡，志一郡者略于县，其体然也，而势亦不得不然焉。”<sup>⑥</sup>志书到镇村级，记述会越来越详细，甚至记述的就是群众的身边事。这样的志书，大众喜闻乐见，走进千家万户“为民”便是必然。

近年来编纂出版的《周庄镇志》《枫泾镇志》《小榄镇志》《东山镇志》等首批中国名镇志，就非常贴近当地群众生活。如《周庄镇志》从周庄自身特质出发，着力体现周庄的“四气”，即水气、文气、人气、乡土气。全书着力展现了周庄发现、保护、开发和转型发展的历程，全书赋予了深沉的精神文化情怀。《枫泾镇志》重点记述了改革开放以后枫泾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展现了枫泾镇的风土人情和资源特点。这些志书符合“在坚持志体的前提下，体裁运用、篇目设置、资料选择等作适当创新。以记载镇域范围内的微观资料为主，详市县志之所略……从而达到执简驭繁、文约事丰、易于阅读、利于传播的目的”<sup>⑦</sup>及“行文力求朴实、严谨、简洁、流畅、优美，具有较强可读性。”<sup>⑧</sup>的要求，均获得当地居民和外界包括许多方志工作者的盛赞，成

为地方志中的精品佳作。

同样获得当地群众高度认可的还有《页渠村志》。这部村志由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镇页渠村三位年逾古稀村民编纂，详细记录了页渠村大事记、建制沿革、村民生活变化、教育、民间传说与民谣、人物传记等诸多方面内容，让村民了解家乡是什么来历，又经历着怎样的变迁。因是自己村民写的自己“村子故事”，村志贴近群众极接地气，志书发放当天，村里就像过喜事一样热闹。

## 三、加大使用图照比例，增强直观阅读效果

在地方志中使用图照由来已久。隋唐两朝时，图经已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志书发展较快。所谓图经，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隋唐时，图经已以经为主，图反成为辅了，更加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方志的性质。

图照指志书中的各种地图、照片及各种实物拓片、影印件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获取的卫星照片、遥感图片、电脑绘制的三维图像等。它具有直观的形象化的阅读效果，加深读者的阅读印象，以弥补文字表述的不足。图照是“无言之史”，一部优秀的志书，应是“文图并茂”的志书。以前的志书及首轮志书中，由于条件所限，志书中使用的图照不多；在二轮志书中，大多志书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图照，但仍出现缺少随文图照或者随文图照不多的问题，使得志书的直观性、史料性和可读性大受影响。普通大众翻看志书，满眼的文字数字，没有出彩的地方，很难爱不释手，志书也就达不到“为民”的目标。

中国名镇志丛书开拓性地对名镇志里的“图照”做了规定：“卷首设本行政区域位置图、行政区划图。志中随文配图，图下设说明文字，图文并茂。图、照选用应注重典型性、资料性、艺术性，无广告色彩，无个人标准像和领导工作照，无修饰加工。各志



图照与文字比例为1:3”<sup>①</sup>。《周庄镇志》《枫泾镇志》等方志的成功,给了三轮修志及以后修志工作一个重要启迪:如何能够在镇志以上的方志中加大使用图照的比例,“以图辅文”,让志书不要成为一种摆设,走下高高的书架,搁在家家户户的床头?

#### 四、与时俱进,拓展志书的传播渠道

纵观中国方志史,千百年来,纸质版是传统方志的基本存在形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化的发展,纸质版志书厚重,无法随身携带,已跟不上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十年前,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可利用PC互联网,设计制作了方志网站,将丰富的地方志资源在网上进行传播。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科技在进步,手机也正朝着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PC互联网会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移动互联网将占据我们生活中的主打地位。

我们可紧跟信息化时代步伐,将志书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传播,比如使用手机“微信”,利用微信这款互联网历史上增长最快的软件,利用现在大众出门没事就打开手机浏览的阅读习惯,将地方志中有吸引力的如承载乡音、乡俗、乡情、乡愁的内容,利用现代书写手段和影像技术,以全新的视角,制作成高质量、容量合适的图文信息或者音像志,“从根本上克服文字版志书记述人物不见其人、不闻其声,记述事件不见其直观场景的缺憾”<sup>②</sup>,在自己创建的抑或本地人创建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出去。人们在空闲时间拿出手机浏览页面和信息时,就会看到这些贴心的文字,在“朋友圈”的分享,推荐给自己的朋友阅读,如此,既可培育大众的爱乡、爱国情怀,又可让他们喜欢上地方志。

综上所述,若提高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有效发挥让地方志资源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让方志贴近群众接地气,走进千家万户,方志工作者及其他方志爱好者不必画地为牢固步自

封,需要强健方志自身,用雍容、大度、自信的态度,不断开拓创新方志的书写手段及传播途径,让方志从“少数化”迈向“大众化”。

#### 注释:

- ①盛端明《雍正揭阳县志》卷首《旧序》
- ②杨宗气《嘉靖山西通志》卷首
- ③李濂《嘉靖邓州志》卷首
- ④王鉴之《正德赵州志》卷首
- ⑤余坤《嘉靖淳安县志》卷末
- ⑥《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
- ⑦《中国名镇志丛书凡例(草案)》
- ⑧《中国名镇志丛书凡例(草案)》
- ⑨冀祥德《创新志书书写方式,推动方志文化普及——在中国名镇影像志启动仪式上的讲话》(2017年4月22日)

(作者:甘肃省古浪县地方志办公室)

# 杨凌霄《襄武人物志续编》

## 对陇西文史的贡献

王长华

晚清陇西士人杨凌霄(1841~1905),字壤三,又字九卿,号负阴子,巩昌府陇西县城东街人,著有《襄武人物志续编》1卷,《陇西艺文集》6卷,《壤三诗草》4卷,《壤三文集》3卷等。甘肃学政叶昌炽阅览其著作后,大加赞赏,特赐“襄武耆献”四字匾额,以表彰其对地方文史的重大贡献。

杨凌霄去世后,当时主讲南安书院的安维峻(以“陇上铁汉”著称于史),曾作哀悼之诗以追怀其事迹,为这位“陇上斯文”的离世感到十分痛惜。杨凌霄的平生操行,已被载入《甘肃通志》。

关于杨凌霄的生平,综合其子杨琛于民国22年(1933年)所撰《杨壤三墓表》,杨凌霄的学生王志霖于民国15年(1926年)所撰《候选州判杨凌霄德教碑》,以及《杨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可知其大略。

杨凌霄在年幼时,就在其父德堂公的庭训下,勤慎笃学。19岁那年,进入县学学习。当时,正值陕西发生回民事变,甘肃也受到波及,局势一时动荡不安。为了避乱,杨凌霄之父德堂公就挈妇将雏,来到汉中,暂时寄居在侄子杨晴川家中。杨凌霄就在这时,投入军营效力,办理军中文案事宜,先后在静宁、秦安和狄道(今临洮)等地,在军中参谋军机事务;还担任军需官,前往陕西略阳转运军需物资。在军中先后服务十年,对于陇上军事,了解得最为详悉。

同治五年(1866年),巩昌府城失陷,德堂公忧虑成疾,病歿于汉中。变乱平定后,杨凌霄离开军中,

将父亲德堂公的灵柩运回陇西安葬。后以优等秀才的身份而成为恩贡生,候选直隶州州判。不久,以保护城防的功劳,加五品衔。此后,参加了四五次乡试均落榜,于是,绝意仕进,在巩昌府城钟灵寺设馆教徒时近40年,培育和造就了许多品行端方之士。

### 踵武前贤 风励斯世

杨凌霄在讲学之暇,专心著述,凡是前贤遗稿,即使是残编断简,也必须搜罗辑录,他曾经说:“我们陇上自从经历过兵燹后,典章文书大都散佚,少有记载,将来整理文献以什么作为可信的凭据呢?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啊。”由此可见,杨凌霄先生对于挖掘和保存地方文献的拳拳之心!

杨凌霄在《〈襄武人物志续编〉叙》中写道:

天地之间充盈着清和秀美之气,山川之间蕴藏着灵慧秀丽之风,美好的风土孕育优秀人物,这样的人物必为品节纯良之士;这种灵慧秀美投射于物,则此物必为奇珍瑰宝。也就是说,一时有一时的人物,一地有一地的人物。推而广之,对于国家都城和郡县城邑来说,无不如此。

但论者以为,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是古代的圣王;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则是贤良的辅弼之臣。他们筹划治理国家大事的抱负和才华得到施

展,以后的君王和宰相,都把他们的事迹,视为规矩和法式,这是万世不易的道理。到了后代,才智杰出的学者和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也有巨大的功勋和盛大的业绩,被载于史册,留传于后世。后人欲效法古人,必以前代贤哲为典范!一旦看到这样多的杰出事迹,就会自觉地躬行实践。他们的谋划策略如果被记载于典籍,那么,后人浏览后,自然会感人性情,触发人们的感慨和敬慕。至于那些乡村野老,穷乡僻壤之处地位低微的读书人,即使有一点善行和一寸之长,就像黑夜中的火把所发出的微弱光明,也好比用钝刀割物,似乎就没有必要记载他们的事迹了吗?不过,有心人则会说:“前代贤哲,已经时代久远,难以追述;但乡里近邻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离我们很近,可以供我们仿效。与其以古人为楷模,不如以近邻为效法!”这就是杨凌霄搜集资料,记录乡贤事迹的初衷。

杨凌霄经常以陇西先贤、清康熙年间吴之珽先生所著《襄武人物志》为榜样。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取材较严,描写精细,颇得时人及后世好评。时任静宁州刺史的黄廷钰为其作序说:“阐发幽微,具史识;书法谨严,具史律;描写生活,具史笔,可与龙门庐陵相颉颃。”意思是说,吴之珽阐释和发掘幽深细微的历史故事,具有很高的历史见识;其著作体例严谨,法度严密,遵守了历史文章书写的规律;其文辞典雅生动,描写清新活泼,具有良史之妙笔,可与西汉司马迁著作《史记》、北宋欧阳修主持编修《新唐书》及撰写《新五代史》的历史功绩相媲美。这个评价无疑是很高的。

受此激励,杨凌霄立志要重续《襄武人物志》,为后世留下一部可资信赖的著作。

杨凌霄对于地方史料由于时代久远和遭逢战乱而寥落感到非常痛心:

从吴之珽先生生活的时代直到今天,又过了二

百余年,其间,著名人物、文人学士、孝子节妇,他们的事迹进入了国家历史,激励着当时当世的人们。但哪里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熟悉他们历史的人逐渐老迈凋零,再加上经过多次变乱,以致于他们的踪迹和事迹,在兵燹中毁于一炬,后人无从知晓。

面对这种情况,杨凌霄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虽然为此感到隐虑深忧,但命运窘迫,半生沦落,苦于力不从心。现在,我的身体日渐衰颓,犹如风中之烛,如果不能及时将这些先贤的事迹编撰成文,一旦我溘然长逝,对上而言,则有负上苍和父母生养我的深厚恩情,对下而言,则对地方史志没有一点贡献;从大处着眼,对于乡里风俗无所裨益,从小处来看,也没有尽到阐释潜藏的美德和发掘幽微的光明的责任。因此,我特别注意搜罗素材,用尽心力,采访和整理先贤的事迹,凡是地方上有一丁点善行可以表彰,一丝丝长处足以采用,并且脍炙人口的人和事迹,一共搜罗了若干数量,草创成集,以待朝廷使臣采用。令我惭愧的是,我下笔时判断也许不准,书写时也没有节制,而且言语多直率鲁莽,称誉未免失其实,褒奖或许有所过。因此,极希望当道各位名公,原谅我的胆大妄为;也希望后生贤哲,原谅我的空洞和粗疏。那么,我就非常感激,也非常幸运了。

## 采摭名流 搜罗俊逸

杨凌霄在《襄武人物志续编·壤三氏自序传》中,自述了编写该书的目的。

我杨凌霄,出身于古郡南安,家世低微,不过是寒门一介儒生而已。先祖母姓宋,自明代洪武年间,入籍于陇西,至今已五百多年了。自此后,世代耕田为业,诗书继世,虽然没有积累多少功德,但言行举止恪守规矩。到了我杨凌霄的这一代,不幸遭逢时

代变乱，巩昌郡城失陷；我在军营之中，戎马倥偬，十多年来一筹莫展；半生风尘碌碌，就连微小的进步也没有。不过，即使显扬的志愿没有伸展，但聊以自慰的是，清白之家风犹在。现在，已经是牙齿松动，头发花白，可叹来日无多。因此，只有殚精竭虑，不敢有一丝松懈。所幸的是，虽然到了暮年，但身体还算健康，于是，就赶紧采访名流，搜罗俊杰之士和隐逸之人的事迹，虽然语言难以避免俚俗和鄙陋，但事迹却必须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孝敬长辈、友爱亲朋，这是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如书中的太史武尚仁、都督陈立纲，家庭和睦，完全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范；清廉慎重是为官者的箴言，如知县侯树銜、刺史张敏行，洁身自好，爱民如子，无愧于一方父母官；咸丰壬子年（1852年）进士，后点刑部主事的田际春，为人醇厚谦逊，端方正直；咸丰年间入举为“孝廉方正”的原泮，言行举止，表里如一，堪足称道。即便是无赖之徒，见到他也会肃然起敬。张渭，品行端正，学问渊博；陈时夏，卓然不俗，世所罕见。但凡入学就学者，无不争相奉他们为楷模。一个地方，不仅在文化方面名人盛事迭出，更兼有雄韬武略方面的杰出人物，如提督军务总兵官萧福禄、游击将军李荣华，都是维护一方平安，保卫国家的大将。有忠孝就会有节义，如汪氏孺人、陆家孀妇，都堪为巾帼之中品节完美之人。没有听过欢声笑语，就难以理解辱骂言语的难听。两位续娶之妻都堪为一家典范，她们对于童蒙之辈都循循善诱，还更加注重养成子弟们敦厚的品行；两位先生都是在科举中有功名的人，丰衣足食之后，礼让之风才会兴起。朱照东兄弟和睦，旁人从无非议；人口众多，商贾才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做生意，比如祁兑就善于理财和屯积货物，人们都无不佩服他的经商才干。只要有一点小善，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如画师宋瑞因家贫未读书，号“不识道人”，却但以善于丹青而得

名；即使有了一点技艺，也要如实记载，如秀才樵忠以奇门遁甲而见重，且能观天文而识气候。虽然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良相，也要成为良医，治病犹如治国，如长于医术的张元、精于眼科的陆杰，都是妙手回春的精诚大医。虽然没有加入到儒门，但却舍身于法门，早功继以晚课，诵经念佛，以求解脱者，则有和尚汪静如、畅喇嘛这些世外之人。给事中及谏议大夫郭峻慷慨好施，往生于幸福之地；梨园弟子王有义光明磊落，不犯人妻。

以上各位人物，他们的事迹被写进史志，则会为地方增光添彩；载入史书后，尤其会对地方治理和教化特别有益。此外，还有如祁孝绪舍生取义，杨坦斋捐躯殉城的故事。看到大局已不可挽救，曲司铎、尚太学自焚其身；痛恨叛匪张牙舞爪，屠戮平民，范生员、祁世职率众巷战，我已经将他们的事迹编入《被兵纪》中，因此再不赘述。唉！古人已经远去，后人来不及将他们的事迹表彰于世，致使前辈流传下来的风尚消失断绝，这个过失还算是小的；而使得后来者无从考证，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因此，尽管我才能低下，但还是竭尽弩马之力，使他们的芳踪善行，不至于湮没。不才如我，续编《襄武人物志》，或许就是狗尾续貂，但只要先贤的事迹能够永远长存下去，我也就知足了。

## 手泽犹存 风徽共仰

关于杨凌霄在教学方面的贡献，其子杨琛（清诰授奉政大夫、五品衔、前四川重庆府经历、委署西固县长）在其所撰《杨壤三墓表》中，有较为生动的记述。

杨凌霄设馆教授生徒，首先重视的是学生的器量与见识，其次才是文学才华，并且以深明伦理、尊崇礼教为第一要务。因此，出其门下者大多为恭顺

谨慎之士。每逢生徒到了休假之日,就要求他们去游览本地的名胜古迹,详细观看所在之处的碑文和对联,第二天,再逐一考试询问。如果能够记下所到之处的文辞,则当面进行奖励;不能记下来或回忆不起来的,则进行教训和责斥。教学期间批阅学生的作文,一般不轻易修改,而是在命题的时候,选择古人文章中与此篇同一题目,但却为学生所没有见过的,先让他作成一篇文章,再取来古人文章进行讲解评论,然后让学生熟读而详细地记下来,所以学生们的进步很快,受到的教益也很多。

民国15年(1926年),杨凌霄的学生、前宁夏镇守使署参谋长、署宁朔县知事王志霖所撰的《清候选直隶州判恩贡生壤三杨老夫子德教碑》中,评价杨凌霄先生的著述时写道:“岂仅有功于一邑哉!其著书立说,实可以风世矣。”

其子杨琛还在《杨壤三墓表》中写道:

甘肃学政叶昌炽,遣人要来杨凌霄的著作看后评价说,这是有功于一邦之文献也!书赐牌匾以示奖励和赞许,并且在其门上悬挂:“襄武者献”,以昭告后来者。叶昌炽为当时的大学问家,曾是光绪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官,参与撰《清史》,后入会典馆,修《武备图说》,著述累累,卓然大家,而杨凌霄为其所称许赞美,则杨凌霄之道德文章可见一斑。

文末,录杨凌霄诗四首,以结束本文:

### 汉南题壁

腊雪凝冰日,携妻到沔阳。  
相随人两个,空洒泪千行。  
蓼叶编为屋,芦花装作裳。  
饥寒谁慰藉,犹幸见高堂。

### 昭君出塞

汉王思重相臣贤,图画蛾眉为靖边。  
只叹依身多薄命,敢云将士不争先。  
琵琶果可安华夏,环佩何妨委毳毡。  
南望雁门去隐隐,芳名青冢至今传。

### 首阳怀国

北海怀清志,西山避世忧。  
能知君父义,不愧弟兄心。  
大节流天地,名言贯古今。  
贤人虽已往,白薇墓前寻。

### 首阳山

莲峰对峙大川中,有客西山甘困穷。  
薇蕨年年犹送绿,弟昆何处挹清风。

(作者:甘肃省定西日报社)

# 论河西地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张克非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堪称为“轴心”的战略地带，千百年来它们对国家、民族的存亡盛衰影响极大。甘肃河西地区就是这样的地带。

## 一、历史上河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演变

河西是中国西部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存较多的地区。曾出现独特的四坝文化及其砷铜冶炼技术。占全国出土商代以前铜器总数80%以上的甘肃早期铜器，大部分出于河西，表明这里是中国早期铜器冶炼、制造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对青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春秋至汉初，羌戎、乌孙、塞种、月氏、匈奴相继占据河西。汉武帝时出击匈奴，设河西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直到隋唐时期，河西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汉唐时期，河西一直作为拱卫秦陇、经营西域的战略枢纽而备受重视。汉武帝时相继设置河西四郡，起到了在南北方向“扼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仇合约为中国患”，在东西方向拱卫秦陇、联通西域的战略作用，从根本上扭转了汉王朝与匈奴政权及其游牧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隋唐时期在与突厥等民族的较量中，继承重视河西的传统战略地位。唐初，褚遂良曾上书太宗，强调“河西者，中国之心腹”。经过100多年的经营，天宝初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汉唐历史证明，中央王朝只要能够有效掌控河西，就能够有效抵御、遏制来自北方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及其

政权的进攻威胁，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兴盛。

其二，河西历来是众多民族和东西方多种文化融合的舞台，也是孕育、形成许多过渡形态新文化的摇篮，对促进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通道，河西具有连接内地与新疆，沟通欧亚大陆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经由河西源源不断传入的多种物质、精神文化，以及它们在这里相互融汇、适应后所形成的许多新文化元素的注入，宋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绝不会如此丰富多彩、恢弘壮丽。

其三，河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战乱动荡中，发挥了保存、延续华夏文明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陈寅恪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此外，汉、唐在经营河西、西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和精神，早已成为传统爱国主义的典型象征，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

其四，河西曾经是最为富庶、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商业和因地制宜，耕牧结合，胡汉相融，注重商贸、交通、军事的复合型区域社会模式，具有内在优势和生命力。在汉唐经营河西过程中，中央王朝都非常重视开发河西经济，形成了独特的绿洲农业、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及管理体系，创造出不亚于内地的粮食亩产量，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唐代中后期及宋代，河西先后为吐蕃、西夏所占。元、明恢复对河西的控制。清乾隆、光绪年间，以河西为根据地，清军先后两次收复新疆。顾祖禹说：“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秦陇、河西、新疆，三者密不可分，共同构建起西部疆域连接一体和不同民族之间沟通融合的基本格局。河西盛则秦陇安、西北稳。能否控制、开发河西，也成为衡量古代中央王朝兴衰强弱的重要标志。

## 二、20世纪河西地区的重振和崛起

20世纪初，河西汉代简牍和敦煌藏经洞遗书相继问世，也使曾被忽视的河西重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为建设抗战后方，重新开始重视和开发河西。

新中国成立后，河西的资源优势及内在生机，显示出新的战略地位。“一五”期间，玉门油矿的石油产量占到全国的80%以上，是新中国石化工业的摇篮。也因此，国家才在兰州投资兴建首批大型石化企业，建设大型石油化工基地。河西还相继发现了国家急需的铀矿、镍矿等，建起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分别为共和国有色金属、航天和核工业的起步、发展，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河西文化的历史价值也得到重视。季羨林指出：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1944年，创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常书鸿等几代专家学者的精心呵护与研究，莫高窟和敦煌文化，作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河西还有博大精深的古代简牍文化，以玉门关、嘉峪关等为代表的古代长城文化，以“铜奔马”为代表的汉代文化，自西往东、连绵不断的佛教石窟寺文化，以酒泉魏晋墓出土砖画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墓葬文化，以黑水城出土文物和西夏文碑为代表的西夏文化，以红军西路军血战河西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它们既是以往河西灿烂文化的宝贵遗存和实物见证，也给今人留下了可资传承、利用的众多文化财富。

上世纪40年代，尚达预言：河西“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之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轴心”地带，河西在今天西部稳定、民族复兴和文化繁荣的国家战略层面，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需要重新认识和考量。

（作者：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李唐皇室祖籍地问题考辨

张慧

李唐皇室祖籍地问题原本不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唐朝皇室一致体认自己的祖先在陇西（六盘山以西今甘肃省中部及青海省东部地区），唐朝以来的各种史籍也是这样记载的，如新旧《唐书》《氏族略》（宋）等。李姓后人虽各有支派，但都认同根本渊源在陇西，天下“言李者称陇西”。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历史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著名学者刘盼遂、王桐龄、陈寅恪等人的研究，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和混乱，莫衷一是。笔者不怀疑这些学者的治学态度，相信他们是认真和严肃的，然而并不能因为他们的著名和权威而盲从，权且当作一家之言待之。笔者认为李唐皇室真正的祖籍地还是应该从史实考证和考古发现做起，以期能够拨云现日，还原本来。

## 一、李唐王朝建立前后的情况

李唐王朝开国，始于李渊，即唐高祖。李渊建唐，须从他的家族说起，因为没有这个家族渊源，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王朝。李渊较近的祖先，不能忽略他的祖父李虎，因为有李虎的发迹，才有后来李家的天下。

《旧唐书·高祖本纪》云：“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

再考李虎的事迹：李虎早年仕南北朝时期之北魏（386年～534年），为太保贺拔岳旧部。善于射箭，轻财重义，雅尚名节，深得贺拔岳器重。后随贺拔岳

平定万俟鬼奴之乱，留镇陇西，累次升迁至东雍州刺史，不久改任卫将军。贺拔岳镇守陇右，任命李虎为左厢大都督。北魏后期，宇文泰把持朝政，大统元年（535年）宇文泰拥立元宝炬登基称帝，建立西魏（535年～556年），李虎遂改仕西魏，官至左仆射、太尉，赐姓“大野氏”。李虎军功赫赫，有辅佐之功，大统三年（537年）受封陇西郡公，加“柱国”衔（最高武官）。天保八年（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篡权建立北周（557年～581年），建都长安。此时李虎已死，由于他有“佐命之功”，仍追封为唐国公，并恢复了李姓。

李虎之后，李虎的儿子李昉凭借父荫，袭封唐国公，保持了在北周王朝的官僚贵族身份。

大定元年（581年），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隋朝建立。李渊天和元年（566年）生于长安，7岁时袭唐国公，成年后娶窦氏。李渊历任谯州、陇州、岐州三州刺史及荥阳、楼烦两郡太守。大业十三年（617年），因功勋卓著而升任太原郡留守。隋末，炀帝暴政，天下大乱，李渊父子趁机以尊隋为名起兵于晋阳，乘虚入关，直取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眼见大势已去，隋恭帝杨侑禅让帝位于李渊，李渊便以“唐”为国号，代隋自立。

由以上情形可以了解，李唐王朝建立之前，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虎祖孙几代先后仕宦北魏、西魏、北周和隋，苦心经营80余年，成为数朝不衰的官僚贵族，为日后建立李家皇朝集聚了雄厚的政治基础。

李渊父子起兵反隋，从根本上来说是顺应了“天



时人事”的历史潮流，军事上的进攻几乎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李渊父子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取得胜利，是因为得到了关陇集团的有力支持。李渊生于长安，在关中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关中地区聚结为数不少的李渊家族和戚属，都是李渊军事进攻的内应力量。李渊攻打零县之时，其女平阳公主率领娘子军“招引山中亡命，起兵以应”。李渊从父弟李神通联合“京师大快”罗万宝等“举兵以应义师”。李渊妻子窦氏的亲戚窦轨等“聚众千余人，迎谒于长春宫”。

从这段记述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从李虎到李昫再到李渊，没有一个出生在陇西，何言他们的祖籍在陇西？

祖籍是是什么？祖籍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所产生的观念，通常是以父系祖先、祖辈的家族长久居住过的地区为祖籍，亦即祖先的原籍。因此考察李唐皇室祖籍地问题还得向上追溯，仅至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远远不够的。

## 二、李姓的起源及郡望

### 1、李姓的起源

李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尤其是李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使得人们对于李姓的研究倍加重视，于今形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所谓“李氏文化”。

关于李姓起源有多种说法，比较权威和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如宋代郑樵著《氏族略》所载：“李氏，嬴姓。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因官命族为理氏。夏商之季，有理征为冀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氏。利贞十一代孙老君名耳，字伯阳，以其聃耳，故又号老聃，居苦县赖乡曲仁里。或言聃六世孙硕宗，周康王赐采邑于苦县。聃曾孙县生崇、玘，崇子孙居陇西，玘子孙居赵郡。”

按照郑樵《氏族略》的说法，关于李姓起源就有

了比较清晰的脉络，如果由近及远追溯，便是这样的情况：李氏——老子李耳——利贞——理征（以官为氏）——伯益（皋陶子，被赐嬴姓）——皋陶——女华——大业——颛顼高阳氏——黄帝轩辕氏——太昊伏羲氏。伏羲乃华夏民族人文始祖，黄帝乃远古华夏民族共主，由此可证李氏无疑炎黄子孙。

关于理氏改为李氏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商纣时，皋陶后裔理征在朝为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而被处死，其妻契和氏带着儿子理利贞逃到陈国苦县，一路乞讨，因食李子充饥，才得以活命，不敢称理，便改姓李氏。这种说法最早由唐朝李延寿提出。另一种说法是：《姓氏考略》记载，周之前未见有李氏，利贞的后裔老子出世，名耳，因祖上世代为理官，理、李两字古音相通，便以李为氏。李耳成为李氏得姓始祖。

### 2、李姓的郡望

郡望即地望、郡姓。“郡”是行政区划，“望”指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世居某郡，并且是当地所仰望的名门大族。

秦汉时期，李姓主要在北方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李氏已是全国的大姓，中原的崔、卢、李、郑并称四大名门望族。

李姓著名的郡望一个是陇西郡，一个是赵郡，都是李耳的曾孙秦司徒李县的后裔。陇西郡，今甘肃省境，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李县长子李崇。赵郡，今河北省境，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李县孙李牧。

多种典籍证实，李姓人氏大体形成陇西和赵郡两大系源。如果按望族形成的时间看，由于中原较西部发达，赵郡李氏望族的形成可能要比陇西郡还要早一些。陇西这一源系中，出了李渊一家，建唐后更趋强盛。赵郡这一源系，繁衍情况亦甚，在不几代的时间里，就成为当地的盛族，高居其他大姓之上。以这两支为主干，形成了中国李姓的源流，渐次向全国各地播迁。

除以上两个郡望以外,还有顿丘郡,此支李氏是陇西李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西汉名将李广一世孙李忠;中山郡,此支李氏为赵郡李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李玘第三子李齐;广汉郡,此支李氏为陇西李氏之后,其开基始祖为李尚(李广之父)。有的李氏族谱称,全国李姓有十三个郡望,但均以陇西郡为尊,以“陇西堂”为共同堂号。

李氏向全国的迁徙主要有三次,基本走向是南迁:一次是在唐朝初期,河南部分李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第二次是“安史之乱”时期,许多李氏子孙迁往南方避乱。第三次是五代时期,因动乱迁往福建、莆田、晋江等地定居。从明末开始,闽、粤李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李氏迁徙海外,始于明朝初年,有一些福建人移居琉球国,有一些人移居东南亚。

### 三、关于李唐皇室祖籍地的三种观点

李唐皇室祖籍问题,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出现较多争议,观点针锋对峙。李唐皇室祖籍问题还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血统问题,不能回避。纵观下来,史学界大略有“陇西说”“蕃族说”“赵郡说”三种观点。

#### 1、陇西说

追溯李唐皇室祖籍问题,最简便的方法是从史书对高祖李渊的记载入手。

《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讳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暕七代孙也。”

《新唐书·本纪第一·高祖》:“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讳渊,字叔德,姓李氏,陇西成纪人也。其七世祖暕……”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记述,只有“陇西狄道”和“陇西成纪”的分别,说李渊的祖籍为“陇西”是一致的。陇西泛指六盘山以西今甘肃省兰州、定西、天水、陇南、临夏等市州及青海省东部河湟地区,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和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西南)都

在陇西范围之内。这是关于李唐皇室祖籍的第一种说法,也是最“权威”的说法,原因是它得到了当时李唐皇室的认可。

#### 2、蕃族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刘盼遂(1896~1966)在《李唐为蕃姓考》一书中考证,李氏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其后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1878~1953)在《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中也呼应了这种观点。

刘盼遂考证,李虎曾被西魏皇帝赐姓“大野氏”,李昉、李渊、李世民三代皆娶鲜卑女,证明李唐皇朝的血统与蕃族鲜卑有很大关系。

刘盼遂先生的另一主要论据,来源于《大藏经·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唐太宗李世民与僧人法琳的一段对话:

帝因亲降问曰:“朕本系老聃(李耳,后人称其为“老子”),东周隐德,末叶承嗣,起自陇西。”

法师对曰:“琳闻拓拔达闾,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指老子,曾为周柱下史,故称“柱下”)陇西之流也。”

法琳和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的是,你们李家,原来姓拓跋达闾,是拓跋氏的后代,到了唐朝才改姓李氏,并不是出自老子,也不是陇西李氏。

听了法琳的这番话,太宗的反应是“大怒竖目”,声言“理有不恕”。法琳则不卑不亢,慨然以对:“陛下今纵雷霆之怒,琳甘纷骨灰躯!”

刘盼遂认为,法琳如无可靠证据,绝不敢在皇帝面前直言李氏出身蕃族(鲜卑族)。面对皇帝的申斥,愀然固执己见,可见所持有据。

#### 3、赵郡说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一方面否定李唐皇室先世出身蕃族,认为“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居,乃一较晚之事实也。”同时对“陇西说”提出质疑,推断李唐皇室源于赵郡李氏之衰微支派,后因攀附西北望族,假托出自

陇西李氏名门。

陈寅恪先生提出李唐出自赵郡李氏的推断,其主要依据是《唐光业寺碑》。陈寅恪指出,河北省隆尧地区发现李渊四代祖李熙和三代祖李天赐的陵墓,与陵墓毗邻,建有光业寺,光业寺有唐代象城县尉杨晋撰《唐光业寺碑》,碑文中有“桑梓”之语。陈寅恪据此推测:一、赵郡之李与陇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居关陇之李的名望高于赵郡之李,李渊托名陇西,实是借以提高自己家族的身份;二、李唐先世本为赵郡李氏衰微支派,李渊祖父李虎入关后,东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姓望,继而又自称西凉李氏嫡裔,便撇清了“破落户”的卑微出身。

#### 四、关于李唐皇室祖籍地的辨正

在关于李唐皇室祖籍地的三种观点中,究取何种观点为宜?试作以下辨证。

首先说“蕃族说”。

从南北朝到隋朝,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此一时期,胡、汉两族相互杂居、相互通婚的情况十分普遍。持“蕃族说”观点的学者列举了李唐皇室与北方少数民族通婚的一些情况:李渊之父李昞娶独孤氏,李渊娶窦氏,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三代皆娶鲜卑女。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事实是,李氏诸人与所谓“胡人”联姻,已经是在长期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并且若就其男系论,李氏初本是华夏,固纯粹之汉族。而且,民族是一个历史社会范畴,而不是一个种族生理范畴,李唐帝王始终是以汉族统治者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血统中胡族成分即使有,也没有在任何方面影响他们的政治生活。因此说李氏皇族源于“蕃族”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说“赵郡说”。

陈寅恪是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他以自己的“赵郡说”颠覆自唐以来几乎所有历史典籍关于李唐皇室为西凉李李暠后裔的说法,从而否定李唐皇室祖籍地为陇西。陈寅恪的论证颇为繁复,有关于《李

唐氏族问题》的一论、再论、三论。对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成国先生在《唐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兼论李唐皇室氏族问题》(发表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中曾有驳论。陈成国对陈寅恪援引“李唐自称为西凉后裔之反对证据中”“最强有力者”——《魏书·广阳王深传》论六镇疏,认为“正好是李唐皇族为西凉后裔的强有力的证据”。

依笔者所见,赵郡与陇西郡都是当时李姓著名郡望,两地李氏都尊奉李耳为得姓始祖,同为李耳曾孙李县之后裔。即便李唐皇族的祖籍真正在赵郡,那也是华夏名门,根本没有攀附陇西望族以提高身价的道理,舍此求彼,非所宜也。

至于陈寅恪提到的李渊四代祖李熙和三代祖李天赐墓,葬埋地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出生地,更不能证明一个人的祖籍地。实际情况是,在他们离世的时候,他们的上辈已经离开了世居的陇西,领军镇守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居家迁居到了武川。《旧唐书》:李熙“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新唐书》:李熙“戍于武川,因留家焉。”因此埋葬在祖籍以外的河北省隆尧地区是合乎情理的。只因象城县尉杨晋撰《唐光业寺碑》文时,不了解情况,有“桑梓旧国”“维王桑梓”之语,便造成了李唐为赵郡李氏的误判。

再次说“陇西说”。

李唐皇室历来体认自己的祖籍在陇西。《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李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暠七代孙也。”《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李渊)陇西成纪人也。其七世祖暠,当晋末,据秦、凉以自王,是为凉武昭王。”

按照新旧《唐书》的记述,李渊的祖籍皆为“陇西”,只是一说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一说在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关于此点,后文将有辨析。自李渊之后,凡涉及李唐后人的祖籍都称作“陇西”,保持了与老祖宗的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

由李渊为起点一直往前追溯,李唐先祖问题便

落在其得姓始祖李耳身上。如果以始祖李耳为起点,反过来梳理陇西李氏繁衍的脉系,便有如下传世体系:

李耳——李县(李耳八世孙)——李崇(李县子)——李瑶(李崇子)——李信(李瑶子)——李仲翔(李信孙)——李伯考(李仲翔子)——李尚(李伯考子)——李广(李尚子)——李曷(李广十六世孙)——李歆(李曷子)——李重耳(李歆子)——李熙(李重耳子)——李天赐(李熙子)——李虎(李天赐子,李渊祖父)——李昺(李虎子,李渊父)——李渊

以上所列,是李唐先祖中可考的一些重要人物。以下通过史书的记载,或可看到他们与陇西之间的渊源。

1. 老子。名李耳,道家学派创始人。《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修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出函谷,过散关,游河湟,涉流沙,访陇西。四川成都龙泉驿《李氏源流族谱序》:李公“生二子。长居陇西郡,即陇西本支祖。次居赵郡,故赵郡李。”

2. 李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载:“李县,字贵远,赵柏人(今隆尧县)侯,入秦为御史大夫,卒葬柏人西。”

3. 李崇。字伯佑,秦时陇西太守,封南郑公,家居素昌(即陇西狄道)。李崇是李县的长子,定居陇西狄道(今临洮县,下同),繁衍为郡望大族,尊李崇为陇西堂始祖。李县其他后人世居在柏人城一带,子孙支庶繁多。北魏时,尊李县之孙李牧为赵郡堂始祖。

4. 李信。字有成,为秦大将军,虏燕太子丹于易水,威震诸侯,封陇西侯。

5. 李仲翔。《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6. 李尚。《唐·郿州寿张县尉李珪墓志铭》:“李尚,汉学有道,为成纪令,其子李广,随父居成纪。”

7. 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唐朝列圣之碑》:“广家世世受射,才气天下无双,仕汉,历文、景、武三帝,位前将军,立功沙漠,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

8. 李曷。《魏书·李曷传》:“陇西狄道人。”《唐朝列圣碑》:李曷“汉前将军广的十六世孙,幼好学,性沉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长文义,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以纬世之量,为群雄所奉,逐后霸图,国号西凉,谥曰武昭王。”

9. 李宝。李曷之侄,北魏重臣,领护西夷校尉,沙州牧,敦煌公。《魏·豫州刺史李蕤(李宝长子李承第四子)墓志铭》:“君讳蕤,字延宾,陇西郡狄道县都乡和风里人。”《魏·彭城武宣王妃李氏(李宝少子李冲之女)墓志铭》载:“妃,讳媛华,陇西郡狄道县都乡和风里人。”

10. 李熙。《新唐书》:“金门镇将,戍于武川,因留家焉。”

11. 李天赐。任北魏的禁军主将。西魏文帝大统年间,赠司空。唐高宗仪凤年间,追尊为光皇帝,墓葬在河北省隆尧地区,与其父李天赐共茔。

从以上诸人事迹的记述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李唐之得姓始祖李耳(老子)出函谷关后游历陇西多年。其九世孙李崇秦时任陇西太守,家居陇西素昌(狄道),被尊为陇西堂始祖。后裔李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战死于素昌,葬于狄道之东川。他的儿子李伯考因奔丧落家于狄道。到了汉朝,李伯考的儿子李尚做成纪令,带着他的儿子李广迁居成纪,故司马迁记载李广为陇西成纪人。西凉庚子元年(400年),李广后裔李曷建立西凉割据,成为“五胡”之一。再以后,李唐祖先先后事北魏、西魏、北周、隋,最后代隋自立建唐。如此,李唐皇室的祖籍地便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即是陇西无疑。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新旧《唐书》记述李渊祖籍陇西狄道和陇西成纪的不同?这是因为《旧唐书》按照北凉武昭王李暠的祖住地而言,《新唐书》则是按照汉将军李广的居住地而言。李广是随其父李尚做成纪令时迁居成纪的,《史记·李将军列传》有证:“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纪,实始此也。”槐里,即狄道县东川。如果向上追溯,不论李广还是李暠,都归宗于同一个祖先——李崇。他们的祖籍地毫无疑问便是陇西狄道,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 五、李唐皇室祖籍地为狄道的证据

笔者曾在拙文《古陇西与今陇西之考辨》(发表于《甘肃史志》2017年第1期)中对陇西郡与古陇西、古陇西与今陇西作过比较详细的辨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古陇西是指以陇西郡为主的“陇山”(即六盘山)以西广大范围地区。陇西郡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设置,到唐乾元元年(758年)撤销建制,前后经历1037年。郡治在狄道(今临洮县)492年,在襄武(今陇西县)545年。最初的陇西郡辖域覆盖兰州、定西、天水、陇南、临夏21县。古陇西是一个大的概念,它不单局限在陇西郡范围之内,而是泛指六盘山以西今甘肃省兰州、定西、天水、陇南、临夏等市州及青海省东部河湟地区。唐人描写陇西的诗歌中,甚至把“无定河”“酒泉”“关山”这些地名都包含在陇西的范围之内,所以在古人的意识里,陇西的外延还要更大。二、今天的陇西县只是陇西郡辖内很小的一个区域,更不能与古陇西可比。

那么,李唐皇室所体认的“陇西”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应该是大概概念的陇西,是以最初郡治为狄道的陇西郡但不仅限于陇西郡。而狄道作为李氏豪门和族人的聚居地是其郡望形成的所在《旧唐书·本纪》说李渊“自贯狄道,布在方策,为凉武昭王李暠七代孙。”可证。

李唐皇室的祖先,是秦国首任陇西郡郡守李崇。李崇居家狄道,被尊为陇西李氏始祖,也是陇西李氏的堂主。李崇的次子李瑤为狄道侯,李瑤之子

李信官封秦大将军、陇西侯,李崇祖孙三公的官爵均与陇西郡关联。

西汉初,李信之子李超为汉大将军、渔阳太守。李超之子李仲翔为河东太守、征西将军。史书记载,李仲翔讨叛羌于狄道,因寡不敌众,临阵战歿。其子李伯考奔父丧,将仲翔葬于狄道东川。随后,李伯考把子孙安置在狄道东川槐里,也就是现在临洮龙门镇槐树里庄。据考古学家考证,临洮东二十铺汉墓群,就是李仲翔家族墓群。1954年被列为甘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载:“广父李尚,乃伯考之子。”而伯考家居狄道东川故里,李尚任成纪令后迁居成纪。从公元前280年陇西房始祖李崇首任陇西郡守家居狄道算起,于此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上世纪初,临洮北关外竖有一块大碑,上刻“西凉武昭王李公讳暠之故里”,现今临洮仍保存有李暠衣冠冢。这些都确切地表明了西凉王李暠的故里在狄道。李暠的后裔李蕤、李彰、李媛华、李艳华这些人的墓志上都详细载明其族源来自“秦州陇西郡狄道县都乡”。

在李唐宗室出土的墓志铭中,李渊从弟及其后裔,李寿、李贞、汝南公主、长乐公主、新城公主、兰陵公主、李贤、李惠仙、李惟一、李侃侃、李思训、李珪等均刻有“陇西郡狄道县人”。

在今临洮县城洮河西岸的西坪,有一个叫“钦王湾”的地方,仍然遗存唐西平郡王李晟之父、左金吾卫将军李欽的墓地。其妻代国夫人王氏之墓,在西坪李家窑村山顶。这两座墓地被当地群众称为“上王坟”、“下王坟”。清乾隆狄道州志有记载:“李晟父母墓钦王湾下。”《旧唐书》载:“李晟,字良器,陇右临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陇右为裨将。”

在现今临洮县的56万人口中,有8万人姓李,占全县人口的七分之一。整个临洮境内,以李姓命名的村庄达76个,可以说遍地都是“李家庄”,仅“李家湾”地名就有10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村庄叫“纸

坊李家”“窑头李家”“瓦坊李家”“大户李家”“小户李家”“单庄李家”“河下李家”等等的名称。从一个方面佐证了昔日李氏在狄道人口之盛。

不言而喻,李唐皇室的祖籍地在古陇西郡,最初郡治古狄道作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李氏聚居地和发祥地。当然,陇山以西的古陇

西广袤土地同样是李氏繁衍、生息之地,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从这里启程,一路杀伐征战,最终建功立业,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制高点,建立了前无古人的王朝盛世,也算是陇西这片土地的骄傲。

(作者: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统战部副部长)

## 《甘肃年鉴2017》公开出版发行

《甘肃年鉴(2017)》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管、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是全面、客观、真实、系统地记述2017年度全省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大型资料性文献。2017年10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现当年编辑当年公开出版发行。全书有正文554页、彩页144页、1800多幅照片,版面字数151.7万字,有条目1800多个,设特载、专记、大事记、省情概览、政治、军事法治、经济、经济管理与监督、国土管理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社会服务与管理、市(州)县(市、区)概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先进人物与先进单位、附录和索引等16个类目。该年鉴主要突出特色有:一是卷首彩页中新设“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建设中的国家级开发新区—兰州新区”“旅游风光绚丽多彩”“城市建设蓬勃发展”“交通建设日新月异”“民俗文化独具特色”“美丽乡村欣欣向荣”“农牧产品种类丰富”等8个栏目,突出反映了甘肃的地域特色;二是在记述内容中删除大量内视性条目,如“队伍建设”“工作调研”等,同时增加动态性条目,反映当年新建的民生工程项目、文化建设等,增加地名的来历、图表等可读性条目,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文字更加精炼;三是首次采用《甘肃年鉴》的logo标识和词条检索目录,实现版面的优化设计和服务社会用鉴的便利。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滕辉供稿)

# 老子与武山老君山考究

汪新颖 裴应东

甘肃武山老君山，自古享有“君山独秀，俯瞰渭水”之美誉，“君山壁障”为古宁远八景之一。清康熙《宁远志·山川》载：“在县南，巉岩耸翠。云冠峰顶，天必大雨。中有湫池，又有棋盘山、仙人洞，相传喜襄对弈处。”老君山山势雄伟，峰峦叠嶂，怪石嶙峋；古松参天，林海波涌，气郁葱浓；深涧幽壑，湍流激石。风光秀丽的老君山有太清胜景、石峡飞瀑、朝阳古洞、棋盘仙迹、鸡冠叠翠、锅底烟云、幽谷神泉、瞭台瞰渭等君山八景。民间有“君山绿，衣食足；君山秃，万家哭”之说。据史载，老君山道观始建于汉末，后历代均有修葺。北宋仁宗年间重建后，形成较大规模。老君庙气势非凡，为一时颇负盛名的道场，元代重建八卦亭、三清殿、灵祖殿、三元殿、观音殿等。明洪武年间又有增建，憾惜明崇祯十七年（1644）大部分建筑毁于火灾。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修，道观十五年（1835）再修，渐成陇中著名道观，主要殿堂憾毁于“文革”时期。

武山老君山相传是道教祖师老子西行修道之地，故以老君名之。《史记·老子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

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从《史记》记载可知老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今河南鹿邑县东）人，因不满周朝的腐败而辞官归隐，在西行经函谷关时遇到关令尹喜，在其要求下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上下篇，后不知去向。《汉书·艺文志》载：“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据道家经藏《仙佛奇踪》、《甘肃新通志》、《秦州直隶新志》等记载，尹喜为甘肃天水人。《后汉书》载：“或言老子西入夷狄为浮屠。”汉代刘向的《列仙传》是这样记述的：“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后与老子俱流沙华明，服芭胜食，莫知其所终。”夷狄和流沙泛指今甘肃河西地区，由此可知，尹喜辞官后随老子沿渭水而行途径今甘肃天水地区。西汉刘向《列仙传》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又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云：“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爱序道德，以冠百氏。”可知“伯阳”因老子字而名。《水经注·渭水》记载：“（渭水）又东经上邽（今天水）城南……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山之伯阳谷，北流，白水出东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阳水。伯阳水又西北历谷，引控群流，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历大利，……屈而东径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

盖李耳西入，往径所由，故山原吠谷，往往播其名焉。”可见，老子经伯阳谷入陇的故事在北魏时期还很盛传，于是北魏置县之时就将这一区域设立的新县定名“伯阳”，准其地望在今天水麦积区伯阳镇一带。《水经注》作者北魏酈道元的祖父酈嵩做过天水太守，因此对本区的注解应该准确。1986年在水北道(麦积)区放马滩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七副木板地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经学者研究，七幅图拼接成一幅大图，是邽县为中心的政区图和交通物产图。而这幅图的中心区域正好是今天水市的秦州、麦积两区。此图的文字注记中有虎谷、虎溪、苦谷、苦史、广堂史等地名。而“苦”、“虎”一音之转，“苦谷”、“苦史”亦即“虎谷”、“虎史”；又老子曾任“周守藏之史”、“广堂史”之名当由此而起。老子故乡是“苦县”，此“苦”正好印证了木板地图上标示的“苦”。今武山老君山主峰谓之“伯阳”峰，“青牛”岭、“伯阳”洞、“炼丹”台、“棋盘台”等以老子行迹命名的景点，康熙《宁远志·古迹》载：“棋盘台，在老君山。相传为老子、尹喜对弈处。”这些地名千百年来一直沿袭，这正是对《水经注》记述伯阳时所言“盖李耳西入，往逸所由，故山原吠谷，往往播其名”的古老实证。《庄子·寓言》称：“阳子居南之沛，老子西游于秦。”《史记》正文末《索隐述赞》云称：“伯阳立教，清静无为。道遵东鲁，迹窜西垂。”秦和西陲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对以今天水为中心的甘肃东部地区的称谓。

老子之所以归隐秦陇之地，主要是秦国长期和戎族相处，民风淳朴而率直，这很符合老子“小国寡民”思想。《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陇西……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后老子沿渭水西行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后一直往西行，后又返回临洮。隋炀帝《西征·过渭源》：“长林啸白兽，云径想青牛。”这里的“青牛”代指老君，相传老子沿渭水骑青牛西行。后逝世于秦地，《庄子·养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失”(或曰佚)为老子生前好友，秦为陇上，可见，老

子不仅入陇，且终老于陇上。今临洮岳麓山“风台”相传为老子飞升处。先秦时期本区的原著民氐羌后裔今生活在四川阿坝等地的羌民对老君极为尊崇，其民俗信仰和道教也有很深厚历史渊源。

东汉张陵《老子想尔注》曰：“一(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魏书·释老志》载：“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可见，老子在道教中是至尊和人格之神。陇中民间信奉道教，崇祠教祖太上老君。一方面是由于老子西行在此布道讲经，并终老于本区，故在此区影响深远。此外，历史上本区天灾人祸多发，人民生命财产经常受到威胁，而老子的道家思想“轻物重生”，是以生的崇拜开始求道的，幻想通过各种养生修炼而达到长生，这种观念必将在民间衍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话中太上老君手中的法器紫金红葫芦、羊脂玉净瓶等的灵丹妙药可使枯木逢春、起死回生等超凡神力，这恰恰契合了民众“保命求生”的心理需求，在当地信众观念中老君有祈福禳灾、降妖除魅、扶危济困、祛病救人、延年增寿、拯危消厄、救灾解祸、济世度人、赐福禄寿，家门安泰，子孙隆昌之功法。陇中乡间村庄普遍建有老君庙俗称天爷堂以祀奉，正如《巩昌府志·校注》载：“民间流传太上老君是铁匠、补锅匠、矿山作业、窑匠、银匠与冶铸业等行业的创始者和守护神，保护行业兴旺，人身平安。太上老君睿智慈祥是长寿之人，又是道德天





君,民间供奉太上老君,可远离疾病,身体健康,延命长寿,可保佑官禄不断,家庭繁荣,多子多福、财源旺盛,平安吉祥。

武山老君山上有一巨石形如龟背,头尾皆具,人称“灵龟石”,又叫“如意墩、卧虎墩”。石上可坐数十人,相传老君在此讲经。现民间仍有“石上一坐可寿百岁,接福纳祥一生如意”的说法。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老君圣诞,武山老君山都要举行盛大的祈福法会,其中最重要的科仪是打平安醮,俗称“打醮”,冀求老君护佑驱除疫厉灾害、年成丰收、合境平安。

老子讲究顺应自然,修养身心,合乎天道,清静

无为,反对刀兵,主张和平。民间供奉太上老君,寓意修身养性,顺应自然,为人处世与天地合德,以祈保境安民,风调雨顺、平安人生。当地民间还流传着“太上老君急急令”,遇到困厄念咒祈祷,这样就能逢凶化吉、解危救难。陇中民间老君信仰中有“许愿”“求神”和“还愿”“酬神”等行为,表达方式主要有:裹烛进香、设坛斋醮、重礼祭祀、捐钱献物、挂匾进袍、唱戏酬神等等,以祈愿求福、降福赐恩。

(作者单位:武山县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武山县博物馆)



GANSUSHIZHI

甘肃史志

2018年第1期（季刊）（总第33期）

编辑出版：《甘肃史志》编辑部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  
省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电子邮箱：3498763120@qq.com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